

جوڭگوت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 中國邊政

ཁུང་གོའི་མཐའ་ཁྱེད།

**China Border area Study**

ཁུང་གོའི་མཐའ་ཁྱེད།

مەھمۇتلىق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208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十二月

## 仡佬族簡介

仡佬是人數較少的邊疆少數民族，1982 年時五萬三千八百多人，2010 年大陸第六次全國普查時五十五萬零柒佰多人，二十八年間人口增加幾達十倍，這當然與邊疆少數民族不受一胎化約束有關。仡佬族絕大多數分布在貴州省之懷仁、黔西、織金、鎮寧、關嶺、普定、大方、清鎮、安順、遵義、平壩、金沙、興仁、六枝、水城等地。少數分布於廣西的隆林族自治縣以及雲南省之廣南、馬關、文山、富寧等縣，分布地區相當廣。

仡佬族語言屬漢藏語系，由於分布地區不同，因此各地的方言差異頗大，與漢語關係較為密切，吸收了相當多的漢語語匯與漢語語法結構，而仡佬族人普遍會講漢語使用漢文。仡佬族崇拜祖先與泛靈的薩滿信仰，尤其對大樹神、山神、土地神等為甚，仡佬族的大部分聚居都沒有廟宇，也沒有宗教組織機構與成文的宗教書籍。

仡佬族絕大部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三代同堂的很少，四代同堂則更為少見，一般而言在家庭中男女地位較為平等，但也有個別地區婦女地位較低。但在廣西隆林地區仡佬族大家庭較為常見，最多到四代同堂，而以三代同堂較普遍，而且認為三代同堂的家庭最美好的。

仡佬族的人起名具有相當特色，一般小孩生出後，只用小名（或稱乳名）如小三、阿林……等，到上學時再取正式名或稱學名，學名的第一個字一定要與同輩份的人一樣，所以只要看到同姓而名的第一個字相同者，就知道他們是同族同輩份的人，這與漢人按輩份取名頗為相似，不過這學名也不是永久使用，一旦到了他生下第一個孩子後，由族裡的長老為這新生小孩取一個沒有人用過的名字（乳名），孩子父親的名字就隨之更改，為了表示自己已成為人父，便在姓下加一「卜」字，再綴以新生小孩的名，如郭學禮結婚生子，新生小孩取乳名為阿吉，此時郭學禮就成「郭卜阿吉」，這與漢人是絕大不同，不過在仡佬人社會裡只要一看到名字，就會知道某某人已是孩子的爹了，這是一大特色。

仡佬族早年婚姻都是由父母作主，近幾十年來當然流行自由戀愛，早年雖由父母作主，多半是親戚聯姻，自由戀愛自然聯姻的範圍擴大了。結婚年齡以往多在十五歲至十九歲之間，近年以來因教育及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自然延後，由於財產繼承關係，仡佬族也有入贅婚。

在服飾方面，婦女多是上衣很短僅及腰際，袖背上全綉上鱗狀花紋，褲子長而下寬，多為淺藍色。青壯年婦女則多穿深藍色或黑色上衣，其式樣為右衽。男子服飾早年是上衣長至膝蓋以下，右衽、邊有鈕扣，腰間束一長帶。仡佬族無論男女都有包頭之習慣。

在山區的仡佬族族以玉米為主食，平地則以稻米為主食，但也有以玉米、稻米各半混合而煮，稱混合飯，喜吃辣椒、飲酒，副食則多樣化。至於住屋大致與漢人相同。其葬俗係土葬。

## 目 錄

從長安到撒馬爾罕—古今絲綢之路及其展望 .....	劉學鈞	1
台灣對於絲綢之路經濟戰略的對應之策 .....	林遙鵬	17
1947~1959 年西藏情勢分析兼駁夏格巴《藏區政治史》 .....	孟 鴻	29
試論雍正朝「國舅」隆科多在康、雍之際的政治活動及影響 ....	袁公瑜	75
蒙古代表團、蒙古會議與蒙古各盟旗駐京聯合辦事處 .....	金兆鴻	95
布勒瑚里湖考略 .....	張華克	119
社會分工視角下河湟回藏民族關係 .....	吳楚克、馬瑞雪	159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二十三） .....	華 華	169
稿 約 .....		174



# 從長安到撒馬爾罕—古今絲綢之路及其展望

劉學鈞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

（本文為應邀參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中國邊疆研究所於 2016 年 11 月 16 日舉辦之《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 摘要

西域（含廣義之西域）為歐、亞大陸之心臟地帶，自遠古以來，即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乃至巴比倫文明薈萃之處，其所以成為東西文明交流之所在，端賴於所謂「絲綢之路」。在絲綢西去之前，崑山之玉早已東來，據當時考古發掘商代婦好墓陪葬玉石中，幾乎都是產於崑崙山的和闐玉，足證在史前東、西方已有往來，和闐玉就是往來的媒介，河西走廊西端之玉門關，就是玉石通過而得名，此一通道早期如稱之為玉石之路，似乎更為妥適。其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奇霍芬稱此一東西通道為絲綢之路，從此遂成為定稱。絲綢之路聯繫東西方文明，在近代海路開通以前，是歐亞交通的主要通道，曾經有過輝煌的歲月，引領著人類文明向前邁進，之後雖因海路開通及一些政治因素，而沈寂的頗長的一段時間，進入本世紀後，國際政治情勢已有明顯改變，而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技術日益進步，沿絲綢之路可以形成一個龐大的經濟帶，可以帶動人類的文明邁向新境界，本文擬就古今絲綢之路及其展望做闡述。

**關鍵字：**絲綢之路，長安，新疆，撒馬爾罕

## 壹、前言

華夏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中下游，早在夏商時期已與西域有所往來，雖未見諸文字記載，但從考古發掘商代（西元前十六至西元十一世紀）「婦好墓」出土的陪葬中之玉石，經學者專家考定，幾乎全為西域崑崙之玉<sup>1</sup>，設若西域與中原沒有往來，則此崑崙之玉如何傳到東土？稍晚西晉（265-316 年）時出土的《穆天子傳》<sup>2</sup>明白提到西周穆天子姬滿曾西遊過「禺氏之平」，所謂「禺氏之平」就是月氏人所居的平原，更會見了西王母這是文學記載中，夏與西域往來的紀錄。在晚些戰國時期南方的楚國屈原在其《楚辭》兩度提到崑崙，其一、在《九歌河·河伯》中：「登崑崙兮日望，心飛揚兮浩蕩。」另一則在其《離騷經》中：「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國。登崑崙兮食玉英。」此處之「瑤」就是美玉，從而可得知在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原與西域早已有往來，其實西域東來興販之物可能以玉石為主，玉門關之名或由此而得，當時西域與中原的通道稱之為玉石之路或許更為貼切。

及至西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為斷匈奴右臂，派張騫使西域聯絡大月氏，希望能結為同盟以共擊匈奴<sup>3</sup>，張騫雖未能達到大月氏結盟的目的，但鑿空西域，中西交通為之大開，尤其擊敗匈奴奪得河西走廊，建為威武、張掖、酒泉及敦煌四個後，漢朝力量及於西域東端，之後結盟烏孫東西夾擊匈奴，匈奴力量退出西域，由是東西交通掌握在漢朝手中，中國絲綢大量輸了往西域，經波斯中介輸入羅馬，羅馬貴族對於中國絲綢喜愛至極，中西交通孔道以東綢西運，揚名於世及至雨 1877 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奇霍芬（F.von Richthofen）稱此交通孔道為「絲綢之路」，從此遂成為中外學界所通用以稱中國長安經河西走廊入西域，撒馬爾罕之路為「絲綢之路」，甚至從撒馬爾罕延伸到歐洲之通道，涵蓋在絲

<sup>1</sup> 關於崑崙玉即和闐玉，婦好墓出土之為和闐玉，參見宋建中《新疆和田玉百問》，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 出版社，2011 年，頁 4

<sup>2</sup> 《穆天子傳》係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281 年）發掘戰國時汲縣魏安釐王塚得此竹簡，近人張星烺於其《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巨著中指為可信資料。

<sup>3</sup> 月氏、烏孫原在祁連、敦煌間，被匈奴擊破，西徙今新疆西境楚河流域，稱大月氏，之後匈奴又支持烏孫再擊大月氏，復西徙進入今中亞兩河之地，擊敗大夏而有其地。另，所謂祁連、敦煌經考證應在今新疆天山東端，非今甘肅之祁連山、敦煌。

綢之路內。

接絲綢之路初時出嘉峪關過玉門後，分爲南北兩道，經天山南麓各綠洲，西越蔥嶺進入廣義的西域<sup>4</sup>，是謂北道；另一則爲出玉門關後經樓蘭（漢時將是改爲鄯善）沿崑崙山北麓各綠州西走，越蔥嶺入西域是爲南道，玉門只是西出的關口，所有絲綢或其他貨品都是先集中漢唐帝都長安（東漢都洛陽，唐也以洛陽爲東都）因此以長安爲絲綢之路的起點至爲合理，也有主張向東以洛陽爲起點，似也合理。雖然世人以絲綢之路稱此一交通孔道，但興販之物不侷限於絲綢，西域大量貨物隨陣陣駝鈴聲源源輸入中土，這只是有形的物質交流，更重要的文化交流，廣義的西域，也就是中亞位處中國文明、希臘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的交匯地帶，形成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吸納，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幾乎所有世界性的宗教，都經過西域透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土，而所有中國人信徒，每個宗教都有其生死的思維邏輯，也影響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這是絲綢之路物質功能之外的貢獻。

15 世紀之後，由於海上航路之發現，絲綢之路沉寂了好一段時間，然而近三、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因改革開放經濟大見發展，沿海地區之發展已近飽和狀態，且東西部經濟因而形成極大落差，因此加緊中西部的經濟建設，縮小東西部的差距，已成爲中共的當務之急，再加上中亞五國已經真正獨立，可以自主決定其經濟格局與發展方向，由於此兩因素，亞洲內陸的發展已到了升火待發的階段，中國大陸適時地提出要開發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時爲了要面對海洋，也提出了發展海上絲綢之路，這就是所謂的「一帶一路」。因此絲綢之路再度受到世人的重視，今日由於科技的進步，絲綢之路不再由緩慢的駝隊來帶動東西交流的功能，而是由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和飛機，取代的所能發生的功能將千百倍於往昔，研究絲綢之路，不但有其歷史意義，更具有前瞻性，今天我們研究絲綢之路過往歷史，推展絲綢之路經濟帶，正是爲人類文明是撰寫新篇章，中國邊政協會一甲子以來，都在研究古今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其目的在促進國內各民族和諧團結，建構國族意識，基此，在發展絲綢之路經濟

<sup>4</sup> 西域有狹、廣義之別，狹義之西域僅指今新疆；廣義者則擴及今中亞，甚至更遠之地，見余太山《西域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頁 1



帶這一個對西部邊疆地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 貳、連結東西的絲綢之路

古代亞、歐、北非大陸先民曾締造了幾個古文明，處於這幾個古文明交匯之處正是中國古史上所稱之西域<sup>5</sup>，此一地區是人類幾古文明薈萃、交流之處，在人類文明發展歷史上，具有極大意義，擇其要者言，約有以下數項：

### 一、玉石之東來

自遠古以來，華夏民族就喜好玉石，據考古學者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按原為昭烏達、卓索圖兩盟之地）敖漢旗（原屬昭烏達盟）興隆洼（洼音蛙，意為低下有水之地，此地位於敖漢旗西部寶國吐鄉東南約九公里處）<sup>6</sup>的一處墓葬開掘中發現墓主左右耳部各有一件玉玦（玦音決，意為半環狀的玉佩），製作精美，經考古學家測定，此一墓葬距今已有八千年，與興隆洼相距不遠的遼寧阜新茶海遺址，也發掘出許多玉器，考測其年代距今已有七七年之久<sup>7</sup>，這些出土玉器，都是產於今新疆和田（古代稱于寔、于闐、和闐），以上兩處墓葬所發掘的玉器都早於傳說中的皇帝軒轅氏，及至夏、商、周時期，西域的和田玉，更是大量進入中原，加工技術也更見精良，考古學家發覺晚商時期的「婦好墓」也發現其中陪葬的玉器七百五十多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新疆和田玉，這證明史前時代西域與中原已有往來，考古發掘的寶物，乃是最珍貴也是最真實的史料。

稍晚西周穆王姬滿曾有西域之行，據《穆天子傳》稱：穆天子西行至月氏所聚居的「禺氏之平」後，曾會見西王母，所謂西王母，一般人總將之描繪成「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相當奇特，其實如從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觀點看，完全符合初民進化過程，「西王母」可能還處於

<sup>5</sup> 西域固有有狹、廣義之分，見本文注 4，但近代西方多以中亞稱之，其範疇恰與國史上所謂廣義之西域不謀而合，詳請參見 L.Z. 宋羅什尼科夫《中亞一詞的含義》一文，該文列《中亞文明史》第一卷，頁 360-368，北京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 2002 年。

<sup>6</sup> 其詳細位置參見《內蒙古自治區地圖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7 年，頁 93

<sup>7</sup> 以上參見宋建中《新疆和田玉百問》頁 15，以上所發掘之古玉器，雖在今內蒙古地區，但與蒙古族並無關聯。



母系社會階段，「如人虎齒」可以解釋為虎圖騰之民族，「戴勝」可作戴面具解，任何民族幾乎都有此俗，如從此一角度看，西王母一切正常。西方學者愛合爾(E.J.Eitel)稱「西王母」三字僅為音譯，不宜從字面上探其意，《穆天子傳》及中國他種古書，都未指出「西王母」為婦人，「西王母」乃是西域某一個部落名稱的漢字音譯<sup>8</sup>，此一說極為合理，在「穆天子傳」中有多次提到崑崙山，並「命其隨從攻玉，載玉萬只而歸」，這些玉當然都是賞賜周王室、諸侯、卿大夫，可見在周代有相當多的人佩戴和田玉，凡此，都足以證明早在商、周時代，西域與中原已有所往來，這些玉石往來的通道稱之為玉石之路應是合適的，只是西漢武帝命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中土所產絲綢經由此一通道運往西域售向歐洲，1877 年德國學者李奇霍芬將之稱為絲綢之路，從此遂成為定稱

## 二、貿易的雙向性

古代市場交易缺少通貨，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更沒有國際性的貨幣，通常都是以物易物，所呈現的就是貿易的雙向性，中亞地區的昭武九姓諸國所分佈的綠洲面積都不會太大，人口也不可能太多，不易形成擁有強大武力的國家，每當有強權來攻擊時，莫不俯首告降，這是地緣使然，因此，昭武九姓對「國家」的政治意識並不強烈，但求無害於其貿遷有無，經商獲利，對於何人、何族來統治並不介意，此點，上世紀初學者王國維已有極透徹的析論如下<sup>9</sup>：「西域人民（按指昭武九姓言），以國居東西之沖，數被侵略，亦遂專心職業，不復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臘來則臣希臘，大夏月氏來則臣大夏月氏、嚙噠來時則臣嚙噠…大食來則臣大食。雖屢易其主，而人民之營其生活也如故，當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言語風俗，固有不同，而統治一級，人數較少、武力雖優，而文化較劣，往往與被統治者的相融合，故此之（指廣義之西域）之言語風俗，非統治者之言語風俗，實被統治者之語言風俗也，然則論西胡之事，當分別統治者與被

<sup>8</sup> 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一冊頁 82，此書早在 1930 年便以《輔仁大學叢書》問世，分為六冊，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由輔仁大學多次重印，2001 年北京中華書局加以整理，分為四冊，於 2003 年重新出版。

<sup>9</sup> 見王國維《西胡考、西胡續考》，此文輯入王氏《觀堂集林》，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影印出版，原書係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出版。見頁 606-620 頁

統治者二級觀之，否則鮮不室閼矣。」

上引王國維之說確屬的論，中亞昭武九姓之人善於商賈，史傳稱：「康國其土地肥沃，宜禾，出善馬，…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立傍國，利所在無不至。…」<sup>10</sup>

西域昭武九姓各國人民如此熱衷且善於商賈，每年組商隊來華經商者難以計數，每一商隊少則四、五百人，多則上千人，這些西域商胡來華後，有不少留居中土，沿絲綢之路各城鎮，如疏勒、于闐、播仙鎮、石城鎮、龜茲，焉耆、西州（即高昌，今吐魯番），伊州（伊吾，今哈密），沙洲、瓜州、肅州，…長安，洛陽…以至東北的營州都有西域商胡留下安家落戶的紀錄<sup>11</sup>，既然有如此多的西域商胡來華興販，理論上也應該有不少中原漢人到西域經商，可惜這一部分文獻上未曾記載，但是不能因為文獻未記載而抹煞可能存在的事實。

### 三、促進東西交流

不同民族（或族群）接觸時，必然會互相吸納對方若干文明制作、典章制度、藝文活動、飲食習俗，乃自思維邏輯，而這些就是所謂的文化，既然有為數頗多的西域商胡來華，則西域文化滲入中國文化乃成為不可避免之事，茲列舉一、二事以為證，唐代士宦之家飲食流行葡萄酒與饌饌，經考證所謂饌饌，就是至今仍盛行於新疆、中亞、伊朗、印度一帶的「抓飯」，其讀音為 DA R A U F，初作畢羅，由於其為食物，遂加以「食」偏旁；至於今日中國所常見的樂器，幾乎都是從西域傳來，至於舞蹈，唐代盛行胡旋舞與拓枝舞，也是來自西域，在《唐詩》中吟咏胡旋舞，拓枝舞的作品相當多，且引白居易的一首咏胡旋舞的《胡旋女》如下：

胡旋女，明旋女，心應玄，手應鼓。

旋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舞已時。

<sup>10</sup> 《新唐書·西域傳·康國》

<sup>11</sup> 榮新江《從撒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此文輯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之《從撒馬爾罕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3-8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轉旋風遲。

曲終再派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

胡旋女，出康居。（下半首略）

從詩中很清楚看出來，胡旋舞來自康居，所謂「康居」是漢代的名稱，唐代是昭武九姓康國，其地當今中亞撒馬爾罕一帶，康國是昭武九姓諸國的首領，其聚居地與漢代康居略為接近，隋唐時習以康居稱之，胡旋舞的重點在旋轉，男女都可以跳，相傳楊貴妃，安祿山都善於舞胡旋，至於拓枝舞是指流行於拓枝（即昭武九姓的石國，今中亞塔什干，古代或做拓羯，赭時，其人來華後多以石為姓）的一種舞蹈，是以跳躍、踢腿為主的舞蹈，唐人咏拓枝的詩作也相當多，詩人張祜曾有一首《感王將軍拓枝妓歿》的詩：

寂寞春風舊拓枝，舞人休唱曲休停。

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

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

今來座上偏惆悵，曾是堂上叫做時。

至於善彈琵琶的高手，如曹剛、曹善才（均來自中亞曹國），寫實派畫家曹文家（也是來曹國），以其寫實的畫風，與吳道子的寫實畫風各擅勝場，又而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的佳評。宋代的書法家也是大畫家米芾，其先人也是來自中亞的米國，試想如果這些藝術家不曾來到中國，中國的藝術將何其單調。如果從心靈層面的宗教信仰看，如瑣羅亞斯德教（傳入中國後稱祆教或火祆教）佛教、基督教（聶思托里斯教派，傳入中國後成為景教），摩尼教（傳入中國後或稱拜火教，宋朝以後稱明教），伊斯蘭教（元時稱也里可溫，之後稱回教）等，也都是經過西域傳入中國，對中國的思維邏輯產生極大影響，佛教的傳入孕育唐宋的理學家，其影響所及至今猶存，從以上所述，雖極簡略，但已是凸顯絲綢之路對促進東西交流，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 叁、西域現況

上文曾提到西域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之西域，指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義之西域則擴及今中亞五國，甚至更遠之西方整個西域之早住民族與後來的是民族有很大的不同。西域的早住民族是操兩種吐火羅語的高加索種（即俗稱的白種人）民族<sup>12</sup>，事實上土地是固定不動的，而人（民族）是會遷徙的，所以土地從來不屬於人（民族），人（民族）只是土地的過客，匈奴強大時，匈奴進入西域，兩漢伐匈奴後，漢人進入西域，尤其是東漢竇憲大舉伐北匈奴，北匈奴崩解，部分進入今新疆天山南麓，龜茲建立悅般國，到北魏時又有二十多萬人，同時柔然、高車及稍後的突厥，嚙噠等民族都有先後遷入狹、廣義之西域，西元九世紀中葉，原在大漠南北的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汗國擊破<sup>13</sup>，回紇之眾四處逃亡，其中部分逃往高昌，稱高昌回紇或稱西州回紇（唐滅麴氏高昌王國後，將之設為西州，故又稱西州回紇，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之後向南疆及綠洲遷徙，可能是旁特勤這一支及其後人建立的喀喇罕汗國<sup>14</sup>，統治狹、廣義的西域，西元 12 世紀初葉，契丹族的遼被女真族的金攻滅，有遼宗室耶律火石率少數兵馬進入西域，建立喀喇契丹王朝（漢文史料稱之為西遼），取代喀喇罕汗國統領西域，於是許多契丹族、高麗人、漢人遷往西域，十三世紀初，蒙古帝國崛起，先滅西遼，成吉思汗更親統大軍攻滅花剌子模，稍早以今新疆封其第三子窩闊台建立為窩闊台汗國，攻滅花剌子模後，又以今中亞兩河之間地，封其次子建立為察哈台汗國，於蒙古族大量進入狹、廣義之西域，尤其在天山北麓更是漠西蒙古額魯特四部聚居之所<sup>15</sup>，其中準噶爾部獨強於北疆，清入關之初對之莫可奈何，準噶

<sup>12</sup> 關於西域早住民族操吐火羅語及吐火羅分為兩種方言，可參見法，謝閣蘭、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另王欣《吐火羅史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 2000 年。此外林梅村《絲綢之路上的古代語言概述》一文，此文輯入林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認為吐火羅語有三、四種方言，見上引書頁 134-1350

<sup>13</sup> 黠戛斯係唐代之稱謂，漢時堅昆，元時稱吉利吉思，即今吉利吉思，在今中國境內者稱柯爾克孜。

<sup>14</sup> 見魏良《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sup>15</sup> 額魯特或作厄魯特，初為衛拉特，明時稱瓦剌，係蒙古別支，元帝退居大漠後，力量漸強，分為準噶爾、土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四部，十七世紀初，準噶爾部獨強，於是土爾扈特西徙裏海北岸駐牧，和碩特東徙青海，天山北路遂由準噶爾部

爾部噶爾丹曾在西藏出家為喇嘛，待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死（噶爾丹係其子），五世達賴喇嘛立命噶爾丹返回準噶爾丹爭奪首領之位，並給予「博碩克圖汗」名號，用於增加其聲望<sup>16</sup>，之後再五世達賴喇嘛唆使下入侵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曾三度御駕親征，準噶爾丹兵敗病死<sup>17</sup>，繼之而起者為策旺阿剌布坦，噶爾丹策零、阿穆爾薩那等相繼為亂，至乾隆時使徹底剿滅準噶爾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定名為新疆。

### 一、新疆之現代化

乾隆將天山南北納為版圖號之為新疆，依其地理與民族之特殊，並不推行與內地一致的行省制，又基於清代採行邊疆地區民族與中國主體民族—漢人的民族隔離政策，在新疆實施形制特殊的軍府制度，嚴禁新疆維、哈各民族與漢人來往交流，不許新疆維、哈各族學習漢語文，也未在新疆從事基礎建設，推行教育等，使新疆與內地各省有了頗大差距，在新疆地區以維吾爾族為主體民族，但以其語言文、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都與內地人漢人不同，又因新疆位處亞洲大陸心臟地帶，若能掌握新疆，等同能控制整個亞洲大陸，因而至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就招致帝國主義者覬覦，使新疆與內地存有相當隔閡，而自民國肇造伊始以至抗戰末期，新疆始終在軍閥割據之下<sup>18</sup>，使中央的邊疆政策無法在新疆推行，益使新疆維、哈各族對中央產生疏離感，外有帝國主義者蠱惑其脫離中國之拉力，內有與中央疏離是離心力，因此在此五十多年間，新疆在名義上雖是中國領土，但中央對新疆毫無著力之處，及至 1944 年（民國三十三年）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是將政權交回中央，但此時在外力支持下的「三區革

所獨占。

<sup>16</sup> 時為 1678 年（清康熙十七年）見王力著《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族諸部互動關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1 年

<sup>17</sup> 清官方文獻多稱兵敗自殺《康口實錄》，如魏源《聖武記》等，但實為兵敗困病而死，詳見呂一燃《噶爾丹「服毒自殺」說辨偽》一文，文輯入《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66-70，另俄人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也指因病而死。

<sup>18</sup> 民國肇建之後，新疆先後由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所統治，楊氏治新十七年尚稱平和，但也無建樹；金氏治新五年，頗事剝削；盛氏治新之十年殺戮甚多，但也略有建設，唯一一所大專即為盛氏所創設。

命」<sup>19</sup>也如火如荼展開，民國政府以時任蒙藏委員會的委員長胡忠信為新疆省主席，對三區之動亂仍無法力狂瀾，僅一年餘就離職，由張治中繼任省主席，之後又先後推薦麥斯武德、包爾漢為新疆省主席，此時國共內戰正熾，民國政府敗象日顯，中共建政已指日可待，1949年9月25、26日，新疆駐軍、新疆省政府先後通電「起義」，中共「和平解放」新疆，新疆進入另一局面。

中共建政後，將原在新疆的國軍及入疆的中共解放軍，就地改設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事就地生產建設，經過半個多世紀，新疆經濟有極大改變，茲以2008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產業結構與2000年作一比較，第一產業在全區產業結構中佔16.4%，比2000年下降4.7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為49.7%，較2000年上升2.7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為33.9%，較2000年下降5.6個百分點<sup>20</sup>。這種產業結構大致上還算正常，不過第三產業2008年較2000年下降5.6個百分點，很值得探究其原因所在，一般而言，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第一產業是逐年降低比重，而第三產業這應是逐年提高其比重，而今在新疆的情況，則是第三產業在八年中下降5.6個百分點，是否與新疆社會動亂有關，深值思考。

在基礎建設方面，交通事業包括鐵、公路、航空、電信的方面的建設最為突出，其中以蘭新高鐵最具意義，此一高速鐵路自甘肅蘭州至新疆烏魯木齊，全長1776公里，至目前為止（2016年）為全世界最長的一條一次性建設完成的高鐵，時速250公里，已於2014年6月3日試行，並於同年底正式通車<sup>21</sup>，此一高鐵通車對內有助西部大開發，使之更上層樓，對外如跨境高鐵發展順利，來自新疆一路向西，有利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尤其中亞五國自脫離蘇聯後，經濟始終落後，而中共要發展新疆，向西比向東更容易收效，而且自古以來新疆（西域）就是東西交流畢經交流必經之地，無論文化、經貿都薈萃於新疆，因而有了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透過新疆把歐、亞連結起來，使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廣、狹義的

<sup>19</sup> 所謂「三區革命」是指伊犁、阿勒泰、塔城三區少數維、哈人在外力外支持下，欲脫離中國建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sup>20</sup> 此一數據取自《新疆簡讀》編委會，《新疆簡讀》，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98-100

<sup>21</sup> 見2014年6月30日台北《中國時報》A13版

西域)得以繁榮,使大陸東西部可以均衡發展,同樣也帶動中亞(廣義西域)的經濟發展。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據大陸較新資料,截至 2011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口為兩千零四十二萬人,全區面積約為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尚不足三人<sup>22</sup>,基本上還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雖然南疆塔里木盆地有塔克拉馬干沙漠,但據學者研究指稱,羅布泊地區底下有豐富的地下水源<sup>23</sup>,設若此事資訊可靠,則新疆未來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如何促進新疆現代化,就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能否成功的關鍵點,在促成新疆現代化過程中,更要注意新疆各民族的和諧問題。

## 二、中亞五國的獨立與困境

中亞地區大致指錫爾、阿姆兩河流域而言,在西突厥汗國建立前,該地區早住民族大致上以泛塞種的栗特人為主,(據今學者考證,西遷的大月氏、烏孫也為泛塞種民族、吐火羅落人也屬塞種),但西突厥汗國統治狹、廣義的西域後,整個中亞地區民族結構有了極大變化,突厥語言、習俗等,成為中亞地區的主流文化。

西元九世紀中葉,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破後,回紇之眾向西進入西域,建立西州回紇政權(或作高昌回紇),其龐特勤之眾更向西建立喀拉罕汗國,統一廣、狹義之西域,因此操突厥語系各民族遂成為中亞地區的主體民族,無論其為栗特人,以月氏為統治者,昭武九姓,或者是突厥化後的中亞各民族、各政權,自漢唐以至清代都有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直到 18 世紀,中亞哈薩克三帳、東西布魯特中國的清政權維持極友好的關係,其後俄羅斯崛起,大肆向外擴張,中亞地區漸次被俄羅斯所控制,蘇聯成立後,更將之設為哈薩克、烏孜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及塔吉克五個加盟共和國,直到 20 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後,這五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才算真正獨立,這五國正好位處歐亞之間,也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雖然擺脫了前蘇聯的控制,但是也是去了蘇聯集體計劃經濟體系的支援,中亞五國經濟情況可說是一片蕭條,中亞五國與新疆緊臨,中亞不

<sup>22</sup>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圖冊》,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11 年,頁 2

<sup>23</sup> 穆舜英《千古之迷·樓蘭》,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90



穩，新疆必受影響，北京自是不能坐視不管，遂主動發起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或 S C O」總部設於上海，除中國大陸外，參加者有：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與俄羅斯等國<sup>24</sup>，另有，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白俄羅斯、外蒙古等均為觀察員，當然上合組織最主要的是由中國主導，畢竟無論廣、狹義的西域、都與總共有極密切的關係。

雖然有了上合組織，但這個組織基本上是經貿合作為主，一時之間中亞五國地區，在政治、軍事上形成真空狀態，俄羅斯固然想重新掌控中亞地區，世界超級強國美國更認為此刻是美國力量進入中亞的最佳時機，於是都各自發揮其影響力，勾結中亞五國一些野心份子製造動亂，如 2005 年 3 月吉爾吉斯發生暴亂，推翻總統阿卡耶夫，搶劫其家族所經營的企業，一些中國人（含漢人，維吾爾人）的產業也受到波及，十名中國人在動亂中受傷，北京也立刻啟動救援機制，派飛機將在吉國的中國人接回<sup>25</sup>。雖然此次動亂後來被敕平，但整個中亞地區仍然處於外弛內張的情勢之中，世界霸權國家絕不肯放過能夠進入中亞的機會，果然到了 2010 年 4 月初，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又發生大規模的暴動事件，造成至少 180 人死傷，其副總理遭擄<sup>26</sup>。中亞的不穩定，中國大陸新疆地區必然會受到影響，因此，中共對中亞地自然要付出極大的關注，也因此須強化上合會組織的功能，2010 年 6 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出席在哈薩克舉行的上合會組織的年度高峰會<sup>27</sup>。中亞政治、經濟均未上軌道，但其地下資源又極豐碩，自易引起強權國家的覬覦，此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因此，中亞目前的情況最需要的是政治安定、發展經濟。

<sup>24</sup> 「上海合作組織」初於以 1996 年 4 月 26 日，由中國與俄羅斯發起，邀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共五國元首在上海成立「上海五國」論壇，之後逐漸發展成為上海合作組織，參加國家逐漸增多，但土庫曼始終未曾加入，但陸以正先生於其所撰《土庫曼總統輕鬆連任》一文，（見 2012 年 2 月 20 日，台北《聯合報》A15 版，稱上合組織有土庫曼加入，可能有誤。

<sup>25</sup> 見 2005 年 3 月 31 日，台北《聯合報》，13 版

<sup>26</sup> 此次暴亂詳情，可參見 2010 年 4 月 8 日，台北《自由時報》A15 版；《中國時報》A2 版；《聯合報》，A15 版；《聯合晚報》A7 版

<sup>27</sup> 見 2010 年 6 月 20 日，《中國時報》A15 版，由陸以正具名指出《胡錦濤的外交之旅》專文。在此專文中明白指上合組織土庫曼並未參與。

## 肆、絲路前景璀璨樂觀

### 一、中國大陸和平崛起

中國大陸經文革之後，由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並以韜光養晦埋首發展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以中國民族刻苦勤勉努力創新的精神，大陸的經濟突飛猛進，從早期的世界工廠，已經進化為世界市場，在 2013 年其經濟規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實力提升了在國際政治舞台的發言權，2015 年首創「金磚四國」這個概念，高盛資產管理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歐尼爾（Jim O'Neill）預估中國大陸在 2027 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sup>28</sup>，但是由於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戰略後，顯然會提前達到此一目標，據相關媒體報導，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此一大戰略後，於 2015 年 3 月 28 日公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和行動》方案，大陸各地對「一帶一路」擬建或在建的基礎建設規模已達一兆零四百萬人民幣，2015 年更將投入四千億人民幣<sup>29</sup>，投入既如此龐大，相信大陸的高層領導及財經乃至戰略專家必然經過縝密嚴謹的評估，認定會有可觀的投資報酬率，否則不會貿然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所謂投資報酬率，當然不限於有形的金錢，還包括強化大陸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活化新疆與內地、中亞乃至歐洲的物質雙向流通，抑有甚者更可以強化大陸西部地區的國防力量，不只如此絲綢之路經濟帶一旦啟動，中亞地區與大陸的各種關係必將更為緊密，尤其能源等戰略資源的運送，更能獲得保障，以往大陸油氣、礦產等戰略資源，主要是透過海路運輸，當絲綢之路經濟帶完成後，增加戰略運送平台，這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極重要的一項「附加價值」；此外，絲綢之路經濟帶一旦完成，等同將太平洋西岸與大西洋東岸之間的歐亞大陸連接成一個人自主的完整的經濟體，不再受美國的宰制，這才是「一帶一路」最大的戰略意義。當然「一帶一路」也有其風險之處，就目前的資訊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大陸西安向西經蘭州、烏魯木齊、霍爾果斯進入中亞阿拉木圖、比什凱克、杜尚別、

<sup>28</sup> 見 2015 年 4 月 9 日，台北《旺報》A6 版

<sup>29</sup> 見 2015 年 4 月 11 日，台北《旺報》A7 版

撒馬爾罕、德黑蘭、伊斯坦堡，然後向北經莫斯科，再向西經杜伊斯堡到鹿特丹，在折向東南止於威尼斯<sup>30</sup>，以地區國家而言，涵蓋中亞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克四國，中東的伊朗、土耳其；歐洲的俄羅斯、德國、荷蘭、義大利，其中伊斯蘭文化圈占相當大份量，近年以來整個伊斯蘭地區頗平靜，大陸如何在這動盪不安地區推行「絲綢之路經濟帶」，正考驗中共高層領導的政治智慧。縱或如此，客觀情勢仍有利中共，因為陸上絲路所經之處，並無大陸，且多為伊斯蘭地區，無論其為遜尼派或是什葉派執政，基本上都與以色列站在對立面，美國又是以色列最大靠山，而中共在中亞、中東、南亞都有盟友，如伊朗、巴基斯坦，因此大環境雖然複雜，中共仍有著力之處，更主要的是世界超級霸權國家美國很難插手攪和，這就是給中共揮灑空間，如 201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巴基斯坦時，雙方簽署四百六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兆四千二百億元）的合作計劃<sup>31</sup>，此一合作計劃主要是建設中巴間長達三千公里的經濟走廊，重新疆穿過巴基斯坦及於阿拉伯海的瓜爾達港，這對中國大陸而言，等於打通進入印度洋的通路，美、日對西太平洋的島鏈封鎖將完全失效，從以上所敘，可看出中共確實在和平環境中崛起。

## 二、絲綢之路前景璀璨令人期待

歐亞大陸本為一體，但是有史以來很少聯成一體，最早西方的亞歷山大曾努力過，但其自西向東只及於阿姆河南岸的巴克特里亞，稍後中國的張騫曾「鑿空」西域，也踏上立國於巴克特里亞的大月氏國，使歐亞訊息有了互通的機會西元 7 世紀，大唐盛世時，曾把中亞昭武九姓諸國列為中國的羈縻州府，西元十二世紀中國的契丹族耶律大石曾在中亞建西遼帝國（西方史料則稱之為喀喇契丹），以上這些都未能真正把歐亞大陸連成一氣，直到十三世紀蒙古興起，鐵木真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伊克、蒙兀兒、烏魯斯）才把歐亞大陸納入大蒙古國及其所屬各汗國統治之下，此時歐亞之間大為暢通，然為時甚短，成吉思汗死後，三個汗國就各自為政，（窩闊台入嗣大統，其汗國自然消失，所以實際上只有二個汗國…金帳或

<sup>30</sup> 見 2015 年 3 月 29 日，台北《旺報》，A3 版，同日《蘋果日報》A17 版

<sup>31</sup> 見 2015 年 4 月 18 日，台北《中國時報》A14 版，同日《聯合報》A14 版

欽察汗國及察哈台汗國），及至蒙哥出任大可汗時，命其同胞弟旭烈兀西征波斯，（今中東、敘利亞一帶），建立伊兒（或作伊利）汗國，只有此一汗國與稍後由旭烈兀胞兄忽必烈所建的元朝保持隸屬關係<sup>32</sup>，事實上蒙古的是四個汗國從未同時存在，而元朝也從未統治四大汗國，這一點以往多被忽略，因此歐、亞陸路大通的時代為時短暫，如此中國大陸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直白的就是要打通歐亞之間的路上交通，完成歷史上未竟之功，要打通這一條綿長的歐亞路上通道，以當前的科技並無難處，但是需要龐大的資金，因此中國發起設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成為一車之雙輪，相輔相成，使「一帶一路」成為可以實現的理想，尤其英、法、德等國家不顧美國的阻擾於 2015 年 3 月 12 日宣布加入亞投行<sup>33</sup>，從而使亞投行的創始會員過有了五十七國之多，在聲勢上已可與世銀、亞銀鼎足而三，而路上絲綢之路所經國家，絕大多數基礎設施亟待建設或有待加強，從而可以預見亞投行前景值得期待。

據此間媒體報導，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洽談建立「中巴經濟走廊」，大陸將投資四百六十億美元<sup>34</sup>，一旦合作成功，大陸的貨物可以從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進入印度洋，反過來非洲、西亞的產品，也可以透過瓜達爾港輸入大陸，這將使美日、日在太平洋的封鎖失效，設若此項計劃了付諸實現，則中國大陸將可由印度洋通過紅海進入地中海，美國的「亞洲再平衡」將毫無意義，也因此美國近年來不斷聯合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希望在南中國海製造事端，企圖中菲、中日或中越能打上一戰，一方面消耗中國國力，另一方面可實測中國軍力到底如何，但中國大陸領導人未必會上這個當，美國的算盤可能白打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前景依然璀璨令人期待。

## 伍、結語

絲綢之路有其悠久的歷史，之後因海上航運的興起漸趨沒落，18 世紀以後，俄羅斯佔領了中亞地區，絲綢之路形同停擺，上世紀末前蘇聯解

<sup>32</sup> 劉近勝《察哈台汗國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2006 年，及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sup>33</sup> 見 2015 年 3 月 25 日，台北《聯合報》，A2 版《社論》

<sup>34</sup> 2015 年 4 月 18 日，台北《聯合報》，A14 版

體，中亞五國宣布獨立，中國大陸趁機與中亞五國建立和平友好關係，彼此貿易大見增長，之後倡議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為古絲綢之路恢復露出曙光，2013 年中國大陸習主席提出一帶一路計劃，據估計一帶一路經濟效益覆蓋四十四億人口，會成為全世界最長經濟走廊，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將超過二十一兆美元<sup>35</sup>，這是一個龐大的商機，自然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注意與投入，同時也引起美、日的不安與干擾，必然會煽動若干國家抵制一帶一路計劃，但在重大經濟誘因下，美、日的小動作恐將徒勞無功，不過中國大陸為減少鄰國的疑慮，似可以宣布不擴張、不稱霸，純以和平方式推動一帶一路，不過仍需注意國際恐怖攻擊事件，必須加大力度維穩，增加參與國家信心。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面對如此龐大的商機，理應抓緊機會積極參與，從為疲弱多年的經濟注入強心劑，只是在三度政黨輪替之際，如果不能妥善處理「九二共識」問題，很可能失去參與一帶一路的機會，這一點很值得朝野重視。

---

<sup>35</sup> 2015 年 4 月 11 日，台北《旺報》，A7 版

# 台灣對於絲綢之路經濟戰略的對應之策

中國邊政協會  
秘書長 林遙鵬

（本文為應邀參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中國邊疆研究所於 2016 年 11 月 16 日舉辦之《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 壹、前言

正當全球鋪天蓋地的在探討「一帶一路」對國際上可能產生無比巨大影響力的同時，有一區域性經濟體它掩住耳朵、緊閉雙眼，無視於世界正在產生巨大的經濟變化楔頭。它就是曾經叱吒世界經濟的亞洲孤島-「台灣」，這種現象來自於執政當局的冷漠與過度著重政治操作的心態。台灣在 2016 年第三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全面執政，經濟政策西進轉為全面南向，並予總統府轄下設立「新南向辦公室」<sup>1</sup>。兩岸行之有年九二共識<sup>2</sup>，受到一再否認與模糊下，兩岸交流進入冰河期，和平似乎已成絕響，台灣的經濟也受到嚴峻的挑戰，習近平的名句「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為「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中的地位下了權威註解。近期以來各團體

<sup>1</sup> 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又稱新南政辦，成立於 2016 年(民國 105 年)6 月 15 日，為中華民國政府所設立的特殊政府機構，該機關直屬於中華民國總統府。

<sup>2</sup> 九二共識是一個與台海兩岸關係有關的政治術語。這個術語指在 1992 年，台灣海峽兩岸政府授權的非官方組織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香港會談之後經由口頭協商而逐漸形成的不成文默契。但是在談判結束之時，雙方並沒有談到達成共識，在會談結束時，九二共識這個名詞也尚未出現，至於「九二共識」其實質含義為何，國共雙方的理解至今仍有部分區別。到了 2000 年 4 月 28 日，台灣時逢總統大選結束後、政權移交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蘇起首次將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連結，隨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綱。<sup>[1]</sup>2005 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歷史性訪問中國大陸，與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在公文書上使用九二共識這名稱，認為其含義是「海峽兩岸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一個中國原則在事務性商談不涉及其政治含義。」的共識，並在宣傳與教育系統中多次提到。2006 年，蘇起坦承「九二共識」為重新包裝「一中各表」所自創的名詞。<sup>[2]</sup>2008 年 5 月 26 日，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海峽交流基金會的文件中首次將九二共識應用在台灣公文書上。<sup>[3]</sup>2015 年的兩岸領導人會面中，雙方再度肯定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及共識。

不停的陳情與抗爭，政府滿意度直線下滑，此一現象著實令人擔憂。尤其大陸不再讓利的情況下，如今蔡政府的政治掛帥，置民生經濟於不顧，實令人匪夷所思。

## 貳、一帶一路概略

一帶一路若能順利推動並實現必將使國際經濟版圖與聯盟重新劃分，但其中地困難與阻礙也非常多，不過我們以現今的情勢來看這事正確的策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是由習近平主席於 2013 年出訪時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進一步推廣，成為中國當前對外的主要經濟戰略。“一帶一路”戰略範圍跨越 65 個核心國家，涵蓋面積約 5539km<sup>2</sup>，約占全球總面積的 41.3%；跨區內約 46.7 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 66.9%；區域經濟總量高達 27.4 萬億美元，占據全球經濟總量的 38.2%。“一帶一路”所跨足的 65 國中以發展中國家居多，基礎設施建設水準普遍較差，提昇空間大。很多國家缺水、缺電、缺道路，國與國之間往來不易，發展差距頗大。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成立宗旨在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體現，以資金支持亞洲各國家和地區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之開發機構，並且加強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的合作。總部設在中國北京，法定資本為 1,000 億美元，中國政府獨自出資 500 億美元<sup>3</sup>。

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有三個走向，從中國大陸出發：

- 一、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
- 二、經中亞、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
- 三、中國大陸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

<sup>3</sup>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它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我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



##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二個走向，從中國大陸出發：

- 一、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
- 二、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中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中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並試圖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四大問題。

### 一、中國的過剩產能的市場問題

過剩產能對經濟的成長造成了遲滯的問題，中國傳統的出口國導向較為單一和狹窄，美、歐與日等諸國占據出口的核心國位置，但這些傳統的出口市場已經飽和，成長空間相對減少，國內的過剩產能很難藉由他們進行降低，在中國消費加速啟動難以推進的情況下，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來開闢新的出口市場是很好的管道。中國不僅有過剩產能還有過剩外匯資產；而新興市場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不足，中國試圖利用積累的外匯儲備作為帶動全球成長的資本，也能利用資本輸出同時帶動消化過剩產能的問題。

### 二、中國的生產資源獲得問題

中國雖然有蘊藏豐富的礦產，但作為生產動能的油氣資源與部分礦產資源卻相對缺乏，大部分需仰賴進口，這些資源主要是經由中國沿海航運輸入到國內，相對風險性也大為提高。中國與其他重要資源產出國的經貿合作尚未全面化，使得資源方面的獲得不穩定。“一帶一路”戰略新增了多條有效而便捷的陸路運輸管道，對於國內生產資源獲得的不同方式，提高了許多保障。

### 三、中國強化國家安全的戰略縱深開拓的問題

中國所需的資源輸入方式現還主要是通過沿海海路，而沿海運輸直接經由許多國家海域，一旦發生戰爭航線受阻風險性極高。中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也集中於沿海地區，如果遇到外來的攻擊，整個中國會瞬時失去核心工業設施。從戰略縱深的角度來看內陸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地廣人

稀工業少，還有很大的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潛力，在戰時直接影響的威脅較低，通過“一帶一路”加強對大西部的開發，將有利於強化國家安全的戰略縱深。

#### 四、區域經濟的貿易主導權

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對中國而言，它不僅能抗衡美國所主導的試圖圍堵、孤立中國而推動 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TIP (跨大西洋貿易伙伴談判)結盟，還能有機會在一帶一路經濟戰略中搶占全球貿易新規則主導權。如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以國內外的港口為重點建設，打通重要海運路線，推動各種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對中國來講，特別是上海自貿區試驗成功後，就可以藉由上海（含寧波舟山）和泉州湄洲灣港的超級深水港為憑藉建設國際中轉港，真正帶動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掌控國際貿易主導權，定價權和資源配置權，提升自己的區域經濟影響能力。

#### 參、台灣對應之策

“一帶一路”戰略範圍跨越 65 個核心國家，涵蓋面積約 5539km<sup>2</sup>，約占全球總面積的 41.3%；跨區內約 46.7 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 66.9%；區域經濟總量高達 27.4 萬億美元，占據全球經濟總量的 38.2%。如果台灣不立刻制訂應有的對策，哪過去數十年來所積攢的經濟基礎將化為烏有，經濟將大幅倒退，至於如何因應，我試想從政府部門政策與私人企業部門二方面切入探討：

##### 一、政府部門政策

##### (一)台灣兩岸國家政策

1949 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後，從蔣介石時期的反攻大陸與漢賊不兩立，一直到馬英九執政時，兩岸關係發展，都是立基於之前的政策。從蔣經國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李登輝總統設立陸委會與海基會及戒急用忍政策，到宣布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這些都是 2000 年民進黨執政的基礎，執政期間，民進黨一直面對內，外的窘迫局面，尤其是在兩岸政策上必須面對立法院少數的現實因素<sup>4</sup>。

<sup>4</sup> 吳釗燮，2015，《民進黨八年執政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民進黨八年執政論文集，頁 2

1988 年李登輝繼位後，面對國內民主化與國際冷戰結束的兩大潮流，提出「務實外交」的外交路線，希望在國際對抗和緩的大局勢中，爭取台灣的外交空間，同時將台灣問題國際化，藉此對抗中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以國統綱領的三階段作為兩岸互動的準則，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對等的政治實體」、承認中共對於大陸的治權，建構一種特殊的兩岸關係，在策略上則以「三通」宣示換取中國在「不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放棄武力犯台」及「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等三條件上讓步<sup>5</sup>。然到 1999 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也就是「兩國論」，在兩岸政策中作了巨大之改變，也被中國大陸視為台灣走向台獨的第一步。

2000 年陳水扁上任總統時，提出「不宣布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所謂的「四不一沒有」，作為其兩岸關係基調，同時以此安撫美國。大陸政策的策略面，包括：

- 第一、將「一個中國」予以「未來化」、「議題化」與「問題化」，採迂迴、模糊手法回應；
- 第二、由「四不一沒有」到「沒有共識的共識」的試探期，進而確立否認「九二共識」，凸顯「九二精神」及強調「統合論」訴求之主軸；
- 第三、規劃「國家安全網」之兩岸交流防衛機制，但欠缺實際具體操作的步驟，致流於抽象與空洞；
- 第四、推動「小三通」、規劃「大三通」在兩岸加入 W T O 後於國際多邊架構下協商解決，意圖迴避「一中」又可復談及凸顯安全與對等；
- 第五、研議加大兩岸交流的步伐，如：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大陸科技人士來台、鬆綁「戒急用忍」及開放陸資來台，希藉善意之表示鬆緩中共對台壓力進而改善兩岸關係；
- 第六、善加運用「美國因素」，在柯林頓時期，扁政府曲意附和，用以跳脫「麻煩製造者」印象，小布希上台後，則利用美「中」關係趨緊，爭取主動及寬廣迴旋空間，以利美台關係有所提升。

但陳水扁總統於 2002 年 8 月 3 日向東京世台會年會發表視訊談話時，有二段很重要而且清晰明確說出陳水扁他自己內心對兩岸現狀的描述<sup>6</sup>：

<sup>5</sup> 吳釗燮，2015，《民進黨八年執政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民進黨八年執政論文集，頁 3

<sup>6</sup> 陳水扁總統 8 月 3 日談話全文內容內容，請參閱

第一個陳述是：「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要分清楚」。這比李登輝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接受德國之聲所提到「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的「特殊兩國論」更為明顯。

第二個陳述是：「如果有需要，台灣現狀的改變需要經公民投票」。至於什麼是「台灣現狀的改變」，根據陳水扁在講稿中的說法：「對岸中國所講的一個中國原則或一國兩制，就是對台灣現狀的改變，我們不可能接受」。

2008 年國民黨馬英九再度贏得總統選舉，馬總統的大陸政策，「兩岸和平」為其一貫主軸及核心思想，可知馬英九是渴望和平及溫和主義者。就任後致力於兩岸關係的改善與正常化，使兩岸共同走向穩定和平的發展道路上，馬總統對於兩岸關係的諸多談話，其和平理念重點表述可以歸納為七點<sup>7</sup>：

第一、唯有和平對等，才能化解兩岸僵局：

兩岸要和平發展，必須建立在善意和平對等的基礎上，方有開展與破冰的空間。

第二、和平協議會談沒有時間表：

兩岸要訂定和平協議至今仍有不少困難，這些困難需要慢慢的克服與談判，透過兩岸一次又一次的談判，和平協議方有簽署的可能。

第三、在「一中各表」的原則下擱置主權爭議，兩岸雙方就經濟與和平議題展開談判：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馬政府活路外交的具體做法，只有在「一中各表」情況下，勉為其難處理與交代兩岸目前的情況。

第四、未來兩岸協商溝通由黨與黨之間的聯繫，轉變為推動更多兩岸之間的官方溝通渠道：

馬總統未來要讓臺灣海基會與對岸海協會正常運作，以建立溝通的管道。

第五、「連胡公報」是兩岸協商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可以「連胡公報」

---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shownews.php4>.

<sup>7</sup> 邵宗海，2011，《國民黨的大陸政策馬英九的選舉承諾與兌現》，兩岸公平網四月號主題檢視國民黨的兩岸政策，頁 1-5

為起點進行協商：兩岸真正的和平是從內心開始的，馬總統和平理念是建立在「連胡公報」的基礎上。

第六、雙方互不否認做為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的開始：

馬總統務實的提出雙方互不否認主張，並且花了相當大的心力來論述，只有雙方互不否認，兩岸敵對狀態方能終止。

第七、兩岸和平，外交休兵，與「不統、不獨、不武」：

除了兩岸外交應休兵，而馬總統更一再提出「不統、不獨、不武」之三不主張，都顯示臺灣方面想要達成兩岸和平發展的理想。

2016 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執政的蔡英文政府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及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關係已呈現「斷崖式滑坡」，兩岸因政治互信不足，致關係危險等級上升，頻臨破裂隨時可能爆發危機。兩岸關係進入更加「對立、對抗、競爭」新時期，兩岸現狀維持及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從「冷和平」加速滑向「新對抗」<sup>8</sup>。

先前大陸方面涉台學者一般評估認為，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的兩岸關係總體情況，將會是「好，好不過馬英九時期；壞，壞不過陳水扁時期」；然最近評估卻有可能轉向「壞，壞過陳水扁時期」。這種評估依據主要是模糊化兩岸政策論述、拒絕接受九二共識、教育部及文化部部长任命具獨派色彩人士、廢除歷史課綱微調、造訪巴拿馬簽字稱謂「台灣總統」、東海議題與南海仲裁案是否與陸方相向、冷處理維持現狀入黨綱案<sup>9</sup>。

## (二)台灣兩岸經濟政策

台灣早在 1993 年至 2003 年間三波推動南向政策，對於與東南亞國家實質關係之發展，有顯著的影響。由於東南亞資源豐富、人口眾多且具地緣鄰近性之條件，政府因而鼓勵臺商踴躍前往開拓市場。此外，在台灣政府大陸政策大幅度開放，兩岸經貿交流日益頻繁，且我國對外投資有明顯轉移大陸趨勢之情況下，為避免對大陸過於經濟依賴，而試圖以南向政策減輕我對大陸之經濟依賴。立基於上述背景，我政府先由時任經濟部長的江丙坤於 1993 年夏天宣布要將東南亞列為未來加強投資的地區，同年 11

<sup>8</sup> 劉國深，2016，第二十五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四川成都

<sup>9</sup> 柳金財，2016，《陳水扁兩岸政策對蔡政府的啟示—遺產與負債》，台北

月公布「南進政策說帖」。南向政策當初計畫是 1993 年起以三年為期，但在第一階段後於 1996 年底經過評估決定再延長三年，並擴大範圍；之後又爲了因應東協整合趨勢，爲了保持在東南亞的競爭力又再度延長了三年。

2002 年陳水扁政府上台後也對南向有重啓的努力，2002 年副總統呂秀蓮以私人旅遊名義到印尼峇里島會晤商界人士。2006 年 5 月總統陳水扁在出訪友邦的回程，在印尼巴淡島停留過境並會晤當地剩下的 10 餘家台商。然而南向政策實質效果不高，目前東南亞中僅越南因爲地理因素有較多台商設廠，但廠區中也雇用許多中國大陸幹部主管，很多台商是投資大陸後將越南視爲副廠或減低人工成本的衛星工廠在經營<sup>10</sup>。

2008 年國民黨馬英九再度贏得總統選舉，馬英九政府雖然不以「南向政策」爲名，但在做法上，其實與前面兩屆政府並無太大差異，經貿投資仍然掛頭牌。差異最大的或許在於該政策政治意涵的降低，因爲在「活路外交」的政策指導下，臺海兩岸外交惡鬥的情況已然減少，其他的零星衝突亦少浮上檯面，因爲雙方均無意因爲外交議題而影響兩岸正常的交流<sup>11</sup>。

2016 年台灣政黨輪替後，執政的蔡英文政府重新提出新南向政策，對於經濟發展強調要展望東南亞市場，並且於總統府新設了「新南向辦公室」<sup>12</sup>。在過去三位總統任內，均有東南亞投資的政策，但設立專屬辦公室則是首次，但只提撥了 42 億新台幣的推動費用，實杯水車薪令人懷疑蔡政府的決心。

這樣的重新定位新南向政策也讓部分人士認爲，過去八年國民黨主政下，長期倚靠大陸的經濟市場模式將會發生轉變。蔡英文政府對此表示，「東南亞是不可放棄的經濟新興市場，但並不會取代大陸市場」，強調南向政策的獨立性。而對於台灣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企業界與學者雖有期許但也有懷疑。

<sup>10</sup> 陳錫藩，2002，《扁政府外交的新招》，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國安(評)091-591 號

<sup>11</sup> 黃奎博 周容卉，2014，《我國「南向政策」之回顧與影響》，展望與探索「臺商轉進越南與東南亞的挑戰與前景」座談會，頁 61-69

<sup>12</sup> 徐遵慈，2016，《新南向政策的變局與機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520 期，頁 3

## 二、私人企業部門

### (一)事業部局

從資本利得<sup>13</sup>的概念來說，資本家是否願意結清長期以來的投資從新找尋新的出路，我想這是比較困難，台商遍布世界各地且成就非凡，經營觸角延伸不但長且廣。

前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說，一帶一路的範圍相當廣闊，應先再「謀定而後動」<sup>14</sup>。台企聯榮譽總會長張漢文表示，過去「一帶一路」對台商是很陌生的概念。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於 2015 年 10 月 16 日親自掛帥，帶領台商幹部實地參訪「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商機，深入甘肅和新疆等大西北地區。陳會長帶領台商領袖了解一帶一路，並由高層領導出面講解，主要是讓台商能掌握一帶一路的機遇，當然也可以評估其中的風險，畢竟為促進台商積極參與大陸「一帶一路」大戰略，對此，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 24 日在上海台商協會周年慶時指出，這是個很好的做法，一帶一路是大陸重要的大戰略，此舉可以讓兩岸為全球發展共同做出更大的貢獻。資深台商透露，大陸密集向台商徵詢意見，並規劃兩梯次的考察路線，涵蓋大西北與大西南區塊；由於兩梯次均由陳德銘親自率團，有不少台商積極響應參加並獲致良好總結，而隨著陳德銘帶台商會長考察完一帶一路後，11 月 3 日在南京登場的兩岸最高層級民間企業界交流平台-兩岸企業家峰會，也會聚焦一帶一路，繼續為兩岸攜手一帶一路建設增溫<sup>15</sup>。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比起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台灣更具有特殊意義。大陸希望藉由海上絲綢之路的經貿投資合作連結和深化與沿線國家〈特別是東南亞〉的夥伴關係，甚至輻射到中東、歐洲和更遠的拉丁美洲地區，以利建設「海洋強國」，並因應全球化的挑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建設主要重點地區，分別是西線的東南亞、南亞，再延伸下去的歐洲國家，以及南線的南太平洋島嶼國和大洋洲的紐、澳兩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高達 30 多個國家，人口 40 億以上，約占全世界總人口 65%，以及全

<sup>13</sup> 資本利得是資本所得的一種，它是指納稅人通過出售諸如房屋、機器設備、股票、債券、商譽、商標和專利權等資本項目所獲取的毛收入，減去購入價格以後的餘額。

<sup>14</sup> 鄭仲嵐，2016 年 5 月 15 日，「林中森先生專訪」，臺北，BBC 中文網

<sup>15</sup> 羅印沖 許昌平，2015 年 9 月 25 日，「陳德銘 10 月率台商 看帶路商機」報導，北京，旺報



世界生產總值〈GDP〉的 23%<sup>16</sup>。

## (二)經濟效益

相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來說，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應更能有助創造兩岸對外投資需求，可為兩岸較具競爭優勢的產業和過剩生產能力找到新出路，兩岸企業也可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通過生產零組件而非完整產品的專業化和規模經濟進而獲致可觀效益，並在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環節發揮優勢作用<sup>17</sup>。但值得注意的是，現行兩岸經貿關係和產業分工則可能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基礎建設而瓦解，因為屆時大陸即可大量從沿線國家取得中間產品，並出口相關商品，可能衝擊台灣關鍵產品出口到大陸的比例，以及在「一帶一路」的貿易市場佔有率有被掠奪的危機。

從台商經濟效益層面來看，「一帶一路」的未來商機十分可觀，台灣的營建、運輸、農業、資訊、通訊和網路等擁有產業技術實力的企業，若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獲利機會甚大，也同時能擺脫台灣目前坐困愁城的窘境。另外，資金雄厚的台灣金融業，也會因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而獲得更大金融效益。這也是台灣經濟要「翻轉」的大好機會。

## 肆、結論

2015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舉行的「朱習會」中，習近平主席首度對台灣參與「一帶一路」釋出善意，表示願意和台灣合作、分享，優先對台灣開放，並稱「我們應該要大器一點！」。台灣參與「一帶一路」的前景光明，國內基礎建設相關企業更應該伺機而動，搶食「一帶一路」的市場大餅。中國商務部已把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定調為：繼鄧小平提出建設經濟特區、2001 年大陸加入 WTO 後的第三次改革開放戰略。而「一帶一路」戰略更是在前兩次改革開放基礎上再創光芒，而台灣政府與企業絕不能坐失大陸第三次改革開放的不世機遇。

### 一、中國發展戰略，台灣應扮演積極角色

台灣不應自外於大陸的變革，兩岸和平發展道路上，台灣應認真思考如何應對大陸的變革，想辦法參與其中，甚至影響大陸的發展進程，創造

<sup>16</sup> 吳福成，2015，《「一帶一路」戰略政策對台灣企業的機會與挑戰》，台灣經濟研究院經濟評論，台北，頁 6

<sup>17</sup> 吳福成，2015，《「一帶一路」戰略政策對台灣企業的機會與挑戰》，台灣經濟研究院經濟評論，台北，頁 7

一個更好的兩岸共同體。兩岸民族同根、文化同源，台灣經濟發展啓動爲時已久，國民所得早已超越中等收入，在大陸變革過程的此時，台灣需有自己走在對的道路和正確政策的認知當中。而大陸社會正面臨的諸多困難，都是台灣曾經歷過，並靠著台灣人經驗的協助得到解決的。台灣社會對大陸面對的變革，不應該抱持被動的消極態度，而應採取主動出擊，積極與大陸交流溝通，利用各種兩岸互動平台傳播台灣經驗，並與大陸有關方面交流探討適合兩岸中國人文化社會特點的治理模式。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都應該有這樣的自覺，那就是獨立自主思考兩岸的發展道路。

## 二、對台灣有正面影響和潛在商機

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對台灣的正面影響和商機：

### （一）可以避免遭邊緣化、有利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受制於「中國因素」，台灣很難加入東協共同體和區域全面經濟或夥伴協定等區域經濟整合，有鑒於兩岸關係良性的方向發展，目前大陸正朝著如何使兩岸經濟合作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銜接的方式，台灣若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某種程度上即可減弱「中國因素」的負面影響，更有利於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 （二）借力福建和上海自貿區可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廣大新興市場：

福建自貿區主要目的係要「面向台灣」，將作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基地。由於福建被定位為推動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核心地區，台灣企業可借力福建自貿區對接「一帶一路」，開創更廣闊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新興市場。

### （三）兩岸產業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攜手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是大陸「國發發展計畫」的延伸，從東南沿海的開放到西部大開發，再到「一帶一路」建設，台灣的資金可投資大陸西部和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民生和生產製造項目。由於電子信息產業是兩岸的強項，未來兩岸企業應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置海外新生產基地，並拓展新市場。台灣企業若能與時俱進，與大陸企業合作分工，不但有利調整產業結構，還能促提升出口貿易成長。

## 三、「一帶一路」對台灣企業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雖然一帶一路的參與能為台灣及台商帶來許多利益，但也可能種下無

法挽回的傷害。政府財經部門在準備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應先釐清「一帶一路」的產業商機和風險、沿線各國的基礎建設現況與未來發展，並具體評估台灣企業符合參與的投資項目，以利國內企業開拓亞、歐、廣大新興市場。

（一）「一帶一路」將導致台灣中間產品出口大陸和相關市場的數量減少、甚至有被替代的貿易危機：

近幾年大陸勞工成本提高，轉移產業的需求更加迫切，現行兩岸和東南亞產業分工則可能逐漸裂解，導致台灣中間產品出口大陸和國外相關市場的數量減少，最後則發生被替代的貿易危機。

（二）「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實可能衍生新一波台商的「大陸熱」：

若從投資回報率角度看，由於「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資項目都在國外，將有助於加快相關國家與大陸經濟融合，有利於大陸更便捷的從這些國家獲取資源、能源，也有利於大陸商品對這些國家輸出。而在此形勢快速發展之下，必然牽動兩岸既有的產業分工和經貿關係，甚至吸引更多台商赴大陸投資生產，並開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新興市場。這個發展過程，也可能衍生新一波台商的「大陸熱」現象。

（三）「一帶一路」可能在台灣的政經界造成困擾：

中國希望整合大陸、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能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推動形成中華經濟圈，台灣在當前政治氛圍及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下，恐難朝著此一方向發展。

# 1947~1959 年西藏情勢分析兼駁夏格巴 《藏區政治史》

孟鴻

輔仁大學前兼任教授

## 摘要

自遜清季世以來，俄英為競逐中亞，見西藏具高屋建瓴地緣優勢，如能控制西藏，即可進軍中亞，由是先後派出間諜入藏，蠱惑、煽動十三世達賴喇嘛及藏地僧俗高層，而清廷所派駐藏大臣類多尸位而已，致為藏人譏為熬茶大臣，於是藏事日蹙，以致難以收拾，其中固有邊臣疆吏瞞頂而尸位者，而朝廷也昧於邊事，及至民國時代，北洋政府忙於處理外蒙古問題，對藏事似已力絀，及至北伐完成始著手于藏事，西藏與中央稍有接觸；藏地本身派系頗多，自 1908 年十三世達賴返藏之後與中央之關係大壞，清廷乃出手懲治，達賴又逃往印度，自此遂決心背叛中國；英印政府早已欲染指西藏，用力至勤，十九世紀中葉新興帝國霸權主義美國開始介入藏事。藏事有此三個複雜因素，頗難收拾，茲就 1947 年藏地原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被毒害而死，至 1959 年「四水六嶺衛教軍」向十四世達賴獻「金寶座」之十三年間，在中央有國民政府之敗逃台灣、中共之建政北京，誓言進兵西藏，驅逐帝國主義殘餘勢力，美國情報單位開始介入藏事，其間發生頗多事件，本文將之作一分析。

**關鍵字：**熱振呼圖克圖、泛亞洲會議、商務考察團、  
拉薩動亂

## 壹、概說

吐蕃王朝崛起於七世紀，初期兩個世紀確實非常壯盛，唐朝曾兩度與之和親，其時吐蕃不僅足以與大唐分廷抗禮，更與大唐競逐西域，奪得河湟攻取甘涼，更一度攻下長安，此為吐蕃之極盛時期，及至九世紀中葉，朗達瑪起而滅佛，吐蕃陷入混亂，其後朗達瑪雖被刺而死，吐蕃已非昔日之吐蕃，陷入分崩離析狀態，雖再度興佛，但已非昔日之純佛教，學界雖稱之為「後弘期」佛教，或稱之為密教，帶有神密色彩，且倡言「雙修」，而有色情成分，密教自身吸納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之炫術（或作幻術），及色情成分，幾乎已到匪夷所思毫無忌憚地步，摩尼教對「性」之觀念與作法，可參看芮傳明所著《東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4，由於對倫常之描述過於淫穢，此處不予引錄），後弘期的密教，既已違背正統佛教之戒律，已非佛教，其理自明，稱之為喇嘛教，乃是順理成章之事，德國學者克林凱特曾於其著《絲綢古道上的文化》一書中明白指出：

「……這一點表現在密教的產生，這個教反映了晚期印度佛教的特點，它含有色情成分和令人恐懼的神仙，這也就是構成西藏佛教的主要因素。」<sup>1</sup>

這一段描述對喇嘛教的色情成分，指出其來有自，而美國人拉鐵摩爾也於其所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更明白地指出：

「喇嘛教是一種摻和著佛教及若干景教與摩尼教教義的混合宗教。」<sup>2</sup>

吐蕃自此陷於分裂狀況，各部落頭人自立為政，而互不統屬，中原自唐武宗李炎於其會昌五年（845年）下滅佛令後（武宗之滅佛，與吐蕃朗達瑪之滅佛僅相差四年，兩者是否有連帶關係，頗值探討），大唐漸趨沒落，半個多世紀後，契丹崛起於東北松漠之間，党項壯大於西北河湟甘涼，未幾入五代十國，最後雖由趙宋承繼大統，但契丹之遼、党項之西夏與宋鼎

<sup>1</sup> 《絲綢古道上的文化》由趙崇民漢譯、賈應逸審校，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上引文字見頁157。

<sup>2</sup> 此書係由唐曉峰漢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引文字見頁53。

足而立，似可視為第二次南北朝對峙，其時吐蕃也是各地方政權林立，此種情況沿續兩個半世紀左右，直到蒙古崛起（其間女真之金取代遼，仍然是南宋、西夏、金三足鼎立）滅西夏、金，情況始全然改觀，蒙古成吉思汗於 1227 年攻滅西夏，同年成吉思汗卒，由窩闊台嗣立為蒙古大汗，命闊端討伐今青海、西康（現為四川省西部金沙江以東地區）、西藏地區之眾多吐蕃地方政權，眾吐蕃鑑於蒙古鐵騎所到之處無堅不摧，為免生靈塗炭，喇嘛教各教派首領會商後，認為唯有投降蒙古，始能免於屠殺，乃由薩迦派首領到涼州與蒙古闊端洽商投降事宜，蒙古見眾多之吐蕃，遂稱之為吐蕃特（按蒙古語複數，在尾音加「特」音），或作圖伯特，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之侄八思巴受忽必烈賞識，迨忽必烈建立元朝，正式將吐蕃（即今西藏）納入中國版圖，並命薩迦派之八思巴為吐蕃政教之主，今日流亡海外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妄稱元朝係蒙古族所建，不是中國，此乃無知之說法，試問古往今來可曾有一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得由漢人統治，始得稱為中國，如由非漢人統治，則不是中國。此種說法全然是美、歐、日帝國主義者意圖分化、裂解中國之認定，何況所謂「漢人」，其最初即是由華夏、東夷、荆吳、百越四大系民族融合而成，關於此點任何中外學者所著有關中國民族志（史）之書，都有明白之說明，自漢代以後，更不停吸納周邊各民族，形成不同時代之漢人，因此越至近代漢人之內涵越多元，此乃史實，因此元朝雖由蒙古族所建，其為中國正統王朝，實無可置疑，何況先於元朝者有鮮卑拓跋部之北魏，鮮卑宇文部之北周、契丹之遼朝、女真之金朝；後於元朝之女真清朝，無一不是中國之正統王朝（以其各有一部或兩部正史傳世），至於未留下正史者如諸胡列國、西夏……無一不是中國史上的政權或王朝，指元朝非中國，不僅無知，乃是別有用心。因此十三世紀時，吐蕃為中國領土，乃是無可置疑之史實。

至於明朝，就史論事，確實未曾統治今日之西藏，但吐蕃喇嘛教各教派首領，無不接受明朝之封號，此等封號至今仍在沿用，如噶舉派之大寶法王，即為明代所封，此也為無可否定之史實，及至清代，無論從何種角度看，至遲在雍正時，已派大臣駐藏，處理藏地政務，在西藏重要地點派軍駐防，達賴、班禪轉世靈童之選定需經清廷核定……等，凡此均證明至晚在清雍正（1723~1735 年在位）時，西藏已不折不扣是中國領土，十四

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爲博取外人支持，或迎合美歐日分化、裂解中國（指文化、歷史之中國，以下所有中國均如是，不另加註）心態，一再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純然是不符史實的謊言。

有清一代之民族政策，主要是採取民族隔離政策，禁止藏族、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各邊疆民族與構成中國主體民族漢人接觸、交流<sup>3</sup>，同時掌管邊政的機構及派駐邊地駐防或管理的官員，都不用漢人<sup>4</sup>使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國主體民族漢人失去交融機會，產生隔閡，而清朝享祚長達二百八十多年，造成邊疆民族缺乏國族認同，以致辛亥革命清帝宣布退位後，外蒙古、西藏立即與中央脫節，外人之蠱惑誘擄固爲主要原因，而有清一代錯誤之民族隔離政策，更難辭其咎。

自民國元年以至民國二十二年（1912~1933 年），西藏始終在英印政府操縱下，與中央若即若離，1933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藏中依傳統慣例推舉四大林出身之活佛爲攝政，並電告中央，當時所推之攝政爲錫德林之熱振呼圖克圖，此人有意與中央展開良性互動，而中央也適時派大員黃慕松入藏致祭<sup>5</sup>，熱振呼圖克圖也意識到，英印之蠱惑誘擄，其目的只在鼓動西藏脫離中國，英帝國並不會「照顧」西藏人民，只要看英國如何壓制、剝削印度人民，就可瞭解親英之下場爲何，因此在熱振攝政期間，西藏與中央的關係頗有改善，也順利覓妥十三世達賴喇嘛之轉世靈童，也經民國政府同意免於掣簽，更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與熱振活佛共同辦理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藏事如此發展，原可大幅增進西藏與中央關係，但英帝國不甘就此放手讓西藏重回中國懷抱，鼓動藏地親英分子，繼續從事分化工作，偏偏熱振活佛相信子平之學命相之術，認爲 1941 年歲次藏曆鐵蛇年（民國三十年）將有不利事件，應先行避位，返回熱振寺閉關，遂舉老邁昏聩之打扎阿旺松繞土多丹貝堅贊小活佛，代行攝政，侍「厄運」過後，再行復位，乃於 1940 年暫辭攝政之位，此舉正合親英分

<sup>3</sup> 見《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

<sup>4</sup> 見章伯鋒《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余梓東《清代民族政策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年。另見劉學鈺《論清代邊政之得失》，該文輯入劉著《唐代以來的邊疆政策》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 年。

<sup>5</sup> 有關黃慕松入藏致祭詳情，請參見崔保新《西藏 1934——黃慕松奉使西藏實錄》，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 年。

子之意，打扎於 1941 年正月出任代理攝政，從此倒行逆施，諸親英分子重賄打扎（出家喇嘛理應四大皆空，居然受賄，可見六根不淨），從此親英分子紛紛躍上檯面，把持西藏地方政府，不僅阻斷熱振呼圖克圖復出之路，更想方設法，置熱振活佛於死地，本文擬就熱振之死，至十四世達賴出逃，其間所發生之事作一敘述。

## 貳、熱振呼圖克圖之死

依藏地喇嘛教格魯派傳統，一旦達賴喇嘛圓寂，必須推舉攝政，負責尋找達賴之呼畢勒罕（即轉世靈童），並代行達賴政教大權，直到新達賴成年親政時，始交出政教兩權，如新達賴未成年就圓寂，則攝政仍可繼續尋訪靈童代攝政教兩權，從而可知「攝政」一職極其重要，從某個面向看，「攝政」統治藏地的期程，未必短於達賴喇嘛，如第九世達賴（1805~1815 年），第十一世（1838~1855 年）、第十二世（1856~1875 年）都未及親政就圓寂了，第十世達賴（1816~1837 年），雖已成年親政，但僅親政不及兩年就圓寂了，一直到十三世達賴年滿二十（1896 年）親政，這九十多年間，藏地政教兩權都由攝政掌控，可見攝政一職之重要性，藏地傳統重視階級與出身，因此對攝政的出身就特別講究，以四大叢林（寺院）出身的活佛為主，所謂四大林是指丹吉林的第穆呼圖克圖世系、錫德林的熱振呼圖克圖世系、策墨林呼圖克圖世系及功德林呼圖克圖世系。不過從既往的歷史看，擔任過攝政的呼圖克圖似乎都沒有好下場，如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前的攝政是丹吉林第八世第穆呼圖克圖，十三世達賴親政後指稱第穆送了一雙靴子給十三世達賴，達賴穿上後「立即流鼻血，不知何故，頗為疑惑」<sup>6</sup>，於是經過審訊，第穆承認是他在這雙靴子底縫中放了一張紙條，上頭書寫有呈輪形的閻羅王命根咒，符咒上有勾召火鼠年出生的土登嘉措之字樣。」（見《藏區政治史》頁 48，土登嘉措係十三世達賴之名號），因此將第穆判定在丹吉林寺辯經場建新屋，囚禁在內終生閉關，不得同外人聯繫，等於活活餓死（見孫炯《西藏舊事》頁 50），但美國學者梅·戈爾斯坦則稱「把第穆浸泡在丹吉林寺內一個

<sup>6</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48，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漢譯本。孫炯《西藏舊事》，中國社科出版社，2010 年，頁 49 作「達賴穿上後感到心神不寧」



巨大的銅水桶裡活活淹死的。」<sup>7</sup>可見無論達賴、活佛、喇嘛殺起人來其手法是多樣化的。如果從另一角度看，如果第穆呼圖克圖果真是送給十三世達賴靴子底縫中塞入一張符咒的字條，那說明喇嘛教仍具有巫術成份，如果喇嘛教還堅稱是佛教，佛教根本不作興符咒這一類事，如是，則第穆事件是被栽贓的，是爲了要除去第穆，而把符咒的字條放在靴子底縫裡，而後栽贓爲第穆所爲，看來喇嘛教羅織栽贓的技巧，也相當高明。

儘管歷來攝政下場都不好，但是從既有文獻上看，還沒看到一個呼圖克圖拒絕出任攝政的，畢竟攝政所擁有的權力，以及因權力所能得到的財富太以誘人，雖是「活的佛」，仍然躲不過名韁利索的綑綁，一旦被推舉爲攝政，無不欣然就任，帶著親屬親信，占據有利的「位子」，謀取其所欲求者。十三世達賴圓寂後，熱振呼圖克圖被推舉爲攝政，他年事尚輕，但是卻意識意到前此十三世達賴被親英群小所包圍，一面倒向英印而與中央疏離，與西藏傳統有違，且深知自雍正將西藏納入版圖後，以至十三世達賴圓寂，無論中央是滿清執政，或民國執政，對西藏只有付出，不求獲取，因此頗以親英爲非是，在西藏地方政壇上革除一批親英分子，所有手段沿用西藏傳統頗爲殘忍之刑罰如挖眼、剜鼻、放逐等方式，可見在喇嘛教裡，似乎與慈悲絕緣，可笑的是十四世達賴流亡海外後，游走各國時大肆宣揚慈悲與智慧，只是當他舉辦「法會」時，手持人脛骨做成的「法器」，難道慈悲就在人的脛骨上？這且拋下不說。熱振活佛排除親英分子，目標絕對正確，然而此舉卻引起親英分子之不滿，幕後之英國更不欲多年之侵略所得付諸東流，乃暗中陰謀進行報復（見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215），許多陰謀遂在暗中活動。

西藏地方政壇有一特殊現象，往往將計畫中之事，先透過耳語，使之形成謠言，甚至歌謠，使謠言中之人物心驚膽顫，1940年，拉薩街頭出現一種謠言，指稱熱振呼圖克圖自1941年起將有三年災難，必需避開權位、閉關靜修，始能免災，當時熱振不過二十多歲，爲此謠言所惑，偏他又相信子平之學命相之術，便請護法神打卦，不知是巧合還是護法神已被

<sup>7</sup> 見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45。

收買，打卦「證實」1941 年（藏曆鐵蛇年）遭逢「厄運」，俗語說謠言止於智者，但同樣也有「曾參殺人」的故事，熱振年事尚輕究非智者，終被謠言所惑，決定暫辭攝政之位，推舉其經師無甚名氣之活佛打扎代理攝政，私下約定為期三年，三年後熱振回任攝政，據說在讓位讓權時曾在西藏僧俗民眾大會中（夏格巴書妄稱之為「國民大會」）「訂下紀要」（見前引楊公素所著書頁 216），於是打扎於 1941 年坐上代理攝政寶座。按照藏地政教習俗，攝政之產生需經過四大林、三大寺及僧俗民眾大會同意後產生，而此次熱振私人舉薦打扎代理攝政，原與藏地傳統習俗、慣例不合，但諸親英分子一心只要熱振下台，又深知打扎不但老邁昏聩而且貪婪，易於操控，於是舉薦打扎雖不合傳統習俗，仍予同意。

打扎這個無甚名氣的活佛（不是呼圖克圖）一旦坐上攝政寶座後，在親英群小金錢包圍之下（「活的佛」居然也會被金錢收買），忘卻與熱振呼圖克圖有師徒之情、有讓位之恩，開始清除西藏噶廈政府中親熱振官員，然而英國及藏地親英分子，並不肯就此善甘罷休，一則必欲置熱振呼圖克圖於死地，認為如此始能斬草除根，切斷與中央的關係，再則在地方噶廈政府內設置外交局，大搞西藏獨立，當然以打扎的知識水準，不可能知道何謂「外交」、何謂「獨立」完全是那一群受英帝國豢養的親英分子教唆所致。親英群小眼見熱振呼圖克圖尚在人世，於是開始製造事端以便羅織罪名，誣指熱振派人向蔣介石總統：「攝政達扎活佛對百姓不公正，若他辭職則罷，如不辭職，就可能用武力解決，那時，請予以軍事援助，所以派代表到了南京。」<sup>8</sup>時為 1947 年，當年國共內戰已燃，第一屆國民大會正要籌開，新疆三區革命事件尚未解決，外蒙古在蘇聯指使支援下，入侵新疆北塔山，當年對國民政府而言，可說是焦頭爛額，根本無餘力處理西藏事務，夏格巴書僅說熱振派代表到南京，並未指出所派何人為代表，而國民政府如何答覆也未見提出，可見此一指控純屬羅織，於是代理攝政打扎、噶倫喇嘛土登袞欽、噶倫索康·旺欽格勒（此人曾來台長住，多書為蘇康旺欽格勒）、噶雪曲杰尼瑪、拉魯·澤旺多吉、總堪布饒丹增等人商量後，決定逮捕熱振呼圖克圖關進監獄，噶廈當局在審訊熱振過程中，據夏格巴《藏區政治史》稱：

<sup>8</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 218 頁。

「他（指熱振）立刻認錯，當著西藏會議眾人磕頭說：

『要去拜見攝政活佛（指打扎），請求諒解息怒，磕頭懺悔。』」（見漢譯本下冊頁 219）

可是梅·戈爾斯坦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書，梅戈爾斯坦曾訪問若干當年參與審理此案的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官員，都沒有提到熱振俯首認罪這一段（參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523~528），設若果真有熱振向「會議眾人磕頭」認罪之事，梅戈爾斯坦訪談時豈有不說出之理，可見夏格巴之《藏區政治史》這一段話，完全是憑空杜撰，為要毒殺熱振而「創造」出來的「供詞」，如所周知，在審理犯罪事件時，「自白書」乃是最不可信的「罪證」，在三木之下何患無供，多少冤獄都是源於「自白書」。經過三次審訊，究竟應如何定罪，始終未能達成一致的意見，就在這種情況下，熱振在監獄中於 1947 年五月八日突然死了。

熱振呼圖克圖出身四大林，係轉世呼圖克圖，又曾為攝政，突然猝死獄中，在藏地而言自屬大事，經藏地僧俗民眾大會討論後，向噶廈報告，決定成立所謂專門委員會，調查熱振死因，試想熱振係噶廈派兵將之逮捕，關押於噶廈所管轄之監獄，而猝死於獄中，再由噶廈所組成之專門委員會調查其死因，其調查結果之公正性，能有多少可信度，夏格巴就是調查委員會成員之一，據梅·戈爾斯坦訪問夏格巴後，夏格巴稱：

「我參與此事（民眾大會調查熱振之死一事），我完全不認為他當時是被殺害的……」<sup>9</sup>

這個答案乃是必然的回答，但是事隔多年之後，證實熱振是被毒害致死的<sup>10</sup>，夏格巴乃是一心主張西藏獨立親英集團成員之一，早有必置熱振於死地的想法，當然不會承認熱振是被殺害的。另據梅·戈爾斯坦訪問了當時相關者稱，在熱振的遺體背部、臀部有一種傷痕（見《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30）雖然被訪談者稱這傷痕「可能是受到護法神的懲罰所致」，以理性的思考，這傷痕不可能是神靈所為，必然是人為的，想來熱

<sup>9</sup> 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30。

<sup>10</sup> 同上引書，頁 531。

振在獄中受到毒打，打扎是活佛熱振是呼圖克圖的經師，活佛授意獄卒或審訊者毒打呼圖克圖，但願這是只是喇嘛教裡的特例而非常態。

依照藏地習俗，熱振的遺軀運送到拉薩協德寺，供信眾憑弔，「用一塊紅綢緞蓋著面部讓人瞻仰，拉薩有成千上萬的人到這裡來向遺體告別，……我們看見從熱振的鼻孔裡流出了一股鮮血，浸透了覆蓋遺體的那塊布……」（見上引書頁 530），我們且看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怎麼說，對熱振背部、臀的傷痕，他推給幾個西藏會議（即民眾會議）一同前往驗屍，「全身除了臀有一道長長的深紫色斑紋外，沒有任何傷痕和毆打的痕跡。」<sup>11</sup>看看多妙，把傷痕說成是斑紋，而且漏了背部，縱然神靈會懲罰犯過的人們，也只會懲罰其心靈（如死亡後下地獄等，使人們心生恐懼），不會伸出手來鞭打人們的肉身，這是衡之常理，夏格巴想以護法神的懲罰，迴避熱振在獄中或在審訊時遭到刑求的事實，想來理性的人都不會相信這套「神話」，何況在展示熱振遺軀時，熱振鼻孔流出鮮血一事，看來不能再推給護法神了，只好連提都不提了，何其點慧。

### 參、泛亞洲會議與西藏商務代表團

打扎自坐上攝政寶座後，被親英分子包圍、收買，遂利令智昏，一心要搞西藏獨立，一則在英印政府教唆下，設立「外交局」想向西藏獨立跨出一步。此事之原由是在英印政府煽動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借僧俗民眾大會之決議，呈請攝政打扎在噶廈政府中設立對中國及其他國家辦理外務的機構，也就是要設立「外交局」，時為 1942 年七月七日，由扎薩索康及貢覺仲尼大喇嘛主持，遂由噶廈通知蒙藏委員駐藏辦事處以：「今後漢藏間事無巨細請徑向該機關（按即指外交局而言）洽辦。」<sup>12</sup>西藏地方此舉等同將中央視同外國，此舉既係英印政府所唆使，故「外交局」成立後，在拉薩之英、印、尼泊爾及極少數的美國人，立即與此「外交局」發生聯繫，但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立即察覺事非尋常，拒絕與該局往來，並立即致電蒙藏委員會，敘明此事關係重大，該電文略為：

<sup>11</sup> 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9。

<sup>12</sup> 見 1942 年 7 月 7 日噶廈致蒙藏委員會藏辦事處函，但此處係轉引自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學出版社，1992 年，頁 222。

「查『外交局』性質係與外國接洽辦事之機關，今噶廈告知須向該局洽辦一切事件，是視中央為外國，視西藏為獨立國，如我予以承認，則前此國際條約所訂西藏為中國領土之文無形消失，而西藏與外國所訂明密各約未為中央所承認者，無形有效。事關重大，中央似明電噶廈，不承認該局，中央駐藏官員仍須照舊與噶廈接洽一切事件。」<sup>13</sup>

1947 年八月，蒙藏委員會指示其駐藏辦事處答覆噶廈：西藏地方政府為處理地方涉外事務而有設置機構之必要，應遵守以下兩點：其一，有關國家利益問題，即政治問題，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其二，中央與西藏間一切往返接洽方式仍應照舊，不得經由上述外務機構。<sup>14</sup>噶廈對此置之不理，更在英印政府教唆下，採取極鄙劣且不人道作為，如故意逮捕在拉薩的漢人，施以非刑毒打，然後對駐藏辦事處示意，如果駐藏辦事處向「外交局」交涉，即可立刻釋放並可獲得賠償，此種作法極為惡毒且無恥，在「活佛」打扎領導下的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竟有如此違反人道、人性作為，實屬令人髮指，夏格巴書對此等惡行未有隻字片言之記載。攝政打扎活佛及其噶廈政府雖以如此惡劣作為，想逼迫駐藏辦事處與其「外交局」來往，但駐藏辦事處以事關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豈能就範，狠毒之打扎活佛與噶廈又祭出另一毒招，即停止供給辦事處一切物質，企圖以此迫使辦事處屈服，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宣稱如西藏地方政府仍堅持中央派駐西藏之辦事機構必須與「外交局」往來，中央政府即將出兵解決。1943 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召見西藏所派駐京（時首都在重慶）代表阿旺堅贊告知以上決定，阿旺堅贊陳述西藏地方噶廈請求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告以調動軍隊，一則為防止日本勾結西藏（抗戰期間，日本曾派出間諜潛入西藏，從事勾結行為<sup>15</sup>），再則為保護修築中的中印公路及驛運，蔣並提出下列五點要西藏

<sup>13</sup> 1942 年七月，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電，此處係轉引自楊公素所著書，頁 222。

<sup>14</sup> 見楊公素書頁 223。

<sup>15</sup> 關於日本派遣間諜入藏活動詳情，可參見秦永章《日本涉藏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年，因非本文主題，故從略，欲知詳情可見上列書。

地方噶廈政府遵守<sup>16</sup>：

- 1.協助條築中印公路，
- 2.協助辦理驛運，
- 3.駐藏辦事處向藏洽辦事件必須與噶廈徑洽，不經「外交局」，
- 4.中央人員入藏，凡持蒙藏委員會護照者，即須照例支應烏拉，
- 5.在印華僑必要時須經藏內撤<sup>17</sup>。

蔣氏並告知西藏如遵守上列五項，中央自無出兵西藏之理，但如發現西藏有勾結日本情事，當視同日本，將立即派飛機飛藏轟炸（見註 16 所引資料。）

經此一番嚴峻告誡，同時青海、西康又有軍隊調動消息，噶廈不得不改變作法，作出下列決定：

- 1.向中央聲辯，「外交局」非新創機關，但中央如仍拒絕接洽，擬讓步另設機構與駐藏辦事處往還；
- 2.中印公路仍以神意反對測修；
- 3.假道運輸，原係英方接洽，與中國無關，如經玉樹運物，則道路破壞者由西藏自修；
- 4.西藏勾結日本情事，應向中央嚴重聲辯；
- 5.西藏應與中央保持感情，不應與中央在西藏辦事處斷絕關係。<sup>18</sup>

就此看來，打扎及噶廈想以「外交局」將中央列入外國的如意算盤是落空了。夏格巴書對設立「外交局」及與中央交涉經過，均刻意略過，僅極簡略的以「駐拉薩印度辦事處扎薩克熱依西圖爾塔布頓珠和中國辦事處孔慶宗二人，通過西藏政府『其杰列空』（外交局）要求，允許通過西藏領土察隅新修運輸物資的道路。……」<sup>19</sup>以「偷渡」方式出現「其杰列空」（外交局）字樣，可見其人之「黠慧」。

<sup>16</sup> 見前引楊公素所著書頁 223。

<sup>17</sup> 蒙藏委員會秘書周昆田致孔慶宗電，1943 年五月十三日，但此處見楊公素書，又周昆田來台初期曾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其後又任政大邊政所所長。

<sup>18</sup> 見 1943 年六月十五日，蒙藏委員會致軍事委員會電，但此處係轉引楊公素書頁 224。

<sup>19</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1。

## 一、泛亞洲會議

西藏地方當局自設立「外交局」後，自覺已向獨立邁出一大步，其野心在英印政府鼓動下，更為熾熱，1947 年初，印度即將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印度尚未脫下被殖民、被奴役的枷鎖，卻已戴上其殖民主英國帝國主義的面具，就在印度獨立前夕，印度發起在印度首府新德里召開泛亞洲會議（或稱東方各國聯合大會），西藏也在被邀請的名單之中，此會議印度既定名為「東方各國聯合大會」，顯然是以國家為單位，而印度明知西藏不是一個國家，其仍予邀請，可見印度在獨立前夕，已經師承其殖民主人英國分化、裂解中國的基因，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台吉桑珠頗章巴·澤旺仁增、堪窮洛桑旺杰、翻譯四品官吉普巴·洛桑旺堆與會，1947 年三月二十三日開幕會場上，據夏格巴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6 稱：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泛亞洲會議的會場上，西藏政府的國旗和所有東方國家一樣懸挂著。」

這裡所謂的「國旗」，基本上是英國人而被印度雇用的理查遜（Hugh Richardson），提醒西藏當局要帶一面「國旗」參加泛亞洲會議，但「西藏本來沒有什麼國旗，於是急忙製了一面藏軍平時用的『雪山獅子旗』」<sup>20</sup>，但中華民國首任（同時也是末任）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先生，當時人在會場，在他所撰著的文章中，並沒提到所謂西藏「國旗」一事，倒是提到：

「會場上挂了一張很大的亞洲地圖，把西藏畫在中國領土之外。當時中國代表團就發現了這件事，感覺大大不妥，由葉公超先生前往向尼赫魯交涉修改。葉先生頗費唇舌，過了兩天，這張圖的疆界方才修改完成。」<sup>21</sup>

泛亞洲會議會場是否有懸挂參與國的國旗，縱以夏格巴書所說為是，但

<sup>20</sup> 見前引楊公素所著書頁 229。

<sup>21</sup> 見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一文，此文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1)，台北雲天出版社，1971 年，頁 66，按羅氏此文撰於 1950 年九月，距泛亞洲會議之召開僅三年，可說是記憶猶新。

「此事（指懸挂國旗之事）經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交涉，巴赫魯才命人糾正。」<sup>22</sup>則是不爭之實，而夏格巴刻意不提被糾正（修改）之事，可見《藏區政治史》雖取名為「史」，實際上只是一份宣揚藏獨的文宣，除夏格巴選擇性記載外，也顯現出印度完全繼承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思維，視西藏為禁嚮。

其實所謂泛亞洲會議，是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Council of world Affairs）決定在 1947 年春天召開的一個半官方的亞洲國家會議，有來自學界代表與三十二個國家及政府觀察員應邀出席，向西藏地方政府發出邀請書的，是由英國派駐拉薩的代表轉交的，這個英國代表對西藏當局說：

「這是在所有亞洲鄰國面前公開宣傳西藏所享有的事實上的獨立地位的良好機會。」<sup>23</sup>

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已不再是世界強國，已經從世界強國行列除名了，沒想到在離開強國舞台的前夕，仍不忘其分化裂解中國的潛意識。

出席泛亞洲會議的西藏代表台吉桑珠頗章·澤旺仁增曾在會場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講，全文如下：

「我們的政府收到邀請信後，就派我們來參加東方國家的聯合會議。我們是一個用佛法治理的和平國家。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或者說好像母親，正如她很早就和有佛教聯繫的東方諸國建立了睦鄰友好關係一樣，和西藏也建立了特殊的友誼和良好的關係。因此，我們參加這次大會。會見參加這次會議的東方各國代表，感到很高興，特別是能見到印度大領袖聖雄甘地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博士和夫人耐都，感到十分榮幸，並為籌備這個盛會表示十分感謝。希望並祝願今後東方所有地區相互拋棄仇恨和侵害，以朋友相待，宗教、和平、經濟等共同得到長期的穩定和發展。」<sup>24</sup>

西藏地方自參加泛亞洲會議後，自認向獨立又跨進一步，於是親英分子野

<sup>22</sup> 見楊公素書頁 229。

<sup>23</sup> 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79。

<sup>24</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6~217。



心更為旺熾。

## 二、籌組西藏商務代表團

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自設立「外交局」，參加泛亞洲會議以來，野心越來越大，而國共內戰也越演越烈，英、美、印度等國家介入西藏事務也越來越深，西藏地方當局想擴張其在國際的能見度，想以「商務」包裝，籌組代表團或考察團，赴美國、英國活動，1947年十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派遣以夏格巴為首組成商務代表團或考察團，其餘成員有帕里稅務官堪窮羌欽巴·土登澤貝、具商務經驗之亞東基巧四品官邦達瓦·洛桑央培（或作邦達養壁）、翻譯官前藏代本索康色·拉旺多杰等人，持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自行簽發的護照以及由十四世達賴，司倫及噶廈等給美、英等國元首、外交部之信件。據梅·戈爾斯坦訪問夏格巴後，據夏格巴稱，籌組這個商務代表團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美、英等國購黃金，因印度金價太貴，在拉薩僧俗民眾大會中，夏格巴向與會的僧俗代表說，你們從宗教活動中募來或賺來的錢，都是紙幣，一旦發生意外，都會將之向噶廈政府要求兌換成金銀之類貴重金屬，屆時噶廈政府將無法以等值之金銀兌換紙幣，並以現代國家發行紙幣，都有等值的金銀儲備，由於噶廈政府沒有與所發行紙幣等值之金銀儲備，因此你們所積聚的錢，一旦有了意外，只不過是一塊廢紙而已<sup>25</sup>，這是基本貨幣學，與會僧俗代表一聽自然同意夏格巴等籌組商務代表團前往美、英購黃金，商務代表團於焉成行。

照常理看，西藏並非國家，乃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國國民，到任何外國，必須持中華民國護照，但當時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一意要搞西藏獨立，不持中華民國護照，而印度、美國、英國竟然也同意此一商務代表團入境，可見國際上分化、裂解中國氛圍瀰漫，當然這與中國內戰也有關聯。此一商務代表團於1947年十二月十七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由中華民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代訂旅館招待，次日，印度駐孟加拉總督宴請此一代表團成員及時在該地的十四世達賴胞兄當才活佛，但未邀我總領事，同月二十三日代表團一行到新德里，分別拜訪美、英駐印度大

<sup>25</sup> 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589，原譯文頗不易讀，此處係筆者加以改寫。

使館，當時我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即刻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要求印度不得承認西藏地方政府所發之護照，並禁止英國軍火運入西藏，尼赫魯竟答稱：藏人到印度不需用護照，至於英印交權時，在印購買軍火甚為容易，西藏是否已購買他不知道，當予調查。此一回答，等於沒有回答，可見印度外交手腕之圓滑及其想繼承前英國在西藏之「權益」，躍然於言詞之間。

此一代表團於 1948 年元月離印到南京，蒙藏委員會及交外部曾極力勸其不宜單獨前往美、英，自然未被接受，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登雷則承諾該代表團可持西藏當局所發給的旅行證，經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簽證前往美國，國民政府得悉後，向美使館交涉，說明西藏當局無權對外獨立辦理外交之權，其所發之旅行證不能代替中國護照、夏格巴等無權與美國政府接洽事務，要求美方說明，美使館答稱，美國向來承認中國在藏之主權，美國政府也無變更其對西藏之立場，至於其他各點，將向美國國務院查詢<sup>26</sup>，以打太極拳方式作答，中國對之也莫可奈何。該代表團於 1948 年六月二十三日，從南京經香港前往美國，據夏格巴書稱，所到之處都受到美方商務機關很好的接待，會見了美國國務卿馬歇爾（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Marshall）及一些商務官員<sup>27</sup>，原本還想見美國總統，所幸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從中運作，才阻止代表團拜美國總統杜魯門，其中詳細過程，梅·戈爾斯坦於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608~611 有頗詳細的說明，此處不予贅述。

代表團在美國的活動，並沒有得到原先政治上的期待，之後乘船到英國，雖受到適當的接待，雖曾拜會英國首相，在政治上也無甚突破，之後又到義大利，義大利政府通知該代表團，如要辦理各項事務，須申請由中國大使館介紹辦理，這對該代表團而言自是無趣，於是便返回西藏。

#### 肆、驅漢事件與中共入藏

西藏商務代表團一行雖然到印度、美國、英國、義大利等國轉了一圈，能見度雖然增加了不少，但對西藏獨立並無多大收獲，只時此際中國

<sup>26</sup> 見楊公素所著書頁 231。

<sup>27</sup> 見夏格巴書漢譯本下冊頁 224。

內戰日熾，而國民政府處於劣勢，敗象日顯，中共似已勝券在握，此時（1949年）原英國駐拉薩商務代表，於印度獨立後，受印度之聘，仍為印度駐拉薩商務代表黎吉生（此人即之前鼓動設立外交局之理察遜 Hugh Richardson），為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出謀劃策，製造了所謂驅漢事件，以為將漢人趕出拉薩，中共就不會入藏，其結果正相反，本節擬就 1949 年七月拉薩驅漢事件及中共入藏作一敘述。

### 一、驅漢事件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中央政府特派大員黃慕松率團入藏致祭，事畢黃慕松於 1934 年十一月離藏，但留下總參議劉樸忱、參議蔣致余二人在拉薩，作為西藏與中央聯絡之窗口，時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對此項安排頗感滿意，此一留藏人事安排，就成為後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之嚆矢。及至 1940 年二月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團入藏會同熱振呼圖克圖辦理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事（以往漢文文獻均稱吳忠信入藏係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但有若干藏人不認同此項說法，認為坐床典禮並無主持人，但總有人辦理），事畢將部分人員留在拉薩並呈准行政院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以孔慶宗為處長，張威白為副處長，下設二科、藏文秘書，翻譯等人員共十餘人，1943 年十月，駐藏辦事處處長改由沈宗濂出任，副處長為陳錫章，陳氏之後更代理處長，總共有十二、三人。駐藏辦事處人員多年來與噶廈僧俗官員相處都相當融洽。1949 年儘管中共聲勢日益壯大，藏中偏向獨立的氛圍也日益高漲，但從未想到要驅逐在藏漢人，美國學者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等譯之《現代西藏的誕生》一書，就指出說：「如果黎吉生從來不向藏族官員提驅逐（漢人），那麼藏人也想不到這一點。」1949 年初夏，拉薩氣氛因國民政府在內戰節節失利而日趨緊張，各種謠言滿天飛，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代處長陳錫章，特意走訪噶廈政府索康噶倫（索康按即蘇康旺欽格勒，此人約在 1970 年代來台任西藏噶倫辦事處主任）及若干其他重要官員，所得到的答覆都是絕對無對中央官員不利之事，這些官員還當面表示：「數年來彼此相處很好」，只是希望將中央在藏工作人員中的「不妥分子」告知西藏地方政府。及至 1949 年六月中陳錫章於會見攝政打扎的管家及噶倫噶

雪巴時，他們仍「一致否認對中央人員有任何行動」<sup>28</sup>。從而可見初時藏地官員並未產生驅逐中央政府駐藏人員的念頭，然而 1949 年六月二十五日起，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官員，即不斷與印度駐拉薩商務代表黎吉生密集接觸，黎吉生向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獻策，認為此時（1949 年中）國民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失去對大陸之控制，已屬指日可待，而中共雖節節勝利席捲大片江山，但尚未宣布建政，縱或宣布建政，但內地滿目蒼夷遍地災黎，當無餘力入藏，如此時將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官員、拉薩小學漢人教職員及在拉薩少許漢商，總數不過數十百人，將之盡行驅逐出藏，如是西藏在無中央政府機構、無漢人之情況下，形同獨立，黎吉生更承諾向英國乃至向聯合國呼籲，要求承認西藏獨立，設若中共隨後宣布建政，再回頭以西藏要求獨立已成國際問題，以之向中共討價還價，以阻止中共軍隊機構、人員入藏，造成事實上之獨立，而後自然成英國或印度之保護國、附庸或土邦，這番說詞雖狠毒，但極能煽動人心，藏中官員都是貴族、大地主、大喇嘛、活佛出身，一向養尊處優錦衣玉食，根本不知道搞革命、鬧獨立，它的代價是拋頭顱、灑熱血，所以是一項「高風險」的行業，噶廈政府裡僧俗高官根本沒想過這回事，只覺得黎吉生所說有理，就開始研究要將拉薩的所有漢人，包括駐藏辦事處人員、國立拉薩小學教職員、在拉薩漢商以及在各大寺廟出家的漢人喇嘛，一律驅逐出境，使西藏與內地完全失去政治、經濟、宗教一切聯繫，當時在黎吉生策劃下，喊出的口號是防止赤化，在 1949 年六月過後，在拉薩的黎吉生十分忙碌，頻頻與噶廈官員密集接觸，當時尼泊爾駐藏代表曾對我駐藏辦事處長陳錫章說：「黎吉生這些時候很忙，不知在搞什麼鬼，主持什麼陰謀？」還說：「西藏人目無祖國和鄰邦，總認為白人高人一等，實是不可救藥。」<sup>29</sup>另據時任噶廈仲譯欽莫之土丹達旦的回憶稱：「里察遜（按即黎吉生）還給當時噶廈外交局局長扎薩柳霞·土登塔巴、扎薩索康·旺欽次登出主意說：『拉薩有許多共產黨的人，留他們在這裡，將來就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起

<sup>28</sup> 以上見祝啓源、喜饒尼瑪《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係》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52~153。

<sup>29</sup> 見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集》第二冊，1976 年，台北國史館、國民黨黨史會合編，第二冊頁 348；另陳錫章《西藏從政紀略》一文輯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冊，頁 108~140，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啓源、喜饒尼瑪所著書頁 348。

來。』二扎薩一聽後大吃一驚，急忙問：『我們不知道拉薩有共產黨，他們在那裡？』於是里察遜就說出了人的名字和住址。」<sup>30</sup>黎吉生爲了呼應之後噶廈驅逐在藏漢人，曾向印度政府告稱：印度應接受三百名離職的國民黨政府官員、漢商、漢喇嘛，並稱這三百個漢人身分約分爲以下四種：

- 1.中國共產黨人，
- 2.與中國共黨有聯繫的國民政府官員，
- 3.其他中國官員，
- 4.其他中國公民。

印度當局與黎吉生套好了招，新德里則「以避免給中國和其地方產生這樣的印象，印度贊同了西藏（噶廈）利用中國當前局勢謀取徹底擺脫中國勢力的明顯政策」，所以只同意接受第一、二類的，不願意接受後兩類人<sup>31</sup>。這根本就是黎吉生與新德里當局及西藏噶廈三方面事前套好招，要噶廈以防赤爲名，誣指駐藏辦事處中有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聯繫者，將予以懲處，須知西藏高層無論僧俗，「懲處」對手時剜目、刖鼻、下毒……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由其稍早「懲處」聲望隆崇的熱振圖呼克圖即可見一斑，這時與之談我佛慈悲無異對牛彈琴，駐藏辦事處人員對藏地僧俗高層處置對手的各種「手段」，不但耳有所聞，甚至曾親眼目睹，可謂知之甚稔，此時（1949年七月初）駐藏辦事處人員如承認是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所聯繫，尚有印度可去，如堅不承認，或將面臨僧俗高層之處置，求生乃是一切生物之本能，自然選擇逃往印度，如是噶廈對國民政府自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說辭—驅逐駐藏辦事處人員，乃是驅逐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聯繫之人，而印度政府則以收留被西藏驅逐之中國人既符「人道」精神，又討好了中共，黎吉生這一招可說是一石兩鳥，老牌帝國主義所培養的鷹犬果然不同凡響；當駐藏辦事處陳錫章率領辦事處人員、無線電技師、拉薩小學教職員、醫生等只得離藏前往印度，行前噶廈之然巴·土登貢欽等三位噶倫及基巧堪布阿旺丹僧等尙假意地對陳錫章說：「顧念漢藏感情本

<sup>30</sup> 見土登塔旦《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前後》，該文輯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31~45，但此處係轉引祝啓源、喜饒尼瑪所著書頁348。

<sup>31</sup> 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此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頁114。

無嫌怨，使一切疑竇消失為謝」，希望陳錫章能轉告國民政府要人，陳錫章當即表示「此事之是非，無庸本人辯白，但本人應即報告中央」<sup>32</sup>，噶倫等則說「西藏政府已電李代總統（按係李宗仁）報告一切，無待貴處長報告，貴處長已不能發電」，至此等於完全決裂，七月二十日，在陳錫章帶領下一共八十八人在藏軍「歡送」下離開拉薩，次日，拉薩當局才電告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八月我駐印大使羅家倫派一位秘書前往印藏邊境噶倫堡迎接陳錫章一行<sup>33</sup>，此即所謂驅漢事件。

一般文獻對於此次西藏驅漢事件，大多語焉不詳，但時任我駐印大使羅家倫先生在其所撰《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專文中，有相當詳細的敘述（該專文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一書(1)，台北雲天出版社，1971 年，惟羅氏撰此文時為 1950 年），由於篇幅頗長，此處不予引錄，另國史館，國民黨黨史會合編之《羅家倫先生文存》也錄有此文，列頁 813~837，1976 年出版。

## 二、中共入藏

1949 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國民政府失敗已成定局，而中共掩有全大陸也成不可更易之事實，其正式建政更是指日可待，當時（1949 年七月以後）國民政府確已無力處理西藏事務，而中共一時之間也對西藏鞭長莫及；二次大戰期間英國本土曾遭德國飛機猛烈轟炸，受創頗重，亟待恢復無力對西藏進行干預，而印度甫告獨立，百廢待舉，雖一心想繼承之前英國對西藏所享之特權，但實力不足，西藏此時確實一時形成權力真空，所以才有黎吉生前此之想法。二次世界大戰無論戰勝國或戰敗國，均遭受極大損失，唯獨美國雖蒙小害（珍珠港被日本偷襲，損失若干機艦），但美國本土未遭攻擊，因戰爭需要，美國大賣軍火，發了一大筆戰爭財，甚至於可以說第二次大戰養大了美國，二戰以後美國成為世界超強國家，開始走向霸權主義，也開始插手西藏事務（詳下節）。西藏雖然一時形成權

<sup>32</sup> 《蒙藏委員會檔案》，按政府遷台時，蒙藏會檔案全留在大陸，中共建政後，將之集中存放南京第二檔案館，此處係轉引自祝啓源、喜饒尼瑪《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頁 155。

<sup>33</sup> 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該文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頁 57~87，該文完稿時間為 1950 年 9 月 22 日，距陳錫章被迫離藏僅一年多。

力真空狀態，於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親英分子在黎吉生鼓動、唆使下，蠢蠢欲動要搞西藏獨立。

在驅漢事件（事在 1949 年七月八日）約七個月也即 1950 年二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四品官堪窮土登結波為團長、孜本（噶廈中負責財務與人事之官員）夏格巴為副團長<sup>34</sup>之所謂代表團，於 1950 年三月十五日致函中共駐香港總領館，請轉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一份書函，要求在香港與中共代表進行談判，該函略為：

「我倆（係指土登結波及夏格巴）係奉西藏政府之命赴港和貴政府商談我們之間的友好關係。假如你能早日派代表赴港商談，西藏政府和中國政府間的友好關係將大大改善。我們盼望你將貴代表赴港日期通知我們。」<sup>35</sup>

從這封信可看出當時西藏儼然以「國家」自居，而且還語帶威脅地說「假如你（指中共主席毛澤東）能早日派代表赴港商談，西藏政府和中國政府間的友好關係將大大改善。」換言之，中共中央主席如不早日派代表赴港商談，「兩國」友好關係無法「大大改善」，這簡直是夜郎心態，不知天高地厚，自清代以來，西藏已納入中國版圖，豈容自稱國家，而且要在香港（時香港仍為英國所強佔）商談，中共豈能同意，自然被打回了票。其

<sup>34</sup> 夏格巴，全名為夏格巴·旺秋德丹（1907~1989 年），出生於一個西藏貴族家庭，曾擔任西藏噶廈政府的孜本。1939 年曾以隨員身份前往那曲，參加迎接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工作。1946 年曾到印度，從此開始進行藏獨工作，1947 年 10 月西藏噶廈政府派出所謂「商務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然暗中卻從事黃金買賣為自己牟利，當時一位印度官員就曾告訴美國大使說：「在他們（指商務考察團）看來，使團出使的唯一目的是代表們為自己撈一把，他們關心的是把能夠買到的黃金再設法從西藏拋回印度，以看漲的有利價格在黑市上倒賣出去」，這段記載見譚·格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30。此人之人品可見一斑，他完全是為了搞西藏獨立而撰著該書，將該書由藏文譯為英文，並由美國藏學家魏里（T.V. Wylie）編輯校訂，於 1967 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囑其再加補強，又經過幾年增強了該書的藏獨論述，於 1976 年在印度德里再度出版，該書除師心自用、扭曲捏造史實外，極力鼓吹藏獨，可說是錯誤百出，該書漢文譯本晚到 1992 年才以內部參考方式予以出版，並不對外發行，翻譯者為劉立千、羅潤蒼、札西尼瑪、楊秀剛、余萬治、史京娜姆及次仁拉姆。書分上下兩冊，共 700 多頁，上項引文見該書漢譯本上冊頁 234。另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註小組編寫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北京民族出版 1996 年出版，對該書作重點批評。

<sup>35</sup> 見廖祖挂《西藏的和平解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 年，頁 52。

實中共於 1949 年十月間，中共北京和青海西寧廣播電台，已經宣布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派解放軍入藏，將西藏從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而且多次重復此項廣播；西藏拉薩廣播電台則播出「中國和西藏僅僅是施主和福田關係，西藏根本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更宣稱在西藏也沒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sup>36</sup>。夏格巴或西藏噶廈僧俗政府似乎得了「斯各得爾摩症候群」，可說喪心病狂。上述這封信中共仍然予以答復，其內容略為：

「中央人民政府很關心西藏情況。歡迎你們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前來北京商談有關西藏政府和平解放的問題。因此你們的代表團，不能稱為西藏派赴中國外交代表團，談判的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sup>37</sup>

這封回信明白指出西藏不能稱為「國家」，而且也不同意在香港進行談判。在信函往返過程中，夏格巴又將之扭曲了，其《藏區政治史》稱：

「通過雅色杰頓（原書作即嘉樂頓珠，按係達賴之二兄）的岳父朱洲乎轉呈要求北京派遣全權談判代表至距中國不遠的邊界舉行談判的信件。公曆四月八日，得復信稱紅漢人共產黨政府派遣談判代表到香港，西藏政府的代表應立即前往。但是，代表們不能象（原書用象字）外國人那樣前來，那樣不妥，等等。」<sup>38</sup>

兩相對照，夏格巴書竟然把要在香港談判一事，說成是中共的主張，按中共復信明白的說「談判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夏格巴竟顛倒是非到如此地步，誠令人訝異，夏格巴算準美、歐、日「學者」未必會去細查，必然會相信要在香港談判一事是中共的主張，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在香港談中國內部問題（中共主張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無形中承認西藏問題具有國際性，夏格巴這種栽贓式的寫法，含有很深的用心而且也相當的狠毒，因此讀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必須處處小心，

<sup>36</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0。

<sup>37</sup> 同註 35 所引書頁 53。

<sup>38</sup> 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2~233。



隨時查證，以免爲其所誤導，不過該書提出西藏地方致北京的函件是透過達賴二兄嘉樂頓珠岳父朱洲乎（是漢人）轉呈，這倒是一件應屬可信的小秘密。

書信往返一時之間尙無交集，西藏地方政府顯然還在觀望，更期待美、英、印等國（日本雖也有野心，但因二次大戰無條件投降，此際只能心餘力絀）能伸出「援手」，支持西藏獨立，然而似乎並沒有得到預期效果，但西藏地方當局仍未死心，於 1950 年九月八日，夏格巴等去見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博士，夏格巴等人表示：

「若能維護西藏的獨立自主，對印度和中國皆十分有益，對此印度政府應真考慮。中藏只能在印度領土舉行施主、福田間的談判，倘若前往中國，唯有聽凭中國人說了算。故請設法就在這裡（指印度）談判。在正式談判時，按照舊例印度政府應居間作中證人參加談判。……」<sup>39</sup>

這簡直是向印度尼赫魯哀求了，說了些施主、福田這一類自以爲是的話，更妙的是西藏與中共的談判，居然要求印度居間作中證人參加談判，可見其時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及夏格巴等人仍然獨心未死，接著還說了些不合常理的話，尼赫魯只說：

「那種所謂：單獨簽的條約不存在，中國人不接受《西姆拉條約》，在中國人看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sup>40</sup>

看來對印度的哀求，也沒得到支持，之前夏格巴等人要在香港與中共代表談判，見尼赫魯時又說「中藏只能在印度領土舉行施主、福田間談判」，可見夏格巴見風轉舵的能力極強。在尼赫魯那裡得不到支援，又於 1950 年九月十六日前往拜會中共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夏格巴依然老調重彈，但袁仲賢重點式告以：「說要維持西藏獨立是根本不行的。」袁仲賢又根據中共中央的文件提出中心要點三項要西藏遵守，此三項爲：

1. 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2. 由中國政府保衛西藏，

<sup>39</sup> 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5。

<sup>40</sup> 《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5。

3.無論同外國進行政務和商務任何談判，應通過中國政府。

並告以西藏地方政府，承不承認這三項，應予答覆。若承認這些，就不向西藏邊境進軍，西藏就獲得和平解放；否則，是無法阻止進軍的<sup>41</sup>。這給夏格巴碰了一鼻子灰，也含有最後通牒意味。

就在夏格巴想在中國境外與中共進行商談，以及向印度尋求支持西藏獨立之時，中共於 1950 年十月間，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與西南軍區聯合公布了《解放西藏公約十章》以漢藏文合璧方式公布，同時開始進軍西藏的行動<sup>42</sup>，西藏地方政府在這種外在壓力之下，不得不與中共在北京展開以地方身分與中央進行談判。

1951 年二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談判代表團，其他成員有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及桑頗·登增頓珠等五人，各代表分別於 1951 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抵達北京，中共方面則派出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談判斂表，以李維漢為首席代表。會議於 1951 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商談，以原西南軍政委員會與西南軍區聯合公布之《解放西藏公約十章》為基礎，先後進行六輪談判，為時將近一個月，於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完成談判，雙方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此協議共十七條，所以一般簡《十七條協議》。按中共向來擅於談判，此項商談既以原《解放西藏公約十章》（即十條）為藍本，談判結果增為十七條，顯見談判過程中必有相當之言詞、理念之爭議、及中共作了某程度之讓步，但夏格巴於事後多年對此項《十七條協議》提出以下看法：

「起初，以為是和平、平等地進行商討，是合法的。故昌都基巧帶著外出噶廈的圖章，各位代表也帶著標志各自權力的圖章，但結果全是在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下強行簽訂協議，因而全體代表說沒有圖章。於是，中國政府就偽造了圖章，令他們蓋上後，把圖章都保存在北京。」<sup>43</sup>

夏格巴這一段話仿佛天方夜譚，既指中共以「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

<sup>41</sup> 同註 40 所引書 236。

<sup>42</sup> 見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北京藏學出版社，1991 年，頁 41。

<sup>43</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53。

下強行簽協議」，怎麼能夠讓西藏代表將代表身分、權力的圖章藏匿起來？何況還有簽名；既然中共是以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的方式，那麼照原先的《解放西藏公約十章》通過好了，怎麼變成了「十七條」？顯然是經過西藏代表討論、爭取後而增加，《十七條協議》全文頗長，很多相關書籍都錄有全文（即使是《藏區政治史》也錄有全文，而且在最後也註明簽字蓋章，見該書下冊頁 251~253，難道簽名也是假的？），此處就不加引錄，其中最關鍵的為第二、第三條，現在且看：

第二條 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第三條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根據這兩條，中共軍隊入藏以及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實合於《十七條協議》的規定。就《十七條協議》而言，西藏回到清代以來是中國的領土，自此無庸置疑，換個角度看，自從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如再有從事西藏獨立活動，不僅違背了歷史，也背判了中共的法律。

### 伍、美國介入又搞藏獨

夏格巴等人於 1950 年三月原擬在香港與中共進行商談，中共拒絕在香港舉行談判，並且駁斥了土登結波與夏格巴信函上所謂「西藏政府和中國政府間的友好關係……」，認為用語不當，而且堅持要在北京談判，再則英國政府拒絕發給土登結波與夏格巴的入港簽證，此二人就留在印度噶倫堡，而西藏地方政府後來改派阿沛·阿旺晉美等五人到北京與中共舉行會談，最簽定了《十七點協議》，確了西藏為歷史上中國領土，西藏與北京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如果再行西藏獨立活動，不僅是有違《十七條協議》而且是叛國，偏偏留在印度噶倫堡的夏格巴與堪窮、洛桑堅贊以及到噶倫堡的十四世達賴二哥嘉樂頓珠三人組成一個秘密組織，也就是後來的所謂「西藏福利會」或「西藏幸福事業會」，其實為 1952 年至 1954 年，也就是《十七條協議》簽訂後的一、兩年，在印度從事藏獨活動，並且把西藏地方政府內庫中相當數量的黃金、白銀、銀元等，運到錫金首府甘托

克存放<sup>44</sup>，以為搞西藏獨立活動經費，在「西藏福利會」正式成立之前，該組織以「哲堪孜松」的面目出現，其所以用「哲堪孜松」（Jenkhentsisum，簡寫 JKTS）這個名稱，是以藏獨集團三個首腦人物嘉樂頓珠、孜本夏格巴與堪窮·洛桑堅贊三個人的頭銜的組合，「Jen」是「哥哥」藏語音譯；「Khen」是堪窮的縮譯；「tsi」是孜本的縮譯；「sum」是藏語「三」的音譯<sup>45</sup>，也就是說這個組織是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堪窮、洛桑堅贊及孜本、夏格巴三人為首腦組成的集團，各取頭一個英文字母就成為「JKTS」，從而可見當時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一方面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另一面又將庫存金銀、銀元運出境外存放在錫金首府甘托克，同時縱容「哲堪孜松」（Jenkhentsisum）搞藏獨，其雙面性格暴露無遺。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了世界超級強國，而且為了保持其世界霸主地位，開始介入西藏事務，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戰報局（OSS）從事涉藏工作。早在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日捲入亞洲戰局，尤其當日本占領緬甸後，滇緬公路不通，益顯得西藏地緣之重要性，於是美國開始研究西藏，同時開始接觸西藏事務，1942 年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指示美國駐華使館人員注意搜集有關西藏問題之政治情報，同年十月，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官員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是否後來曾任駐華大使，待查）曾建議美國政府可以派人入藏考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因抗戰需要美國物資援助，滇緬公路既無法使用，曾想在西藏東部修築一條通往印度的公路，以運送物資，此計畫雖因西藏地方當局以破壞「風水」而反對，但對非軍事物資，則同意經西藏運入內地，於是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局長杜諾萬（William J. Donovan）於 1942 年八月派伊利亞·托爾斯泰（Ilya Tolstoy，大文豪托爾斯泰之孫）上尉及布魯克·杜蘭（Brooke Dolan）中尉入藏，表面上為視察路線，實際上試圖與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建立直接聯絡管道<sup>46</sup>。

美國戰略情報局之所以派伊利亞托爾斯泰到西藏，以其係印度大文豪

<sup>44</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70、309。

<sup>45</sup> 見王小林《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頁 2 註 2。

<sup>46</sup> 見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2015 年，頁 85。

托爾斯泰之孫，係貴族身分（印度有四大種姓，依序爲：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前兩者係貴種），到印度應會受到歡迎，而藏印關係向稱良好，應會受到西藏高層注意、重視，可見美國情報工作手法細緻，此二人於 1942 年十二月到達拉薩，持有一封美國總統羅斯福給十四世達賴喇嘛信函及一張羅斯福總統照片，此函全文爲：

「尊敬的達賴喇嘛閣下：

我的同鄉伊利亞托爾斯泰和布魯克多蘭二人希望去訪問您的宮殿和歷史上著名城市拉薩，在美國有許多像我一樣的人們長時期的關心西藏和西藏人。因此，有去這樣的地方的機會十分珍貴。

您很清楚，美國人民和二十七個有關國聯合起來，面對消滅思想、宗教、信仰和智慧自由的狂人和侵略擴張主義者，現在正在與之進行戰爭。聯合起來的人民，為維護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我們堅信最終會取得勝利。因為（我們）有正義和充足的信心，我通過伊利亞·托爾斯泰和布魯克·多蘭帶去表示朋親切情誼的一點薄禮，請笑納。致以親切的問候。

福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sup>47</sup>

伊利亞·托爾斯泰等二人在拉薩停留了一個多月，受到西藏「外交局」的接待，並會見十四世達賴喇嘛及攝政活佛，當時十四世達賴尚在稚齡，所有一切都由打扎主導。此二人要離藏時，西藏當局派德格土司之子格桑旺堆率兵親作嚮導，一路送到青海邊界。托爾斯泰等二人在拉薩停留期間與西藏地方政府有頗多接觸，發現西藏對修築通往印度公路，不感興趣，因而未有結論，該二人利用大部分時間搜集到大量情報，並通過與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實權人物的秘密接觸，發現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頗不融洽，所謂「中國所說的宗主權很少有實際意義。」因而傾向支持西藏獨立，此二人回到美國後向美國政府建議：「美國政府應該繞過中國政府支持西藏，以

<sup>47</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 212，另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書頁 86 也譯有此函，譯文略有不同。

滿足西藏從中國獨立出來的願望。」<sup>48</sup>，此項建議雖未必全被美國政府採納，但卻成為美國情報系統（戰略情報局及後來的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問題的主要立場，情報系統既已有此成見，自然會反映到美國對藏政策，此為研究當代西藏問題一個很微小但卻是關鍵點。

托爾斯泰離藏前夕，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以十四世達賴喇嘛名義給美國羅斯福總統一封信及若干禮物，該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 F.D. 羅斯福

美國總統

白 宮

華盛頓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非常滿意，通過托爾斯泰上尉和杜蘭副官收到你的信和作為友好情誼象徵的一塊華美的金錶，它能表示月和星期。他們安全到達了他們要訪問的教區和拉薩城。

我高興地知道，美國人民對我們的國家表示極大興趣。美國人民聯合 27 個國家進行保衛自由的戰爭具有巨大的意義。這場戰爭是由侵略成性的國家所強加於他們的，其意圖是摧毀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動自由。

西藏珍惜她自古以來就享受的自由和獨立。作為佛教聖地，我們正在努力，盡管我年幼，發揚我們的宗教精神以求勝過我的前輩們的虔誠事業。我真誠地希望並為之祈禱，戰爭早日結束，使全世界的國家能夠建立在自由和善意基礎上的持久而正義的和平。

作為我敬意的表示，我給你帶去一條哈達，三枚西藏最貴重的金幣，我的照片，三幅手綉的唐卡，表示六道輪回的長存，四個和睦的兄弟，八種吉祥符號。全部用金絲緞裝裱。

<sup>48</sup> 見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頁 86。

你最忠誠的

西藏達賴喇嘛

水羊年正月十九日。

西歷 1943 年 2 月 24 日。」<sup>49</sup>

按當時（1943 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年僅八歲，顯然是噶廈政府所為，更可能是由「外交局」操刀，「外交局」另給托爾斯泰等兩人一封信，其中說到：「羅斯福總統致函達賴並饋贈禮品，此為西藏首次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之始，茲特准前往甘肅蘭州，其他外人不准援例請求。此行沿途不靖，特派僧官、士官各一人，士兵與人伴送以策安全。」<sup>50</sup>前面說送到青海邊界乃採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之說法，可能是大隊人馬送到青海邊界，然後由僧官、士官各一人送到蘭州，可見西藏地方當局對此二人之接待與保護相當細膩。

自 1943 年至 1950 年之間，美國與西藏之間是否還有接觸，以文獻無徵，難作推斷。不過自 1950 年六月，滯留印度噶倫堡的夏格巴曾會見美國駐印度大使韓德遜，尋求軍事支援西藏獨立<sup>51</sup>，之後十四世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及稍後達賴大哥當才活佛諾爾布先後到印度，都與美國情報系有所接觸，尤其達賴大哥當才諾爾布早在 1951 年《十七條協議》簽訂後，就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密切來往<sup>52</sup>，是否被吸收，則難以查證，不過達賴喇嘛長兄當才諾爾布曾準備偷偷將達賴喇嘛帶到印度，只是客觀情勢有所變化，使計畫胎死胎中（見註 52 所引資料），此一計畫若非有美國情報系統介入，憑當才諾爾布絕不可能有此計畫，更不可能有使計畫實現之能力，因此絕對有理由懷疑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運作。

自《十七條協議》簽訂後，中共依據該協議第二條規定，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復依該協議第三條規定，在西藏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又由於中共

<sup>49</sup> 見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頁 87，另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2~213 也錄此函，兩者譯文不同，但以直雲邊吉書所譯較為詳細。

<sup>50</sup> 見直雲邊吉所著書頁 88。

<sup>51</sup> 見王小彬《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一文頁 4。

<sup>52</sup>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達賴喇嘛的人和事》，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194。

已在西康推動土地改革等一些措施，使許多地主、活佛、寺廟（擁有頗多土地與農牧奴）、貴族受到損失，此等受損失者，多逃往拉薩，使西藏之高層心生恐懼，恐懼舊有特權將受到剝奪，因此對中共政策產生抗拒，從西康逃到拉薩藏人（俗稱康巴）不停散布中共的無神論思想，各種改革的恐怖行動，再加上外人從中挑撥，當時西藏地區瀰漫一般反共氣氛。而經過當才諾爾布、嘉樂頓珠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1957 年初，就經由達賴二哥嘉樂頓珠安排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旅居印度藏人中挑選了六名康巴人接受美國特工訓練，此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第一次訓練西藏特工，其過程有如間諜小說：某天夜間，此六位康巴人接到指令，要他們步行走出噶倫堡，在步行途中，有輪汽車將之接到巴基斯坦邊境，而司機正是嘉樂頓珠，其時一位美國官員給每人一塊長纏頭布巾與寬大的旁遮普大褲，裝扮成錫克人，通過東巴斯坦來到印度達卡，在達卡藏匿兩天後，一架飛機將之送到某不知名地方，換上美軍制服與趕來的當才諾爾布（達賴大哥，是個活佛）一起接受了兩個月的特務訓練（活佛也接受特務訓練，實屬怪事），負責訓練的美國人對之宣稱：「中國也是我們的敵人，因此我們要幫助你們抵抗中國，我們的關係要保持很長一段時間，而不只是兩、三年。」訓練的內容包括地圖判讀、使用無線電台、使用武器、跳傘等<sup>53</sup>，類似訓練持續進行若干年，其時尚未發生拉薩動亂（事在 1959 年三月十日），從美國的介入，有理由推測 1959 年三月拉薩動亂與達賴出逃，都與美國脫不了干係。

美國中央情報局憑藉龐大的財力，既是無孔不入，又是無惡不作的一個間諜機構，吸收各種身分者為其爪牙，遍佈全球各角落，以美國利益為藉口，在全球各地為非作歹，既已秘密訓練若干康巴人，又見西藏上層僧俗與中共在藏軍政人員產生磨擦，正好可以見縫插針，收買藏地分離分子，利用康巴人離鄉背井喪失家園的不滿心態，由經過中情局訓練者從中鼓動群眾鬧事，由於情報工作在任何國家都是列為絕對機密，絕不會輕易解密，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西藏事務，一直「是西方情報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軼聞。其中細節到現在（按係指 1999 年四月）才開始慢慢從退休特

<sup>53</sup> 同註 52 所引書頁 194~195。



工出版的回憶錄，和頭髮花白的游擊戰士口述中真相大白於世。」<sup>54</sup>美國中情局內部文件把這段支援、訓練西藏從事分離戰爭稱之為「秘密行動中最浪漫的計畫」，這個介入西藏所謂「最浪漫的計畫」，事實上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sup>55</sup>。

從既有資料看，夏格巴、嘉樂頓珠等人，自始就心存西藏獨立想法，夏格巴從印度托嘉樂頓珠岳父朱洲乎致函北京中共當局，想在香港舉行商談，由於中拒絕在香港談判，堅持必須在北京舉行，之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另派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共會談，隨後西藏地方與中共北京中央雙方簽下《十七條協議》，確定了自清代以來西藏地方就是中國的領土，照理說所謂「西藏獨立」應該落幕了，然而夏格巴等人仍留在印度，而且繼續從事藏獨工作，不久嘉樂頓珠到印度，更與堪窮、洛桑堅贊、孜本、夏格巴組成「哲堪孜松」（JKTS）的組織從事藏獨活動，希望從印度、錫金得到支援，「哲堪孜松」主要與以甘托克為大本營的錫金政治專員阿巴·潘特（Apa Pant）以及印度情報局局長穆立克（B.N. Mullik）所派代表穆古·波斯（Mukul Bose）這兩人聯絡<sup>56</sup>，尋求金錢、電台與武器，以繼續從事藏獨活動，似此種視《十七條協議》為無物的舉動，實是西藏地方某些高層先行作出的，但西藏流亡組織總是指責中共破壞《十七條協議》，何不反躬自省「西藏福利會（即西藏幸福事業會）」、「哲堪孜松」因何成立，如何派員接觸美國中央情報局，接受其訓練，其目的何？在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仍然裝聾作啞不提。

在事隔數十年後的2012年，「圖博文化節」的「圖博自由影展」裡有一部名為「影武者：CIA在圖博」<sup>57</sup>，在此影片中紀錄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介入西藏獨立運動，指出在1958年起的五年裡，在美國科羅拉多州

<sup>54</sup> 1999年四月份《新聞周刊》刊出以《西藏：中國的科索沃》為題獨家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當年如何吸收藏人、協助達賴和中共打一場「浪漫」的秘密戰爭。該文由台北《聯合報》於1999年四月十四日搶先譯出，以《四十年前，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作戰》為題刊出。

<sup>55</sup> 見2012年6月8日《南德意志報》，以《神聖的表象》為題的報導，2012年12月10日台北《世界論壇報》以《達賴喇嘛的真實形象》為題摘譯刊出於第四版。

<sup>56</sup> 見王小彬《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頁33。

<sup>57</sup> 見2012年3月6日，台北《自由時報》，D9版，由郭力昕署名之《民族獨立運動與CIA》文章。

的高山地區，訓練兩百多位圖博（按即西藏）游擊隊員使用各式武器戰具；當年的幾位 CIA 官員，也見證了美國介入西藏進行顛覆中國工作的細節，一位 CIA 官員在片首的陳述相當直白，令人失笑：「我很高興能被派到圖博，比起我們 CIA 在中南美洲進行的那些工作（例如支持親美右翼獨裁政權、破壞民選左翼政府），這是個好的任務」。

當年存活至今於片中受訪的幾位藏獨戰士，固然都表達至死無悔、也一生準備為爭民族自由而慷慨就義的堅定意志，卻有不同的心情與反省。例如，一位老鬥士對於美國後來忽然放棄了支援藏獨，讓他們有受騙之感。另一位當年的反抗軍成員，在片尾做了這樣的省思：「無論美國當年是基於善意，或者只是利用了我們，在當時的情境下，我們都需要有人來協助對抗中共，因為那時沒有其他人睬理我們，而我們不能用石頭和中共對抗。我認為應該將當時美國的武力支援與軍事對抗，看成獨立圖博運動裡的一章。但它不應該是持續爭取自由的方式。」

這樣的反省有其價值。我們可從中思索，任何一個民族解放或政治獨立的運動，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情況下，固然有其無奈的條件限制；然而，一個國力處於弱勢的國家，冀望藉由對美國／CIA 的依賴，以協助（甚至有希望讓其主導的幻想）達成政治獨立的目的，這種「與魔鬼交易」的算盤，究竟有沒有勝算或可能，值得再思辨。（以上均引錄自 2012 年三月六日《自由時報》），按《自由時報》立場向來是逢中國（指歷史、文化之中國，包括中華民國與中共）必反，然而此文末段確實值得深思，通觀所引文字 CIA 介入西藏獨立活動，乃是鐵一般的事實。

至於海外藏獨團體，除了西藏福利會外，之後陸續成立的組織有「西藏青年會」、「自由西藏運動」、「西藏委員會」、「西藏之友」、「西藏中心」、「西藏人權」、「援助西藏」、「米拉日巴基金會」、「西藏基金」等<sup>58</sup>，其中「西藏青年會」一向主張採用暴力，幾乎與恐怖組織無異。更怪異的是，近年在台灣出現了由幾十個（或許百來個）逾期滯台的旅居印度、尼泊爾之藏族青年，在台獨分子支持下，組織了所謂「圖博之友會」，一方面要求准其長期居留，甚至要求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另一

<sup>58</sup>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292。

方面又要求西藏獨立，這根本是矛盾的要求，要求西藏獨立何不返回西藏去打游擊，在台北街頭叫囂西藏獨立豈會成功，正如同約近二十年前，老台獨史明所說的：「要達賴回去西藏打游擊，西藏獨立才會成功。」<sup>59</sup>

最早與美國情報單位合作，也可以說被美國情報單位收買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於 2015 年已經年屆八十七歲，出了一本書書名為《葛倫堡麵條商人：我為西藏奮鬥的故事》，具有回憶錄性質，書中說到，1959 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一直都是美國中情局在策動並協助。此後三十年間，嘉樂頓珠一直遊走美國中情局、印度情報局之間，如今（2015 年）他發覺美國只是為了（美國）自己的利益，不惜挑起漢藏衝突，並深化與印度的誤解，他的結論是：「與美國中情局的合作，是我一生都懊悔的事。」<sup>60</sup>嘉樂頓珠年屆耄耋，總算明白他一生都被美國中情局玩弄了，能明白這一點，也算認清美國霸權主義的真面目，對任何國家及該國家的異議分子雖給予支援，但只把對方當衛生紙一樣用完就丟，嘉樂頓珠能滲透這一點，就如陶淵明所說的：「覺今是而昨非，實迷途其未遠」，如果能放棄藏獨思維，並勸令媳別搞什麼圖博之友會，則是大澈大悟。

### 陸、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見面的小插曲

依照喇嘛教格魯派的說法，宗喀巴的兩大弟子根敦珠巴（1391~1474）與凱珠結格雷貝桑（1385~1438）就是後來的達賴與班禪，宗喀巴的三傳弟子索南嘉措受吐默特蒙古阿勒坦汗（即俺答汗）崇信，賜予「達賴喇嘛」名號，「達賴」係蒙古語，其意為海洋，「喇嘛」係藏語，意為上師，合而言之，可以伸引為智廣如海之上師（其實各部蒙古均不臨海，其所謂「達賴」者，不過指面積較大的湖泊而已）。索南嘉措不敢獨享此一稱號，乃向上推宗喀巴嫡傳弟子根敦珠巴為一世達賴喇嘛；再傳弟子根敦嘉措為二世達賴喇嘛，而索南嘉措自為三世達賴喇嘛，為將蒙古阿勒坦汗的武力作為格魯派的後盾，以便向噶舉派奪取政治權力，很巧妙的就指定阿勒坦汗的曾孫雲丹嘉措為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的轉

<sup>59</sup> 見 1997 年 3 月 25 日，台灣《台灣日報》。

<sup>60</sup> 以上這一段錄自 2015 年 8 月 15 日，台北《旺報》D3 版。

世靈童（呼畢勒罕），如此一來，等於將吐默特蒙古武力與格魯派細綁在一起，格魯派就成為有武力為後盾的教派，足以與噶舉派競逐世俗的政權，雲丹嘉措於十四歲在吐默特蒙古武裝部隊護送下風光入藏，坐上四世達賴喇嘛寶座，然而天下不假年，在二十八歲青壯之年，就圓寂了，其死因傳說紛紜，當時藏地政權仍操諸噶舉派幕後支持者藏巴汗手中，當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藏巴汗立即下令禁止四世達賴轉世，這對格魯派而言，是莫大的危機，漠南已皈依格魯派的各部蒙古，更是心急如焚，於是組織軍隊入藏，冀圖以武力迫使藏巴汗撤銷禁令，但是卻被藏巴汗擊敗，四世達賴依然不得轉世。之後藏巴汗得病藥石罔效，眼看即將不久於人世，此際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1567~1662）深通醫術，治好了藏巴汗之病，藏巴汗欲酬之以莊園及財物，四世班禪都辭謝了，但求准予四世達賴轉世，藏巴汗只有答應，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1617~1682）於焉產生，可見班禪一系實有恩於達賴一系，然而十三世達賴卻視九世班禪如寇仇，恩將仇報令人不解。

五世達賴既已轉世，四世班禪為之剃度、授經，從此班禪、達賴互為師徒成為定制，在宗教上不分軒輊，兩者地位平等。至 1904 年英軍侵入西藏，十三世達賴達往外蒙古，英軍藉口英國皇太子到印度，裹脅九世班禪前往印度會見英皇太子，更欲以班禪取代達賴，由是引起十三世達賴不悅，及至清末川軍入藏，胡作非為，達賴逃往印度，清廷也欲以班禪代之，更引起達賴之痛恨，民國肇建達賴返藏，在態度上已全面親英，遂對班禪之日喀則地區強行徵稅，九世班禪深知此乃項莊舞劍，如不及時脫身，恐有性命之虞，遂逃到內地，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不和遂公開化，十三世達賴及其噶廈全面倒向英印，背叛國家，九世班禪在內地弘揚喇嘛教法，普受漢蒙人民歡迎，有極高聲望與社會地位，及至 1933 年十三世達賴圓寂，照理應是班禪返藏之大好機會，但以帝國主義者干預及噶廈作梗，九世班禪始終無法返藏，最後在青海玉樹圓寂，當時國民政府雖已是日薄西山搖搖欲墜，但仍維持中央政府尊嚴，毅然選定九世班禪之轉世靈童，並派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主持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坐床大典，時為 1949 年。

同年中共宣布建政，並誓言將進軍西藏統一全國，將帝國主義殘餘勢

力逐出西藏，1951 年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共中央簽定《十七條協議》，在法律上西藏地方政府總算擺脫了有形的帝國主義控制，但噶廈政府官員及達賴的三位兄長（土登諾爾布、嘉樂頓珠、土登桑丹）或仍親英，或已成為美國情報單位的爪牙，仍然在暗中配合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的陰謀，暗中從事分裂活動。依據《十七條協議》第五、第六條條文為：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因此當中共軍隊入藏後，班禪額爾德尼返藏問題就成為必須解決之事，依《十七條協議》第六條規定，班禪與達賴的固有地位與職權應維持在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所謂「和好相處時」，係指 1904 年英軍侵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出逃外蒙古一事之前，雖然達賴在政治上擁有較高權力，但並無權統治札什倫布寺所在的日喀則地區，且兩者在宗教地位上完全平等，絕無高低之分，這已經是喇嘛教格魯派的一種傳統認知；但是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受英、美帝國主義豢養的官員及十四世達賴的幾個兄長，深恐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一旦返藏會威脅到其既得利益，更擔心會影響到其所暗中推動西藏獨立的活動，而英、美、印等國絕不願見到中國真正的統一，於是這些藏獨分子在達賴與班禪會面的儀式上玩小動作，原本班禪、達賴在宗教上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不應有誰向誰磕頭的問題，而是彼此以額頭碰額頭方式，以示平等；而坐位上也是一樣高，這是傳統達賴、班禪會晤既成的儀軌，而且事前中共西藏軍區與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都跟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商討，達賴、班禪見面時的儀軌時，達賴方面的官員（其時十四世達賴尚未親政）提出：班禪會見達賴時要向達賴磕頭、班禪的座位要比達賴低兩格，班禪要向達賴朝貢，且不讓班禪駐錫大昭寺，這些意見不僅有違格魯派傳統習俗，如果喇嘛教宣稱是佛教，這豈不是太過於「我執」了，一旦著相，就見不得如來，可見當時這一批離心的藏獨分子既不尊重傳統，同時也彰顯了喇嘛教不是正統的佛教，否則何以如此的「我執」呢？當中共方面將這意見轉告班禪額爾德尼後，班禪堪

布會議廳人員頗為氣忿，一度主張乾脆不進拉薩，直接回日喀則。於是雙方爭執不下，經過中共西藏工委會從中調解，最後班禪方面放下「我執」，同意班禪可以向達賴行磕頭禮，達賴起立回禮，然後兩人再行碰頭的平等禮（見本文註 52 所引書頁 97），而且座位一般高，這是事先談妥的會晤儀式。

1953 年十二月十九日，班禪一行從青海西寧啓身返藏，於 1954 年四月二十八日抵達拉薩市區，不料西藏地方噶廈政府那一批受外國參養的野心分子，在會晤儀式上要花招，當班禪向達賴行磕頭禮時，達賴竟不起立，儼然一副長輩對晚輩、長官對部屬模樣，何曾有四大皆空的修為？不僅如此，原先約定班禪、達賴兩人互獻哈達，也變成班禪向達賴獻哈達，而達賴只收不回，此外，又把班禪座位壓得很低而且擺在傍邊，這些小動作不僅違背了事先的約定，而且更凸顯了達賴身邊的那一群搞分離動作者格局太小，我執太深，如此氣識看來也只配作洋人的爪牙，這群人的作為自然引起班禪方面人員的不滿。班禪警衛營中的衛士氣憤到幾乎要開槍，所幸被制止，未釀成大禍，當中共在藏高層張國華為此向達賴方面詢問何以如此出格作為，噶廈方面勉強說：「不知道，可能是譯倉（秘書處）改變的。」這種雲淡風輕一推三二五的解釋，是當時噶廈政府「固優為之」的處事方式，但至少等於承認了這種做法是不對的（見本文註 52 所引書頁 98），如所周知，貶抑別人，並不會提高自己。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首次會晤是不愉快的。

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的失格作為，使中共在藏軍政人員提高了警覺，知道噶廈政府的任何承諾都未必會確實兌現，而噶廈方面也意識到自己所玩的把戲已被中共識破，不得不有所收斂，因此在班禪與達賴第二次會晤時，便依照原先承諾的儀式進行，互換哈達、互碰額頭，進行了愉快交談。六月九日，噶廈政府派首席噶倫然巴·圖丹滾清前往班禪駐錫的大昭寺，舉行隆重儀式，正式承認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固有地位與職權。當天中共駐藏機構、噶廈以及中共軍隊、拉薩市民，以隆重儀式，歡送十世班禪返回日喀則，更詳細情形可參看牙含章《護送班禪額爾德尼返回西藏的回憶》，此文刊載於《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創刊號（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69~192），另范明《護送十世班禪大師返藏紀實》（刊於《文史

資料選輯》第 29 輯)。

現在且看夏格巴如何歪曲史實，他在《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59 作如下的記載：

「水龍年三月四日（公元 1952 年四月二十九日）十世班禪大師卻吉堅贊主從一行及中國大批警衛部隊從青海到達拉薩，達賴喇嘛要在布達拉宮東日光殿接見，按舊例設鋪法塵。對此扎什倫布寺的侍從們大為不滿。其後臨時行，不得不改在羅布林卡宮中舉行私下會晤。《協議》的各條款中規定按照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和睦相處時的地位和職權對待，西藏政府執行了規定，但紅漢人采用分裂西藏人的卑劣主張和手段，致使多次出現如此難辦和複雜的情況。由於這世班禪大師首次來到自己的寺廟扎什倫布寺，故特派噶倫喇嘛讓巴·土登袞欽及助理人員一行前往祝賀坐床。」

看他說得多輕鬆，按當時夏格巴人在印度，根本不知道噶廈政府所玩的小把戲，而夏格巴反過來說「紅漢人采用分裂西藏人的卑劣主張和手段」，但卻沒說什麼主張和手段，這種含血噴人才真正是卑劣的手段，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大多類此，如果要一一指出，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掃不完。

### 柒、拉薩動亂與達賴出逃

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依該協議中共軍隊入藏，成立「西藏工作委員會」次第推動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工作，但此際西藏舊貴族、地主、活佛深恐既有權益受損，而自康區逃到拉薩為數不少的康巴舊地主，大商人，或許受到美國 CIA 鼓動，在拉薩組織所謂「四水六嶺志願衛教軍」，所謂四水是指金沙江（長江上游）、瀾滄江、怒江、雅礱江；六嶺則指擦瓦崗、芒康崗、麻則崗、木雅繞崗、巴莫崗及澤貢崗而言，也就是青康地區的總稱（見前引厲聲、孫宏年、張永攀所著《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一書頁 164，但藏人茨仁夏加於其撰《龍在雪域》，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頁 593，則指四條河流為怒江，藏語稱嘉莫歐曲，長江藏語稱則曲，瀾滄江，藏語稱扎曲、黃河藏語稱瑪；六

嶺爲色莫崗、繃波崗、木雅熱崗、擦瓦崗、芒康崗、瑪扎崗。兩者略有出入，但總在青康地區），其使用「四水六嶺」一詞，意在表示全體康巴、安多一起來反共，提出西藏獨立，反對中共的一切改革，於是竄擾昌都、丁青、里河、山南等地區，殺戮中共幹部、破壞交通、襲擊中共中央派駐當地機關、部隊、並到處掠奪財物、殘害人民、奸淫婦女，簡直與強盜無異，當時中共中央仍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能負責處理此等亂象，而中共中央也表示西藏的改革可以延緩五年後再談，但是那些逃到拉薩的康巴所組成「四水六嶺志願衛教軍」與西藏僧俗高層卻把中共的讓步當成是軟弱，因而宣稱：「九年來，漢人動也不敢動我們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只要我們從外地調一批武裝到拉薩，一打漢人準跑，如果不跑，我們就把達賴佛爺逼往山南，聚集力量，舉行反攻，奪回拉薩，最後不行，就跑印度。」（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所著書頁 165）從此可見這些「四水六嶺志願衛教軍」從組織伊始，就有劫持達賴喇嘛的打算。

1959 年二月七日，是達賴喇嘛主動向中共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等提出：「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給安排一下。」到了三月八日，達賴確定於三月十日前往軍區禮堂觀賞表演，結果這一件簡單的事，被四水六嶺衛教軍會同噶廈政府高層僧俗官員解釋成：西藏軍區要趁達賴前往看表演時，將之劫往北京，於是一方面勸告達賴不要去看表演，另一方面發動拉薩市民到羅布林卡請願，阻止達賴去看表演，三月十日早晨有二千多藏人到羅布林卡，隨後蓄意肇事者竟然召開所謂「人民代表會議」、「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宣布西藏獨立，等於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看表演一事自然作罷，其時拉薩已是一片混亂，次日（三月十一日）達賴致函中共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該信全文如下：

「親愛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計較，送來的信（按三月十日譚冠三曾致函達賴，以情況混亂，不來無



妨)出現在我眼前時,頓時感到無限的興奮。

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設法平息,幾天以後,情況安定了,一定同您見面。您對我有何內部的指示,請通過此人(按指送信之人,即阿沛·阿旺晉美)坦率示知。

達賴喇嘛親筆呈」

此信引自直雲邊吉所著《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書頁 24~25,信末署「達賴喇嘛親筆呈」,理應是藏文,可惜沒有附上藏文原件影本,只見漢文譯文,如能附上藏文原文,當能增加其公信力。拉薩情勢益發混亂,期間達賴與譚冠三頻有信函來往,三月十六日,達賴又回譚冠三一信如下:

「您十五日來信,方才三點收到,您對我的安全甚為關懷(按譚冠三於十五日曾致函達賴,為其安全起見,曾邀達賴及其隨行人員到軍區暫住),使我甚感愉快,謝謝。

前天藏曆二月五日(公元三月十四日)我們政府官員的代表七十餘人講話,從各方面進行教育,要大家認真考慮目前和長遠的利害關係,安定下來,否則我的生命一定難保。這樣嚴厲地指責之後,情況稍微好一些。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很難處置,但我正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限。一旦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以後,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屆時先給您去信,對此請您亦採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見,請經常來信。達賴十六日呈。」(見直雲邊吉所著書頁 28~29,另厲聲、孫宏年、張永攀所著書也錄此信,見頁 168,均可惜未附藏文原函)

從上引達賴信函可見至少在三月十六日之前,達賴喇嘛本人與拉薩動亂扯不上關係,但也無力平息動亂,顯然達賴已經處於被四水六嶺衛教軍與噶廈政府控制之下,稍早於三月十三日,這些意圖製造事端者,在羅布林卡設立動亂總部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名義,向各宗谿谷(縣莊園)下

達命令，稱：「所有十八歲至六十歲的男人，都必須自帶武器、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遲緩。」「如果對宗教事業不負責任，貪生惜命者，定將依法懲處。」（見直雲邊吉書頁 27），達賴既無力控制這個「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反過來就是被這個動亂組織所控制，於是情勢益發不可收拾，這些動亂分子最終把十四世達賴喇嘛「保護」起來，然後裹脅他離開拉薩（見厲聲等三人所著書頁 169），當時噶廈中由帕拉決定達賴要隨同動亂組織離開羅布林卡，此時他送了一封信召喚兩個美國中情局的間諜阿塔與羅才前來，當時這兩個間諜人在拉薩市東南方靠近隆子宗的地方<sup>61</sup>，可見達賴之出走多少帶有被挾持性質，而出走途中有美國中情局間諜協助引路及與外界聯絡（該二間諜擁有無線電台。（隆子宗現為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隆子縣）

1959 年三月十七日與達賴出走的有達賴及其隨同人員索康、柳霞、夏蘇三個噶倫，經師林倉、副經師赤江、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副官長帕拉、達賴母親、姐姐、代本彭措扎西（係達賴姐夫，漢名黃國楨，曾就讀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能說頗標準之普通話，出逃印度後，曾多次來台）、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及同家屬，擔任警衛之兩百名藏軍，共有六百多人，於三月十七日夜間十時左右逃離拉薩。這一行六百多人到達山南隆子宗後，宣布成立臨時政府（藏語噶丹頗章），並由其噶廈向西藏各地發出如下的一份布告：

「致各地各宗溪：

事由。眾所周知，雪域西藏上千年前就是政教兼備的獨立國家。曾一度與中國滿洲皇帝結為福田、施主關係，遂出現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爭論。然而，噶丹頗章政府繼續行使西藏獨立自主的政教權力，有保衛國家的軍隊，自己製造武器，金銀銅幣和紙幣等在所有民眾中發行、流通，在郵遞的信封上貼西藏的郵票，同外國直接聯繫，等等。除了國家大小之差別外，同世界上各獨立國家一樣具備完整的獨立國家的標誌和一

<sup>61</sup> 見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頁 256。而作者係根據帕拉·圖登維登口述檔案，該檔案現存達蘭薩拉「西藏文獻與檔案圖書館」，分別見該書頁 600 及頁 576。

切條件。但是，在公元 1950 年，紅漢人共產黨專橫地把軍隊開到西藏，因人口和武器各方面都不足以還擊，中藏之間遂簽訂十七條協議，它是根本沒有向西藏政府徵詢和商議，按照紅漢人的意願，強迫和強加的。從此，達賴喇嘛、西藏噶丹頗章政府和西藏僧俗人民雖盡量周到，誠心建立友情，屈意奉承，但紅漢人政府和駐藏紅漢人軍隊不遵守協議，摧毀康區各寺院，尤其是視佛教、喇嘛和僧人為主要怨敵。總之，將佛教創始人具足慈心的世尊薄伽梵認定為反動派，極盡其曲解、誹謗、謾罵之能事，並廣泛地在報紙上散播，使追隨佛陀的一般信教者，特別是西藏尊卑男女僧俗不由自主地深深反感。中國人對西藏的非法鎮壓和殘暴折磨年復一年毫無節制，有增無已，直接和間接證明了他們要鏟草除根地對西藏人民視為比生命珍貴的佛教及其守持者加以毀滅，令宗教、語言、衣食和裝束都同中國人相異的西藏全體僧俗人民悲觀失望，處於無法忍受的痛苦和憤怒之中。藏曆九百三十三年（藏曆以公元 1027 年為計算的起始年），中國人邀請西藏政教共主怙主達賴喇嘛和負責政治的噶廈為首的官員等前往西藏軍區觀看演出，卻送來通知說，達賴喇嘛的警衛人員不得攜帶武器，實際上存什麼壞心眼不得而知。由於暫時人力懸殊，只得唯中國人之命是從，決定前往觀看演出之際，三大寺的喇嘛和執事、僧眾、政府僧俗公職人員、拉雪逾萬僧俗人民聚在羅布林卡門前，聽說怙主達賴喇嘛要去中國軍營觀看演出，想到紅漢人進藏八年中所做的空前絕後的舉動，於是，又是磕頭，又是哭喊地加以阻止。同時，由於中藏雙方宗教、制度各方面水火不容，無法並存，全體人民的心中積聚的痛苦同時併發出來，上街遊行，宣布從這天起獨立，脫離中國人的統治，等等。獨立鬥爭的嚴重紛亂真正出現後，達賴喇嘛盡量設法安定局勢，勿使中藏之間出現麻煩，對人民代表作了很多重要、深刻的教誨。但是，全體僧俗人民無法消除心頭之恨，不肯聽取，武裝起來的大批自願軍將（洛桑）宮附近和大昭寺包圍，加以防範和警戒，中藏和睦關

係隨即嚴重破裂。但是，達賴喇嘛還希望穩住中藏和睦關係，盡量巧妙地維持和睦和友好。駐拉薩的紅漢人官員卻拒絕伸出友誼之手，一心準備武力鎮壓。為此，大規模準備武裝部隊。藏曆二月初八日拉薩時間下午四時，紅漢人軍隊向達賴喇嘛所住宮殿的北邊發射兩枚炮彈，落在（洛桑）宮圍牆 80 米處，幸好沒有爆炸，不然達賴喇嘛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危害。由於真正發生了這些糟糕的情況，西藏全體僧俗群眾再三懇請達賴喇嘛暫時避難他方，忠誠地陳述現實的利弊。就在那天夜裡，怙主達賴喇嘛、兩位經師、負責政治的噶廈，此外益倉等少量侍從人員突然秘密出發，現在住在山南地區。目前處於戰亂期間，負責政治的僧俗官員和西藏人民不放心達賴喇嘛不慌不忙地停留在藏境，為了西藏和整個藏區利樂的根源—政教，以及所有眾生當前和長遠的巨大利益，要迎請（他）至外國適當的地方。紅漢人軍隊僅僅占領以拉薩為代表的個別城市，噶丹頗章政府卻繼續掌握衛藏上中下三部的政治權力，現在，重新建立完全獨立、政教兼備的噶丹頗章政權，因首都拉薩處在動亂之中，決定暫時設在玉杰隆子宮，任命卸任代理司倫洛桑扎西和卸任代表司倫德喀瓦二人為正式司倫，已另外頒布了蓋有達賴喇嘛私章的諭書。

藏曆第九百三十年，陰土豬年二月十七日，值宿木曜圓滿之日—吉祥之星期四，為了首次打開吉祥之門扉，政教兩方面的主宰達賴喇嘛祝願政教興隆，眾生安樂，特別是西藏僧俗民眾常享幸福昌盛的盛德，以此甚深的真言養攝持。此情令全體僧俗文武官員和民眾均無比歡欣，高懸吉祥的勝幢、舉行盛大喜宴。你們接到叫噶丹頗章的西藏獨立國重新成立的喜訊文告後，應向屬下全體人民廣為宣傳，做到家喻戶曉。全體男女要盛裝打扮，懸掛吉祥彩旗。寺廟僧眾要舉行吉祥長淨儀式、供養三寶之所依。俗人部眾應焚香祭祀，唱歌跳舞，隆重慶祝到手的自由。今天，政府或個人凡應該報告的事務均得呈報首都玉杰隆子。對文告的內容應該擁護，接受。不但應準確無誤地

認識到西藏宗教是公眾之事，是關係當前和長遠利益，至關重要；而且應牢記從現在起可以盡情享受自由、法、財、幸福的新圓劫喜宴。切切此諭。

噶廈，土豬年二月十三日於玉杰隆子宮」<sup>62</sup>

這一篇長達一千七、八百字的「文告」，簡直就是一篇「獨立宣言」，最近幾年達賴曾經一再表示他沒有訴求西藏獨立，如果他回頭看看這篇「文告」，就顯得他何其的二三其德了。當這一行六百多人在隆子宗成立臨時政府時，原想就地與中共對峙，後來得知中共軍隊正向南逼進，便趕忙進入錯那宗（在隆子宗正南方，今山南地區錯那縣），短暫停留，透過美國中情局所派特務與印度方面聯繫，得知印度願意收留之後，於三月三十一日跨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度控制區<sup>63</sup>，從此流浪海外，至今（2016年）已近一個甲子。

## 捌、結語

在中國歷史文獻中，唐時始見吐蕃一詞，其時吐蕃確實不屬於中國唐朝，而是與唐朝對峙的兩個政權，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元朝，元朝將吐蕃納入版圖，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也是不可更易的史實，任何狡辯都無法重寫歷史，正如同北美洲曾經是大不列顛帝國的殖民地一樣，無法變更，同樣的，中國明代也確實不曾實質統治今天的西藏自治區，但今天西藏各教派首領的封號，幾乎都是來自中國明朝，如今日噶舉派的「大寶法王」，就是明朝所封賜的，這都是既有的史實，無需諱言，也無從否認。至於「達賴喇嘛」之名號，乃是吐默特蒙古阿勒坦汗（或作俺答汗）授予格魯派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與西藏人無關，及至清雍正（1723~1735 年在位）時，正式派大臣駐藏辦事，且派兵駐守西藏重要地點，從此西藏又成為中國領土，否則如何派出駐藏大臣、如何派兵駐守西藏重要地點？

但因西藏位處世界屋脊，俯瞰中亞與南亞次大陸，具高屋建瓴地緣優勢，俄、英為競逐中亞，均想染指西藏，而清代對邊疆採民族隔離政策，

<sup>62</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98~300。

<sup>63</sup>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頁 169。

禁止西藏、蒙古、天山南北各邊疆少數民族與漢人往來，使藏、蒙、維、哈、回……各邊疆民族無法對國家產生向心力，也無法與構成中國主體民族的漢人交流、混融，及至咸同之後，清朝國力不振、邊政不修，俄羅斯以其境內有布里雅特、喀爾瑪克兩部蒙古，均崇信喇嘛教，會十三世達賴喇嘛初立（清廷特准其免予金瓶掣籤），俄羅斯派經過訓練之布里雅特蒙古喇嘛道爾吉（此人有極多化名，可知其非善類），攜大量金錢入藏習經，獲得格西名位，更賄賂藏中僧俗高層，謀得十三世達賴之侍講，從此夜以繼日灌輸尚在稚齡的十三世達賴以離中、親俄、反英思想，確實收到預期效果，英國不甘落於俄國之後，遂於 1904 年以武力攻入拉薩，十三世達賴率部分僧俗官員向北過青海、甘肅嘉峪關進入外蒙古，其目的是欲進入俄境冀獲得俄國保護，惟當年在我國東北發生日俄戰爭，俄國戰敗，自不敢收容十三世達賴，遂在外蒙古逗留兩年多，清廷爲恐生變，乃命其返回關內，初在青海塔爾寺駐錫，之後到五台山禮佛，繼而入京陛見，遂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多次接觸，爲求得能返回拉薩，繼續在其喇嘛王國內威福自作，對英國態度丕然大變，從反英轉而親英，會光緒、慈禧先後崩殂，乃趁清廷忙於國喪期間奏准返回西藏，從此一面倒向英國，俗語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於是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有了一批親英分子，從此有意背離中央，及至民國肇建之初，且一度與外蒙古私下簽訂「條約」彼此互相承認「獨立」，由是對中央的態度是若即若離，1928 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至少在表面上內地復歸統一，西藏與中央又開始有所接觸，至 1933 年十三世達賴圓寂，中央特派大員黃慕松入藏致祭，與藏地攝政熱振呼圖克圖有所交涉，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關係始見有所改善，但熱振所爲，竟招致藏地親英分子之忌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終於熱振呼圖克圖被毒害而死，本文首節已有敘述，其後一連串事件本文也均加以敘述，惟對 1951 年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一事，在此有加以補充必要，夏格巴於其所撰《藏區政治史》一書對簽署該協議，提出如下說法：

「起初，以為是和平、平等地進行商討，是合法的，故昌都基巧帶著外出噶廈的圖章，各位代表也帶著標誌各自權力的圖章，但結果全是在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下強行簽訂協議，因而全體代表說沒有圖章。於是，中國政府就偽造了圖

章，令他們蓋上後，把圖章保存在北京，包括簽字時用的筆也保存起來。」<sup>64</sup>

夏格巴這個說法極為荒謬，設若中共果真是以「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的方式「強行簽訂協議」，豈容西藏代表把圖章藏匿起來，更何況蓋章之後還有簽字，難道簽字也是假的？夏格巴說這些話已經是《十七條協議》簽訂後很多年，十四世達賴流亡印度之後（1959 年），1963 年之後此書始出版，距簽訂《十七條協議》已有十二年之久，此時說《十七條協議》是被迫簽訂，其誰能信，更何況所說圖章是偽造的，那麼簽字呢？何以不說簽字也是偽造的？可見夏格巴是在說謊。

且再進一步看，當阿沛·阿旺晉等五人，於簽訂《十七條協議》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及兩位司曹，即魯康娃與洛桑扎西遲遲不願承認以及接受《十七條協議》，一直拖到 1951 年九月下旬（《協議》是在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足足有四個月之久，負責簽訂該協議的五位西藏地方所派代表，商討了噶廈不願接受《協議》的問題，並且商定由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告訴其他噶倫（阿沛·阿旺晉美也是噶倫），如果他們認為接受《協議》有困難的話，就應該召開「民眾大會」（即之前所說的「僧俗民眾大會」），以便阿沛·阿旺晉美能夠解釋《協議》的條款<sup>65</sup>，噶廈採納了此項建議，並於 1951 年九月二十八日召開「民眾大會」。五位簽署《十七條協議》的西藏代表在阿沛·阿旺晉美帶領下，出席了此項會議，阿沛·阿旺晉美用了一個多小時向與會者作了詳細的解說，最後他說出以下幾句話：

「假如你們覺得《十七條協議》將有益於政教合一制的統治形式並且有助於達賴喇嘛的活動，那就接受這項《協議》並附諸實施，然而，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做錯了，那麼你們可以以我們置內部指示於不顧之罪名對我們進行懲罰，無論你們想要

<sup>64</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53。

<sup>65</sup> 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842，梅·戈爾斯坦係引自土登丹達（也為簽訂該《協議》代表之一）《回憶「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樂于泓說是阿沛請求召開「民眾大會」的，見《進藏日記摘抄》，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藏文版）1985 年第六輯；桑頗·丹增頓珠（四品官）訪問記。

怎樣處置我們五位（代表）的身體、生命和財產，並且不得不這樣做，那就盡管處置吧，我們不會感到遺憾或後悔。」<sup>66</sup>

阿沛·阿旺晉美解釋完之後，率同五位簽署《協議》的代表離開會場，以便「民眾大會」討論此一問題。經過頗長一段時間討論之後，與會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十七條協議》對西藏原有的政教合一制度與莊園為基礎的社會制度都無妨礙，於是「民眾大會」建議達賴喇嘛認可這項《協議》<sup>67</sup>。設若在北京簽署這項《協議》，時中共當局真有「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式的作為，阿沛·阿旺晉美等五人在拉薩召開的「民眾大會」上，豈有不說出之理，可見夏格巴說謊成性杜撰成習之劣質性。

《十七條協議》既經藏地「民眾大會」認可，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十四世達賴喇嘛遂正式致電中央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該項電文特以中共特有的術語寫成，該電文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于 1951 年四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已于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西藏地方政府達賴喇嘛

公曆 1951 年 10 月 24 日

藏曆鐵兔年 8 月 24 日」<sup>68</sup>

此一電文顯然不是在「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下所發出的，這無異狠狠的刮了夏格巴一記耳光。

<sup>66</sup> 同註 65 所引書頁 842。

<sup>67</sup> 見土登丹達《回憶「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桑頗訪問記，但此處係轉引自梅·戈爾斯坦書下冊頁 843。

<sup>68</sup> 塔斯社 10 月 27 日報導中共新華社刊發之上述電函，此電函保存於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92998），此處引自梅·戈爾斯坦書下冊頁 843。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有刀槍，勢力大；有真理，天不怕。（白族）

真理無敵，風雨無情。（蒙古族）

純鋼折不灣，真理駁不倒。（維吾爾族）

手掌遮不住太陽，謊言辯不過真理。（藏族）

如果是夜明寶珠，放在那裡都閃光。（景頗族）

參天大樹，有根才能長新葉。（毛南族）

人往大處看，鷹往高處飛。（納西族）

伸手容易縮手難，張嘴容易閉嘴難。（回族）

成人易，做人難。（烏孜別克族）

禿子找花不難，戴花難。（維吾爾族）

進山要帶柴刀，進城要帶錢鈔。（苗族）

結實的包頭靠扎，漂亮的獵槍靠擦。（傈僳族）

筍子不割成竹，穀子不收成泥。（佤族）

兄有弟有，不等於自己有。（布依族）

樹枝沒有一般齊的，力氣沒有一樣大的。（哈尼族）

看人看心，聽話聽音。（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試論雍正朝「國舅」隆科多在康、雍之際的政治活動及影響

袁公瑜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

### 摘要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在康、雍年間，隆科多是活躍朝廷政治舞臺上的一個重量級知名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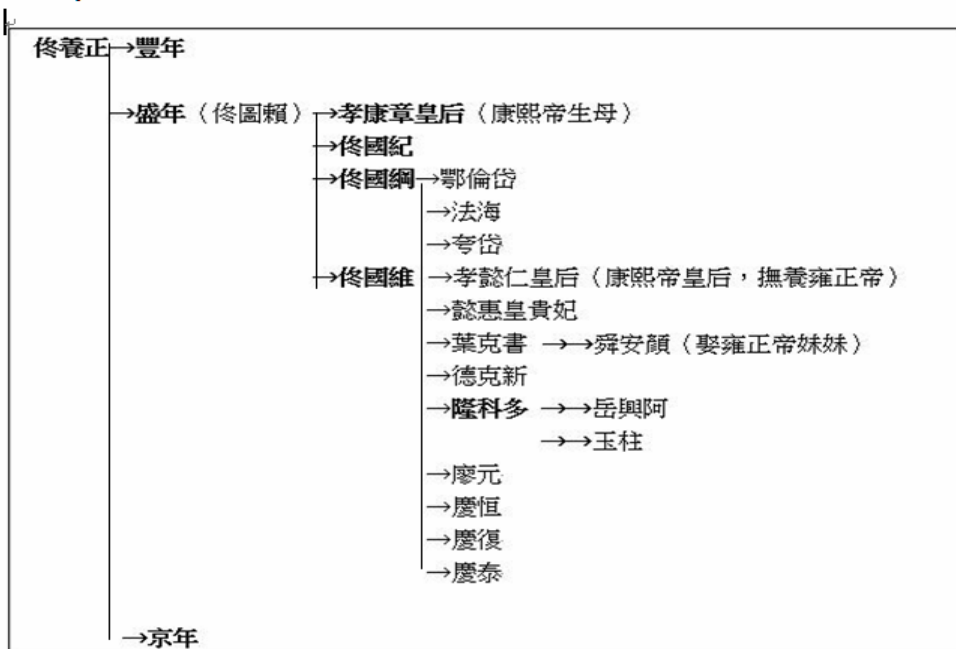
康熙朝中期，隆科多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管理步軍統領衙門，進退有度；兼任理藩院尚書，恪盡職守，為康熙朝京城治安、民族關係友好做出貢獻，可說是一個勇於任事的能臣。

康熙帝駕崩時，隆科多輔國安邦，為清政府政治穩定發揮舉足輕重作用。雍正帝即位後，下諭稱其「國舅」，授吏部尚書，對他極為寵信。隆科多卻在權力膨脹下，招權納賄敗壞雍正朝官箴，結果身陷囹圄，落得悲慘下場。

《清史稿》「隆憑藉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作為康、雍之際政治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隆科多「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充滿傳奇色彩政治人生路上的政治作為及影響，值得後人研究借鑒。

**關鍵字：**隆科多、國舅、步軍統領衙門、雍正朝

## 一、功勳望族家世顯赫

隆科多家世表<sup>4)</sup>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從黃帝開始一直到清朝溥儀皇帝退位，歷史上總共出現過 558 個皇帝，包括 396 帝 162 王。<sup>1</sup>在這幾百位皇帝掌權，治理萬民的歲月裡，皇帝們手下聚集了許多的文臣武將，為維繫君權長治久安，盡心竭慮。

文臣武將們的進身途徑，文臣不外乎是自幼研讀四書五經，進闈場通過科舉，取得功名步入官場，受到重用飛黃騰達躋身廟堂之上，成為襄贊國之大事的重臣。武將則多是少時習武英勇之輩，練得好功夫，通過武科馬、步射考試，獲得武生資格（俗稱武秀才）後，投身軍旅報效朝廷，取得軍功升官晉爵，成國家棟樑柱石。大臣們出將入相，開創光明前途，在朝廷上手握權柄，克盡厥職輔佐皇帝安邦定國，安享光耀門楣富貴榮華。

不過政治詭譎多變，宦海浮沉也難盡如人願，很多大臣今朝執掌大權鋒芒畢露，明日可能被革除官職，遠離朝廷決策核心，甚有落至被圈被辱

<sup>1</sup> 康經彪，厲復霖，謝有明，「帝國崩圯之探索－以中國朝代更迭為例」，《黃埔學報》，62 期，頁 1。

被斬，禍延家族地步。

雍正朝重臣隆科多(䄑，Longkodo)，從總理事務大臣、吏部尚書、「舅舅隆科多」位極人臣的地位，到犯「四十一條大罪」被圈的政治人生路，樓起樓塌速度之快，令議論者多方揣測，紛以「狡兔死、走狗烹」，解釋其中千絲萬縷的原委，紛紜無解的傳言，也留給了後人撲朔迷離的想像空間。到底歷史上的隆科多，其真實面目究竟如何呢？

隆科多（？—1728），先祖世居佟佳江流域一帶(今吉林通化)，曾祖父佟養正（又名佟養真），<sup>2</sup>原是明朝萬曆年間的遼東總兵，肩負邊境禦敵保衛百姓安全的國防重任。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正月，「後金」創建者努爾哈齊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撫順新賓縣)稱「汗」，建元「天命」。他從天命三年向明朝宣戰起，率部在撫順、清河等多次對明朝戰爭中，以奇用兵屢戰屢勝，順利攻佔撫順以東諸堡，優異的領導才華，贏得了眾多東北各部族的能人猛士，追隨他逐鹿天下，馳騁疆場建功立業。

人類天性，生活中的一切行為，都是依據其認定的價值做取捨判斷。佟養正身為明朝鎮守遼東地方的最高軍事長官，聽聞努爾哈齊在用人唯才上不分族群的領導風格與英雄氣概，所部將士上下一心，判斷日後努爾哈齊必能成就一番濟世安民偉業；為此，他克服國家民族認同差異，決意投歸「後金」，建不世之功。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三月，「後金」軍攻下明朝遼東重鎮撫順後，佟養正聞知從弟佟養性已投奔努爾哈齊，於是把握時機，帶領整個家族，棄明歸附「後金」，成為努爾哈齊開疆拓土打江山的倚重力量。

明天啓元年（1621）初，佟養正隨「後金」軍征遼陽，以遊擊銜奉命守鎮江城（今遼寧丹東市）。<sup>3</sup>同年秋七月十九日，因城內降兵叛變與明軍毛文龍部隊裡應外合，導致佟養正與長子佟豐年、侄佟恆年猝不及防，於兵變中先後被縛，毛文龍威逼利誘佟氏父子及侄三人投降，佟養正及子侄不肯被辱，一起被殺；<sup>4</sup>佟養正及子侄保疆戍土，用生命和鮮血寫下的

<sup>2</sup> 佟養正（又名佟養真）（？—1621）因避諱清世宗胤禛名諱，清朝史書改稱其為佟養正。

<sup>3</sup> 遊擊，清朝武官名，官階從三品，統轄約六百至兩百名士兵。

<sup>4</sup> 清人錢曾對毛文龍「乘虛襲殺大清鎮江守將」事，有扼要的記述，曰：「隨眾泛海過鎮江，覬城中守禦單疎，夜半結眾緣城上，掩殺守將佟養真，間關報捷。既而走

壯烈事蹟，受到「後金」汗努爾哈齊高度讚譽，<sup>5</sup>也澤被後世為佟家後世子孫，留下珍貴的政治遺產。

佟養正第二子佟盛年（又名佟圖賴），常年追隨皇太極征戰各地。<sup>6</sup>順治元年（1644），佟盛年隨睿親王多爾袞進軍中原，入關後屢立戰功，憑藉軍事表現，逐步累升為三等精奇尼哈番，<sup>7</sup>加太子太保，後加封一等雄勇公。

佟盛年育有子女四人，佟家傳到這一輩，其家族在當時政治大環境所提供的「滿族化」過程中，家族中好幾代都與愛新覺羅皇室家族有嫁娶關係，在這種帶有恩賜性質，利用婚姻鞏固皇權形成的特殊血緣親屬關係下，佟家由親而貴，家族子弟個個成就斐然。

順治初年，佟盛年長女佟佳氏（1640—1663）被選入宮為庶妃，<sup>8</sup>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皇三子玄燁（康熙帝），晉升為康妃，順治十八年正月順治帝（1638—1661）駕崩，康熙帝即位，康妃被尊為慈和皇太后。康熙二年二月十一日慈和皇太后崩，時年二十四歲，諡號「孝康章皇后」。

佟盛年長子佟國綱（？—1690）早歲投身軍旅，康熙二十九年，隨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征討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在烏蘭布通戰役中，英勇殺敵壯烈殉國。康熙帝嘉其忠勇，撰文弔祭他戰功，追贈太傅。同時頒硃諭特旨加封佟家一個雲騎尉世職之殊榮，以其第三子夸岱承襲。佟國綱有子三人，長子鄂倫岱承襲公爵爵位，次子法海學識出眾，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進士，曾任皇十三子允祥和皇十四子允禩師傅及廣東巡撫。

佟盛年次子佟國維（？—1719）承襲勇武家風，曾三次追隨康熙帝遠

---

朝鮮，據皮島」清·吳騫輯，《東江遺事》，卷下，〈錢曾·也是園雜記〉，頁208。轉引自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頁135。

<sup>5</sup> 《欽定八旗通志·佟國印傳》：「父佟恆年，以驍騎校隨其從父佟養正守朝鮮界之鎮江城，太祖高皇帝天命六年，守城中軍陳良策叛，執養正投明總兵毛文龍，恆年亦被執，不屈死，贈騎都尉世職。」

<sup>6</sup> 皇太極（1592—1643），是後金的第二代大汗和清朝的實際建立者。

<sup>7</sup> 子爵，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858。

<sup>8</sup> 清代後宮嬪妃：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的編制，是在康熙帝時才大致完備的。清初后妃等級制度不完善，庶妃多指未正式冊封前，沒有名號的妃子。

征噶爾丹，官至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一等公。<sup>9</sup>他是康熙帝的舅舅，也是康熙帝的岳父，更是康熙帝股肱之臣；他長女嫁給康熙帝，受到寵愛，封爲孝懿皇后（？－1689）；孝懿皇后曾撫養皇四子胤禛十年，視同己出十分呵護，康熙二十八年己七月初九日，孝懿皇后不幸因病去世。佟國維幼女（1668－1743），也嫁給康熙帝，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封爲懿惠皇貴妃，她也備受康熙帝寵愛，當時因後宮沒有再立皇后，而在宮中懿惠皇貴妃地位最高，便由她居六宮首，統攝內宮代行皇后職責，輔助天子。

佟家於康熙朝時，上承恩眷，以后妃之故，從漢軍抬旗入滿洲鑲黃旗籍，提高其出身。又出於政治考量，佟家將原漢民族的姓氏名字，改取爲表現顯著滿化色彩的滿族名字。佟氏一門英才輩出，勳貴國戚榮顯至極，開啓有清「佟半朝」雅稱。

在兩代皇帝互結姻親關係牽動下，佟國維兒子隆科多與康熙帝成至親「老表兄弟」；長大後的隆科多，又因兩個姊姊先後嫁給康熙帝，又多了一個康熙帝舅子的身份，兩家盤根錯節的聯姻情誼，到了隆科多下一代更親上加親，佟國維長子葉克書兒子舜安顏（？－1724），娶了康熙帝第九女固倫溫憲公主（雍正帝同母妹），雙方締結的兒女親家姻緣，繁衍後裔形成綿密重疊的「你血中有我，我血中有你」血緣親情，讓佟氏家族權勢桂冠，更添輝煌光芒。

## 二、祖上餘蔭進入仕途

隆科多（？-728）的出生年月日，正史、野史都未見確切記載，無從可知，他入朝當值辦事確定時機也不詳。只知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靠祖上門蔭，隆科多進入官場爲朝廷效力，充任康熙帝的一等侍衛（*ᠠᠭᠤ ᠵᠡᠷᠦ ᠬᠢᠶ᠋ᠠ*，uju jergi hiya）<sup>10</sup>，扈從康熙帝駕前馬後克盡職責。初

<sup>9</sup> 領侍衛內大臣（正一品）是侍奉保衛皇帝及皇室家人安全的近臣，侍衛處設內大臣（從一品）六人及散秩大臣（從二品）若干，這些職位一般都以皇室貴戚擔任。

<sup>10</sup> 清代武職正三品，也稱「頭等侍衛」，由上三旗子弟中才武出眾者充任。掌管廷宿衛以及隨扈皇帝之事。八旗世家子弟入仕的起點有差異，但入仕以後的升遷沒有出身歧視和限制。而且旗人任用與遷轉沒有文武的限制，…八旗大員子弟挑補侍衛主要途徑有二：其一，以蔭入仕者，可補用侍衛；其二，參加五年一度的大員子弟挑補侍衛。至於世家子弟特恩補用侍衛，則隨時發生，也隨處可見，清代侍衛挑補時看重身份，

期他表現普通，沒有過人的特殊事功，史料只記載他在掌乘輿供奉鹵簿儀仗之鑾儀使兼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任上，仕途平順，還有就是他奉命接任步軍統領後，自己在懇請聖訓摺上所書的「奴才自幼唯牽犬隨侍而行」等事蹟。<sup>11</sup>

狗是滿族遊獵與軍事上重要的家畜，在生活和生產發揮重要作用，滿人甚為重視。清朝入關後，在內務府設立養狗處（*ᠶᠠᠩᠭᠠᠳᠤ ᠤᠵᠢᠷᠢᠪᠠ*，*indahūn ujire ba*），掌飼養狗隨圍進哨，以供蒐畋之事，並在紫禁城內外劃撥場地，作為內養狗處與外養狗處的飼育處所。根據官書和檔案記載，康熙朝有犬房、狗房、御犬處和外養狗處等名目。犬房、狗房義同字不同，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譯作御犬處，係相對於外養狗處，實為今人的滿語漢譯。康熙帝讓滿族權貴子弟充任訓練獵犬人員，令他們隨行打獵，反映康熙帝教養訓練朝廷顯貴子弟，注重滿洲騎射藝業的深意。康熙帝重視養狗人員的素質與工作表現，曾命內務府甄別內、外養狗處和養母狗等之拜唐阿，<sup>12</sup>奏陳其出身、人品、年歲、行走年資、武藝、識滿漢文與否和家計情況等，以此標準為朝廷物色人才，康熙帝再硃批圈選挑取，表示意見。養狗人員以皇帝領導的上三旗人員較多，反映康熙帝親自指揮、注重治軍伐獵的思維。<sup>13</sup>

從內務府設定的人員甄別標準看，隆科多能在眾多官宦子弟共處的競爭環境中，嶄露頭角受到康熙帝賞識，脫穎而出成為侍衛中領導人才，不能說是全靠著承襲祖蔭，沾了先人的光。深究隆科多被拔擢的主因，應是他反應機靈，工作循規蹈矩盡忠職守。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二月辛亥，隆科多在官場上栽了個跟頭，以帶領屬下人妄行、並不實心辦事罪名，被康熙帝認為他須對屬下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負責，因此被革去副都統、鑾儀使、犬房頭領等職務，改為在一等侍衛裏行走。<sup>14</sup>受降級處分的

---

其內部升用也注重家庭背景。雷炳炎，〈清代八旗世家子弟的選官與家族任官問題初探〉，《求是學刊》，第5期，頁160。

11（步軍統領隆科多奏為署理九門提督懇請聖訓摺）《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624。

12滿語 *baitangga* 之漢語音譯，意即執事人員。

13侯皓之，「見盛觀衰--盛清諸帝飼犬活動的演變與意義」，《漢學研究》，31卷3期，頁140與147。

14 〈康熙朝實錄〉卷之222。

隆科多，記取教訓從挫折中改進缺點，努力找新出路。

機緣巧合，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二十日，衛戍京師警備和治安的步軍統領衙門長官托和齊<sup>15</sup>父子和部份大臣發生了「結黨會飲」事件，經安親王岳樂第十七子鎮國公景熙據實參奏後，托和齊被以病乞假罪名解職，隨後被逮捕，病死獄中。隆科多得力於和皇室家族的血緣親屬關係，再度受到康熙帝重用，被拔擢為署步軍統領事，<sup>16</sup>此職為他開啓一生事業發展的大機遇。

步軍統領全銜為「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職責是統率京師滿、蒙、漢八旗步軍營和京城綠營巡捕營馬步兵，保衛皇帝、護衛皇宮及京師之城門防守、門禁稽查、保甲管理、<sup>17</sup>緝捕審理盜賊、拘禁人犯等治安、民政相關事務，是個權力很大重要職務。康熙帝為免隆科多被官場盤根錯節交織的關係網浸染，重蹈托和齊覆轍；多次在隆科多奏呈請安的摺子上，語重心長告誡他處理政務，要從朝廷立場踏實做事，嚴格要求自己：「九門提督責任甚重。首要者各處防務俱應堅固；其次宜當愛兵，自持廉節，忠誠不二，至死為皇上效命。如此則屬下官兵豈有不服，即或稍有愁苦，有何怨言哉。」<sup>18</sup>「爾須唯圖公正。此職得好名難，得壞名容易。即兄弟子侄家人之言斷不可聽信，此輩起初尚有一二好事令人相信，而後必行欺罔，前費揚古，凱音布，托和齊因此而墮落矣。著不時防備之！勉之！」<sup>19</sup>

為鞏固統治需要，康熙帝需要找些信得過的人維護江山穩定，像隆科

<sup>15</sup> 托合齊為定嬪之兄、皇十二子允禩之舅，原為安親王家屬下，後轉為內務府包衣，曾任廣善庫司庫，為廢太子重要支持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出任步軍統領，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日因病被解職，被拘於宗人府。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宗人府以托合齊父在多羅安郡王馬爾渾（安親王岳樂第十五子）喪禮期間與大臣「結黨會飲」的案子，建議將其處死，其子舒起處絞監候。

<sup>16</sup> 步軍統領統率的軍隊有兩部份，一部份是八旗的步兵（組為步軍營），一部份是京城綠營的馬步兵（組為巡捕五營），統領官的全銜是「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官署設在北城，又稱「北衙門」。八旗步兵兵額，共應有二萬一千多人，巡捕五營（中、左、右、南、北）兵額總人數是一萬一千八十人。合計步軍統領所轄八旗步兵與巡捕五營馬、步兵，共有三萬二千多人，張德澤編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頁97。

<sup>17</sup> 清代，戶籍以戶為單位，設戶長；十戶為甲，設甲長；十甲為保，設保長。

<sup>18</sup>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請萬安摺〉，頁1624。

<sup>19</sup>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請萬安摺〉，頁1607。



多這樣與自己有著密切關係背景的人不多，且他也願承擔這個責任，因此任命隆科多為步軍統領時，出於擔憂隆科多的管理能力，康熙帝要求他執行公務，應掌握「分際」，以身作則肩負「風行草偃」責任，樹立「正己正人」之行爲表率。其深層意涵是規範隆科多傳承忠勇家風，明白做奴才的本份，忠心負起做奴才的責任。

「禮」在古代中國，是一種社會約束力量，這種禮儀制度在官僚政治中尤為嚴格。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君臣禮儀的「君尊臣卑」傾向也不斷被強化，到清代，這種皇權專制不但得到最極致的體現，還融入滿族君臣之禮的舊俗，連臣下的自稱也越來越謙卑，不管是軍機大臣、大學士等高官顯宦，還是親王、郡王等皇室貴胄，只要是滿人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稱奴才。<sup>20</sup>康熙帝與隆科多倆人，在血緣上雖為表至親，但政治體制上卻存在著主奴關係，因此康熙帝對隆科多的提攜與照顧，除了那份皇帝對臣子在禮儀制度上的施恩、立威、樹德表現外，更有一份姐夫對內弟的親情呵護，這份關照在隆科多心理上造成一種無形壓力，但也給了他工作上所賦予之角色定位特權，就是聽命皇帝旨意，盡忠竭慮不懼毀譽褒貶，實現國家權力對京師政治社會秩序的有力控制。

早年官場的歷練，使得隆科多深刻體會「步軍統領衙門長官」職位得來之不易，因此治軍依法行事，嚴謹有方，在偵防緝審造謠惑眾，捕捉盜賊維護京畿治安方面，建樹頗多。與前幾任步軍統領相較，隆科多的忠實勤勉及領導統御能力較好，而他的政治手腕也穩健老練，對京師安全維護起了重要作用。

十月乙亥，一等侍衛行走隆科多署步軍統領事〈*yafahan coohai uheri da*〉，通過政治忠誠度考驗，十一月壬辰實授，<sup>21</sup>從此隆科多恩遇益隆。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帝以隆科多幹練

<sup>20</sup> 「清代君臣間的禮儀」，中華禮儀培訓網 [www.liyipeixun.org](http://www.liyipeixun.org)，上網時間 2016 年 2 月 10 日。

<sup>21</sup> 清代官員任用，除了實授以外，還有其他方式，如署、攝、兼、試署、護理、加銜、革職留任等。官員初任，多係署職，以二年為限。署職也可再兼署職。以品級較低官員暫兼品級較高階的官職，稱為護理（或協理）。加銜，就是加以高於本秩的官銜，兼銜也是加銜。

負責辦事周到，拔擢他出任官階從一品的「理藩院尚書」<sup>22</sup>，委以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少數民族事務之控馭撫綏固邦翰重任，仍兼管步軍統領事務，負責京師的衛戍、警備和治安保衛的指揮調度。這兩項握有實權，能讓隆科多充分發揮能力的任命，顯示了康熙帝對他的寵命優渥、信任和倚重程度，這是滿族傳統文化以國家社稷為重，「舉能不避親」將適當的人放在合適位置上，委以重任的「尚公」精神體現，當然其中也蘊含了康熙帝出於對隆科多親情因素下的真誠願望。

除上述兩項特定的重責大任外，由於康熙帝年少時曾為權臣鰲拜結黨謀私，難以駕馭所苦，所以敏感旁人窺視君權的行徑；為此，他私下交付隆科多一項針對已被圈禁的廢太子允禔和大阿哥允禔的秘密偵防，凡兩人與外界接觸的任何言行，隆科多都要迅速向康熙帝奏呈；<sup>23</sup>此外京師內的宗室王公和部院大臣們，在私下言談間有論及擁立太子的不當言論和動向，也要一併注意。<sup>24</sup>

這些事涉皇帝與儲君間，爭嗣矛盾與權力衝突的隱匿使命，認真貫徹執行起來，是一項困難重重不易勝任的工作。雖然隆科多竭盡忠誠全力護衛康熙帝安危的經過，未見史書詳載，不過觀隆科多帶有與康熙帝共同血緣的「老表兄弟」使命感看，他善揣摩康熙帝心思的細膩性格和對京師輿情鄉俚民風的熟悉，在工作方面應是辦得很出色，得體的表現了他盡忠職守的幹練才能，為康熙帝免除了後顧之憂，才讓他開啓了富有傳奇色彩的官場人生。<sup>25</sup>

奏摺又稱密摺，是清初才出現的公文型式。清朝因襲明朝制度，臣子給皇帝的文書主要有兩類，即題本與奏本。在用法上為「公題私奏」。凡

<sup>22</sup> 理藩院是清朝統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數民族的最高權力機構，位階與中央內閣六部同等，理藩院共設旗籍、王會、典屬、柔遠、徠遠、理刑六司和滿漢檔房、司務廳、當月處、蒙古房、內外館、銀庫等機構。

<sup>23</sup>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報大阿哥心有怨言等情摺〉，頁 1609。

<sup>24</sup> 「近日京城有何謠言，…著打聽明白後奏來。」《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請萬安摺〉，頁 1608。

<sup>25</sup> 「統領之職，甚為要緊，倘令新手署理，則不明其情，不知輕重，關係甚大，」《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請擇人署理印務摺〉，頁 1619。

有關錢糧、兵馬、人命、盜賊、刑名與糾彈等公事均用題本，鈐印具題；凡有關到任、升遷、謝恩、告假及官員本人私事則用奏本，不用鈐印。奏摺的起源，大部分學者認為始行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三十五年（1696）之間，然後，逐漸發展，至康熙五十年（1711）後已相當可觀。<sup>26</sup>康熙帝希望藉大臣們的奏摺，收集些京城或地方上訊息，達到周知庶務、通達下情，充當耳目之功能。<sup>27</sup>以裨益政治清明。

隆科多追隨康熙帝十餘年，親炙過其處理朝政之高明見識，非常瞭解康熙帝性情與作風，可能年輕時讀書不夠努力，未紮實打好學問根基。出任步軍統領職務後，雖有見識卻文采稍遜，舉凡奏報京城地區關於廟宇失火、捕獲竊賊、緝捕散播謠言之人、搶劫民宅、抓偷馬騾米糧之賊、追查逃跑太監，及美化犯罪數字匿報吃案追求績效的官員和關於京城地區雨雪天氣、穀物生長、糧價漲跌、地震、民情、官吏的名聲等事，擔憂自己寫的奏摺文章語法不順，為免康熙帝震怒責備，請人代寫奏摺，導致多次在奏謝硃批教誨摺子中，被康熙帝硃批詢問：「凡事豈可隱瞞朕，朕心中有數，著再打聽，此文系你親書乎？」<sup>28</sup>、「爾之此文何人所寫？」<sup>29</sup>「還要勤打聽之，爾摺子凡此等密事，勿令人寫，爾親手寫才好，字不好不妨。」<sup>30</sup>不過滿洲人向有重內親的習俗，<sup>31</sup>所以隆科多在許多複雜的政務處理上，遇有不明事理之處，康熙帝雖呵斥之，卻未加罪，還抓住機會教誨他，做臣子不只是忠忱不二為皇帝效命；更重要的是還告誡他在統御指揮上，要廉潔愛兵維持軍譽，屬下官兵才能完成使命任務。<sup>32</sup>從上述事情，可知康熙帝很滿意隆科多在步軍統領職務上，忍辱負重忠心充當其耳

<sup>26</sup> 顧慕晴，〈資訊不對稱與奏摺制度之研究--清世宗朝的分析〉，頁 6。

<sup>27</sup> 「近日京城有何流言嗎？」《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報京城五六月所獲各案情摺〉，頁 1594。

<sup>28</sup>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報打聽景禧公掩埋法書事摺〉，頁 1611。

<sup>29</sup>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謝硃批教誨摺〉，頁 1615。

<sup>30</sup>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報張應詔侵扣銀物等情摺〉，頁 1616。

<sup>31</sup> 金啓琮，《北京郊區的滿族》，頁 4。

<sup>32</sup> 「九門提督責任甚重，首要的…，其次宜當愛兵，自持廉潔忠忱不二，殊死為皇上效命，如此則屬下官兵豈有不服，有何怨言哉。」《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步軍統領隆科多奏為署理九門提督懇請聖訓摺〉，頁 1624。

目，裨益政治清明之辦事之才。

### 三、因緣際會位極人臣

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因皇位繼承而引起的政治動盪，甚至宮門喋血慘劇，史不絕書；因此帝位繼承，向來是歷代皇朝最為重視的問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崩於北京暢春園清溪書屋，終年六十九歲。康熙帝駕崩時，由理藩院尚書、步軍統領隆科多宣口諭，傳位皇四子胤禛。隆科多承載時代重任，忠誠維護康熙帝臨終所傳遺命，順利將皇權和平交付到雍正帝手中，為政局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封建時代，每個新皇登基，人事異動都是朝中政治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帝繼位，為了有利政權平穩過渡，於次日任命貝勒允禔、十三阿哥允祥、大學士馬齊與隆科多為總理事務大臣；所有啓奏諸事，除其藩邸事件外，餘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諭旨，必經由四大臣傳出。<sup>33</sup>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帝在太和殿舉行登基大典，即皇帝位，接受王公大臣三跪九叩大禮。二十三日，隆科多受到加官晉爵尊崇禮遇，襲其父佟國維一等公爵位；二十五日，雍正帝下諭：『嗣後啓奏處，處理內外章疏、敷奏封駁，應書「舅舅隆科多」』，<sup>34</sup>以示尊崇隆科多在朝中官員朝班禮儀間的身份，及雍正帝謹守華夏儒家文化在生活層面中的「敬長尊老」禮法和倫常教養。

雍正帝繼位後，朝廷氣象更新，隆科多成為朝中德高望重的重臣。隨後，雍正帝以隆科多總理事務，公務繁重責任艱巨，諭令步軍統領事務由護軍統領袁泰署理。<sup>35</sup>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因隆科多勤勞輔弼治

<sup>33</sup> 《清世宗實錄》，卷一，十一月壬午朔。

<sup>34</sup> 清代，為防母后專權，不許後宮生母撫育自己兒子。康熙帝第三任皇后她孝懿仁皇后是國舅佟國維之女，也是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親侄女，康熙帝的表姊妹。因此雍正帝從小便由她撫養，雍正帝對這位養母感情很深，稱她「十載躬育」，後來更稱孝懿仁皇后弟弟隆科多為「舅舅隆科多」。

<sup>35</sup> 在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一篇由護軍統領袁泰等奏報緝拿太監魏柱管家等情的摺子，上面由「理九門提督事務之護軍統領袁泰」、內務府總管李延禧兩人一起謹奏。顯見隆科多確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卸下步軍統領事務，但在十二月十三日又兼管步軍統領事務，所以由護軍統領袁泰署理的步軍統領事務，可能仍歸隆科多節制。《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363—364。太監魏柱是康熙帝的哈哈珠子。

事忠誠，雍正帝賜隆科多阿答哈哈番世職爵位，<sup>36</sup>獎勵其盡忠報效，這些賞賜為佟家榮耀的門第更添光彩。十二月十三日，又授理藩院尚書舅舅隆科多，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書，主掌天下文職官吏之政令，仍兼管步軍統領事務；按清代職官制度定制，中央各部同級官員中，滿員地位高於漢員，因此吏部部務主要由滿尚書掌管，漢尚書只是陪襯而已。仕途上的屢屢升遷，讓隆科多一生的輝煌榮耀達到頂點。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雍正帝命太保吏部尚書公隆科多為正使，領侍衛內大臣馬武為副使，持節齎冊、寶<sup>37</sup>，冊立嫡妃那拉氏為皇后，掌管六宮。皇后是皇帝的正妻，有國母之尊。居中宮，主內治，其地位是其他妃嬪無法相比的。<sup>38</sup>隆科多能以正使身份奉皇帝命，授節於皇后的冊封禮中，行使宣讀冊文和寶文之責，顯示他在雍正朝除了有象徵表率朝廷的重要地位外，也可看出雍正帝對他的聖眷之隆。

清代職官等級分為「九品十八級」，每一品有正、從之分，不同品級有不同的官服，不能簪越。「頂戴花翎」則是清代用來區別官員品秩等級的帽飾與飾於冠後的孔雀尾羽，花翎分一眼，二眼，三眼，以三眼為最尊。清初皇室成員中，爵位低於親王、郡王、貝勒的貝子，方有資格戴三眼花翎，鎮國公戴雙眼花翎為稍次。<sup>39</sup>雍正二年，雍正帝賞賜隆科多，只有功勳卓著或恩寵有加者才能受賞的雙眼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髻等殊榮，以表彰其功，這些是其他大臣們無法企及的恩寵。

清代國家行政管理機關的用人權力，雖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但從吏部所從事的具體事務來看，相對於清代龐大的官員數量，皇帝掌握的用人權力，需要吏部對官員管理做最基礎的工作，也就是在通過做基礎和具體事務過程中，吏部可以通過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對皇帝施加影響。<sup>40</sup>隆科多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出任職掌文職官員銓敘勳階黜陟大權的吏

<sup>36</sup> 輕車都尉，即三品世職。安雙城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34。

<sup>37</sup> 齎冊（指皇后名冊），寶（指皇后之玉璽）

<sup>38</sup> 崔陟主編，《宮規禮俗探幽》，頁 60。

<sup>39</sup> 中國文化報，清代花翎制度：雙眼花翎賞次功勳卓著者。[www.chinataipei.org](http://www.chinataipei.org)，上網時間 2016 年 5 月 5 日。

<sup>40</sup> 孔祥文，《清代吏部》，中華文史網 [www.historychina.net](http://www.historychina.net)，上網時間 2016 年 6 月 5 日。

部尚書開始，其間他憑恃著雍正帝的寵信和重用，充分運用權力優勢管理全國文職官的任免政令，制定京內外各衙門文職官名額，或由吏部銓選，或由地方官報部任用，並按規制銓敘品秩，稽績考功過，以定升降。<sup>41</sup>，更在引見官員面謁聖上、選補官員讓皇上欽點，利用職權做出擅權結黨欺罔不法之事，受到隆科多賞識的官員，很自然地圍聚在他的周圍，結黨互相攀引，自抬身價稱是「佟選」，以顯示出身不同。這些現象不管隆科多是別有用心的任人唯親，還是來自於下層官員或同僚間的逢迎吹捧，以隆科多為核心日益坐大的勢力，影響到雍正朝的吏治，威脅到皇權的至尊地位和政權的穩定，成為雍正朝潛在的一股政治暗流。

隆科多除了在執掌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上，攫取權力的貪慾觸犯皇帝權力，傷害了雍正帝與他君臣兩人間的互信外。在其他方面，他也有不檢點的地方。有一天果郡王允禮進宮，隆科多看見了，起立表示致敬，允禮沒有注意到，與他同行的領侍衛內大臣馬爾賽告訴他，他遂欠身而過。在康熙朝，隆科多見到皇子都跪一足問安，而這時對雍正帝的親信兄弟允禮尙只起立不跪，對其他皇子之不如從前恭敬可想而知了。馬爾賽知會允禮，隆科多起立了，意思是讓允禮向對方回禮，這也是向隆科多討好。這件事，反映了隆科多在兩朝地位的變化和他的驕滿情緒。<sup>42</sup>

初始，雍正帝對隆科多的貪贓枉法所為，採取寬容態度，未予深入追究；後來隆科多招權納賄亂象越滾越大，為遏阻隆科多結黨營私敗壞吏治，危及朝廷安定。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六日，雍正帝頒示御製《朋黨論》炯戒群臣：

「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朋友之道雖不可無，然既登朝為官，則君臣為公義，而朋友為私情。今之好為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諭旨中透露出為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康，必須要求諸臣落實「同好惡，公是非」的廓然大公見解，以及這個觀點

<sup>41</sup> 張德澤編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頁39。

<sup>42</sup> 馮爾康，《雍正傳》，頁121。

下黜免別勵諸臣，落實「正風肅紀」之積極意義。

清朝對文武百官所實施的考核制度「京察、大計、軍政」之法，<sup>43</sup>其目的是「崇獎廉善，擯斥貪賤」，隆科多利用職權徇情枉法惡習，助長了官員賄買請托之風，破壞了各級權力機構的監督制約機制，<sup>44</sup>。雍正二年十一月，雍正帝爲了收「激濁揚清」功效，開始向近臣言及隆科多擅作威福，不識大體及謙退。此時，朝廷一批政治敏銳度高的官員，揣透皇帝心思，他們權橫政治風相，開始上奏揭發隆科多貪婪狂妄，玩弄權術謀取私利，置君臣大義不顧之喪行失德，將禍國殃民舉措。

雍正二年底，隆科多在部份大臣們的非議及朝廷條條框框的壓力下，警戒到官場的爾虞我詐和人炎涼。爲免再陷泥淖，他處世行事變得極其謹慎。雍正三年正月，他識時務提出辭去步軍統領之職，藉機向雍正帝表白自己的耿耿忠心。不料隆科多此舉卻未達目的，相反地從雍正帝角度看，反認爲隆科多在替朝廷辦事的過程中，爲了牟取個人名聲和私利，濫用職位權力，辜負了兩朝君主〈康熙帝與淤雍正帝〉對他的重用，更違反了清朝官員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任官初衷。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隆科多叔伯兄弟「國舅」夸岱，承襲其兄鄂倫岱因做允祀黨，被革之公爵位一個多月後，以自身昏庸，在四月十四日上奏摺，奏請辭議政大臣及都統職務時，被怡親王允祥、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馬齊等以夸岱不知天恩，不肯戮力行走，上奏建請雍正帝革夸岱公爵職，停呼夸岱「國舅」稱呼。<sup>45</sup>此事件，隆科多雖也參與審議，卻無力維護先人鐵血鑄造的榮光，還從中看到「項莊舞劍」對他警示的政治意圖。

夸岱事件剛剛落幕，又一場政治風暴把隆科多推向更災難的深淵。雍正三年（1725）五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再行曉諭大學士、九卿等，諭曰：

「朕御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以心臂，毫無猜防。

<sup>43</sup> 京察即考察京官，大計爲考察外官，軍政是考察武官。

<sup>44</sup> 盧經，「清代皇權與官吏侵貪」，《炎黃春秋雜誌》，2001 年第 7 期。「Yanhuang chunqiu」。

<sup>45</sup>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和碩怡親王允祥奏請革夸岱職摺〉，《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頁 1110。

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效。孰知朕視為一體，伊等竟懷二心。朕予以寵榮，伊等仍幸為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陷朕於不明。」皇帝的諭旨示下五天後，二十七日，隆科多以含糊專擅，立意循庇年羹堯妄參官員罪名，被交都察院，嚴察奏聞。六月初七，以隆科多次子玉柱，行止不端革除侍衛、鑾儀使職務，交予隆科多，令其嚴加教導管束訓誡。

雍正帝冲着隆科多大動干戈的敲山震虎手法和部署，嚴重傷害了他的名譽，讓已成箭靶的隆科多，政治生涯陡轉直下，幾十年奮鬥成果完全毀掉。

#### 四、折衝尊俎外交長才

清帝國幅員遼闊，雍正三年（1725）初，沙俄在今蒙古共和國境內的喀爾喀蒙古邊界附近，因領土問題與清朝頻生摩擦，導致當地局勢急速吃緊。喀爾喀蒙古諸部，一曰土謝圖汗，一曰車臣汗，一曰割薩克圖汗。又善巴自為一部，曰賽因諾顏。共四部，為旗八十有六。<sup>46</sup>在清崇德三年（1638），清太宗皇太極將國號「後金」改為「清」後第三年，「喀爾喀三汗」土謝圖汗、車臣汗和割薩克圖汗，一齊向清廷獻上最高禮俗之白駝一隻、白馬八匹的「九白之貢」，正式臣服於清。但沙俄不顧史實，公然派兵侵入清朝領土，建立城堡迫害喀爾喀蒙古百姓，忘圖建立所謂的政治新秩序。

為維護國家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雍正三年六月，雍正帝指派隆科多與額附親王策凌，前往清俄邊界恰克圖附近的布林河，與沙俄政府代表舉行兩國邊界爭議問題談判任務。談判過程中，隆科多秉持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堅決要求俄國歸還依靠武力所侵佔的清朝喀爾喀地區土地，沙俄代表薩瓦蠻橫拒絕，雙方對問題立場和觀點的各持已見，使得談判出現僵局，隨後隆科多回京，清俄邊界問題繼續拖延。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隆科多又遭欲加之罪的政治凌辱，被革去

<sup>46</sup> 喀爾喀諸部：一曰土謝圖汗，一曰車臣汗，一曰割薩克圖汗。又善巴自為一部，曰賽因諾顏。共部四，為旗八十有六。《清史稿志 53》。



《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職、《大清會典》總裁官與《明史》監修總裁等職的懲處命運。二十八日，隆科多再以挾勢，索取他人古玩財物銀兩，傷害朝廷利益，違反吏治清明，被革去吏部尚書職銜。

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又遇涉及政治原因的打擊；家僕牛倫被控挾勢向他人需索金錢財物，被逮入獄，審訊詢問時牛倫意外供出，隆科多曾受年羹堯及河道總督趙世顯、兵部尚書浙閩總督覺羅滿保，雲南巡撫甘國璧、山西巡撫蘇克濟等人賄賂，行為有悖職守。審判定罪後，雍正帝下旨處死牛倫。

隨著爭議事件一件件揭露，朝中許多大臣看出了雍正帝心思，開始疏遠隆科多。雍正四年六月，雍正帝以隆科多主掌吏部時，審議年羹堯交結專擅諸事欺隱之罪，循私敷衍未謹守分寸，重責隆科多隳敗有失職守，削太保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sup>47</sup>

雍正五年（1727）閏三月，清俄勘界會議在波爾河畔舉行。隆科多奉命和吏部侍郎圖理琛前往談判。鑒於清、俄邊境情勢複雜，隆科多擬定首重分界，其次通商之談判策略；談判初始，俄使薩瓦蠻橫提出領土要求，隆科多嚴詞拒絕，雙方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問題上的相互對立，讓談判陷入僵局。

俄使薩瓦認為隆科多對俄國心懷不善，於是採取命邊境俄軍修築防禦工事脅迫隆科多，同時致書邊境地區的蒙古王公之兩面外交手法，聲言隆科多之態度，將導致兩國不睦。蒙古王公將俄方動向奏報雍正帝，吏部侍郎圖理琛亦以隆科多固執執己見奏報，並轉呈俄使薩瓦致清朝皇帝信件，內容亦為對隆科多之不滿。

雍正五年六月，宗人府告發隆科多私抄《玉牒》繕本，貯存家中事發。雍正帝以隆科多舉動狂悖，隱匿實情，並不實心效力，留伊在彼料理俄羅斯之事，反致混行壞事，毫無裨益。七月二十六日，隆科多談判職務被撤，召回北京。<sup>48</sup>

<sup>47</sup> 阿達哈哈番，為清朝滿語爵名。乾隆元年（1736），定阿達哈哈番漢字為輕車都尉，此爵是外姓功臣與外戚敘功授的爵位稱號，不是實職，位於爵位的第六位，居於公、侯、伯、子、男爵之下，與上述爵位一樣，阿達哈哈番也分三等，一等阿達哈哈番屬正三品。

<sup>48</sup> 《清世宗實錄》，卷 58，頁 14-15。

隆科多離開之事，為談判增添了新的因素，使得清、俄談判形勢急轉直下。最後兩國雖勘定部份的邊界土地界標及規定了俄商通商關係，但沙俄卻多謀取了在北京保有自己教堂的宗教使團及部份自由貿易權利的利益。

隆科多為朝廷盡心盡力，面對外國對手不卑不亢據理力爭，顯示他是一位有勇有謀的傑出外交家，他以國家利益為重，忘卻個人榮辱得失考量的見識與胸襟，及其具備的外交談判經驗與專業知識，重要性實不亞於將帥在戰場上的征伐之功，不過這些外交上的出色作為，卻都被其史傳書載的政治上負面行為遮掩，以致不為後人所察覺。

被押解回京陷身囹圄的隆科多，孤立無助面對朝廷指責。雍正五年十月初五，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一起會同審訊隆科多所犯之大不敬罪五條、欺罔之罪四條、紊亂朝政之罪三條、奸黨之罪六條、不法之罪七條、貪婪之罪十六條。<sup>49</sup>合計四十一款重罪，議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

雍正帝以隆科多為官多年之情，從寬未將隆科多處死，選擇在暢春園外附近空地建屋三間，將他永遠禁錮，家產不必入官，僅追贓銀數十萬兩，妻子亦免入辛者庫，<sup>50</sup>長子岳興阿被革職，<sup>51</sup>次子玉柱被發往黑龍江當差。一年後，隆科多走完了他榮辱沉浮，具醒世意義的傳奇一生撒手人寰，用心掙來的名與利也隨風消逝。

## 五、結語

人們的印象裡，權臣是專擅朝政的壞人，是禍亂朝綱的罪魁。但事實上，並非所有的權臣都為非作歹。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展現著自己的出眾才能，用不同的手段實踐著各自的政治理想。他們是那個皇朝的精英，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寵兒。如果我們能站在他們的角度，感受他們在不同歷史情

<sup>49</sup> 《清通鑑》，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丁未〉，頁93。

<sup>50</sup> 辛者庫，是滿文「sin jeku」音譯，乃包衣管領下食口糧人也。辛者庫人分原有的辛者庫人和緣罪入辛者庫的，不能一概認定辛者庫人皆是罪籍。包衣管領下人雖然屬於奴僕，但他們的低賤身份只是對於他們的主子而言，在社會上，他們的地位不同於旗外賤民奴婢及八旗之中的旗下家奴，他們有自己的獨立戶籍，可科舉為官，可與良人通婚，並有權擁有奴婢。

<sup>51</sup> 清代對官員的懲處，分為罰俸、降級、革職三大類，革職處分是最嚴重的一種。

境中的心路歷程，或許我們能更深刻理解他們與那個時代的喜怒哀樂。<sup>52</sup>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sup>53</sup>。從出身、崛起到官場的浮沉，隆科多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活動，對康、雍朝的政治發展曾產生重大影響。不過史傳書載，對其政壇作為，持正面評價者少，持負面評價者多。從微觀視角剖析隆科多的早期經歷，早年受康熙帝知遇，效忠主子實心任事，出掌「理藩院」與「步軍統領衙門」上表現出色，順遂仕途享盡世間榮華；而後盱衡大局，恪盡職守襄贊雍正帝平穩接班，為朝廷運作奠定有序基礎，忠誠幹練的作為，顯示他是一個知大局、識時務的大用之才。

蓋棺論定隆科在他所身處的時代及那段他在康、雍朝遞嬗之際，曾影響過的政治發展史，可以看出他善於掌握契機的政治判斷力。隆科多非庸碌無能之輩，縱使他在權力的下坡時，雖遭受雍正帝嚴厲打擊，也非一事無成，他和俄使談判，據理力爭嚴責俄使無理要求的勇氣，顯示其人格特質中維護國家利益的用心，雖然外交上不卑不亢的折衝樽俎，有壯志未酬的悲涼，談判中顯現的見識與愛國意識，卻令人讚賞肯定。

儒家三綱五常，講究忠孝之道，忠是忠君愛國，孝是揚名顯親。隆科多憑藉權勢，罔作威福被圈，在雍正朝造成的政治影響，首先是他早年奉公守法，為國家社稷盡心效力，晚年作為卻違背任官初衷，使自己身敗名裂，還禍延子孫。其次隆科多貪贓枉法，破壞朝廷官箴，讓傳承數代以忠勇家風捍衛清室江山，贏得朝野尊重的佟氏先人聲譽嚴重受損，可謂愧對其列祖列宗與其風光姓氏。第三是對清政府而言，沙俄窺伺蒙古已久，俄使採取「聯合準噶爾，制衡中國」戰略，有效削弱中國在蒙古之優勢，而隆科多曾出任清朝掌理邊疆民族事務，兼辦涉外事項之「理藩院尚書」數十年，與邊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少數民族互動密切，對蒙古各部落政治、軍事、風俗民情事務相當熟悉，他的這些專長，本該在對沙俄談判時展現。卻被己身昔日在政壇枉法行為所累，在兩國談判陷入膠著之際，被雍正帝拘回治罪，使清廷在「蒙」利益受損，連帶他也無法為自己從外交上掙得聲譽與政治資本。最後是讓治國以「父祖之心為心，父祖之

<sup>52</sup> 唐博，《清朝權臣回憶錄》，頁220。

<sup>53</sup> 賴炎元與傅武光，〈揚權〉，《新譯韓非子》，臺北：三民，2006年。

政為政」的雍正帝，從晨至暮勤奮治國，殫精竭慮進行了多方面的政治社會改革，並取得極大成就，種種努力卻在倡廉肅貪，整飭吏治，伸張君權時，因圈禁違反官箴的隆科多，讓後世人誤認為他是個薄情寡恩的君王，使他的名譽受到影響。

「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sup>54</sup>。作為清朝政治史上一位功過混合的人物，隆科多「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的興衰歷程，問題出在「克己復禮」的工夫不足，忘掉了官員追求儒家思想之自我內在「責任感」，更重於外在「法制性」規範的道德自律。對比和隆科多一起在雍正朝，擔任總理事務的皇十三弟怡親王允祥身上，就能清楚看出隆科多受寵盛極而衰的原因。允祥為官之道，處處「謹言慎行」，凡事保持沉潛是他能榮寵至極、富貴到老的祕訣，這也是隆科多在政壇垮台的主因。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佟氏家族，從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三月，第一代佟養正，投奔努爾哈齊忠勇報國，為後世子孫奠定永續發展根基；經歷第二代佟盛年，戰功彪炳；第三代，佟國維雄風猶存；第四代隆科多，到第五代岳興阿、玉柱，不思進取；導致佟家百年基業毀於一旦，家族光輝由燦爛之極歸於平淡，歷史充滿玄機，令人深思。

## 參考文獻

- 何冠彪，2007，〈乾綱獨御、乾綱獨斷--康熙、雍正二帝君權思想的一個側面〉，《漢學研究》，20卷，第2期，頁275-300。
- 楊虎，2013，〈清代賞四團龍補服述略〉，《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總第168期，頁129-142。
- 康經彪等，2012，〈帝國崩圯之探索—以中國朝代更迭為例〉，《黃埔學報》，第62期，頁1-16。
- 葉高樹，2009，〈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2期，頁121-196。
- 侯皓之，2013，〈見盛觀衰--盛清諸帝飼犬活動的演變與意義〉，《漢學研究》，31卷3期，頁137-168。

<sup>54</sup> 《孝經-事君章》，第十七。

雷炳炎，〈清代八旗世家子弟的選官與家族任官問題初探〉，《求是學刊》，第5期，頁156-165。

顧慕晴，2007，〈資訊不對稱與奏摺制度之研究--清世宗朝的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第24期，頁1-28。

周祚紹，2000，〈〈恰克圖條約〉談判中的清朝使臣〉，《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44-46。

馬維仁，2012，〈論“隆科多案”與中俄《布連斯奇條約》的簽訂〉，《絲綢之路》，第8期，頁14-15。

王和平，2008，〈從中俄外交文書看清前期中俄關係〉，《歷史檔案》，第3期，頁51-58。

屈春海，1989，〈清代京師治安防務機構步軍統領衙門述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

崔陟主編，2006，《宮規禮俗探幽》，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閻崇年，2009，《康熙大帝》，臺北：聯經出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80，《宮中檔康熙朝奏摺·滿文諭摺第二輯，康熙三十六年四月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第九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80，《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第一輯，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元年十月》，第二十八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80，《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第二輯，雍正元年十一月至雍正二年九月》，第二十九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80，《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第三輯，雍正二年十月至雍正七年五月》，第三十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蒙古代表團、蒙古會議與蒙古各盟旗 駐京聯合辦事處

金兆鴻  
前中原大學教授

### 摘要

內蒙古地區自清中葉起，因漢人出關墾荒，就陸續設立了若干府廳州縣，以爲治理漢人的地方行政組織，形成蒙古盟旗組織與府廳州縣並存的情況，但是無論盟旗或州縣，其上尚有將軍或都統統轄，所以其時尚未見較具規模之蒙漢衝突。但民國肇建後，在內蒙古地區設立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其後又增設寧夏一處，及至民國十七年，又將熱、察、綏、寧建爲行省，於是形成同一地區既有省縣，又有盟旗的重疊地方行政組織，再加上四省之行政組織係國民政府所頒佈，具有堅實的法律地位，而蒙古盟旗組織乃是沿襲遜清舊制，國民政府並未明令公告其爲中華民國合法之地方行政組織，而大部分內蒙地區漢人人口又超過蒙人，蒙漢衝突乃時有所聞；其時蒙人民智日開，所謂「民族自決」口號也爲蒙籍知識青年所向往，北伐之後，蒙人爲爭取民族自治，發起組織「蒙古各盟旗代表聯合駐京辦事處」之議，向中央爭取盟旗合法地位及蒙人應有權益，遂有「蒙古會議」之召開，本文擬就此二事加以敘述。

**關鍵字：**蒙古盟旗代表聯合駐京辦事處、蒙古會議、  
白雲梯、吳鶴齡

## 一、內蒙情況簡述

女真興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其地原為蒙古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領地，努爾哈赤崛起時，此處（多在大興安嶺西側）已分化為：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及郭爾羅斯四部，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後，建立後金政權，為謀求發展，對蒙古採取聯姻政策，努爾哈赤父子都曾娶蒙古部酋之女為妻，雙方於是結盟，為有效治理蒙古，將已附之蒙古各部編設為盟旗，盟旗制雖源自於滿洲之八旗制，但又不同於八旗制，其最主要之差異為：滿洲之旗隨命令而遷移，無固定駐防地，因此滿洲人但有旗籍而無地方籍貫；對蒙古之旗則異於是，每旗有固定之游牧地，不許越界而牧，如有逾越，雖王公貴族也必嚴懲不貸，如此一來蒙古游牧之機動性盡失，當然蒙古盟旗制乃清廷刻意弱化、馴化蒙古諸多措施之一，其餘措施非本文主題從略。清廷入關後漸次統一全中國，以東北係其龍興之地，嚴禁內地漢人出關墾牧。但康、雍、乾之後，冀、魯、豫等省，時遭旱澇蝗蟲之害，災民遍野，清廷不得開放漢人出關墾荒求生，初期准漢人春去秋回，法令既嚴，地方官員也能恪遵職守。盡責把關，但以出關漢人既能農墾，又多會一般手工藝，為當地蒙古王公貴族創造較放牧為高之收益，於是包庇漢人，使其可以春去秋不回，地方官員，也以日久玩生，疏於把關（甚或可能收受賄賂，以至不加查究），以至出關漢人可以落地生根，在此種「蒙利民力、民利蒙地」情況下（意為蒙古王公貴族貪圖漢人之勞力，而漢人貪圖蒙人之土地），漢人大量「闖關東」；另有盟旗王公因個人財務需求而招漢人前來屯墾以收受地租，如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扎薩克。貢桑諾爾布郡王（後晉一級為親王），為興辦育正武備學堂、崇正學堂、毓正女子學堂開支過大，不得不招募內地漢人前來墾殖，以收租彌補其財務缺口，這種為公益而招來漢人前來墾殖，乃令人敬佩之作為（見吳恩、邢復禮《貢桑諾爾布》一文，文載內蒙古文史資第一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另有王公因私人開銷過大，以致入不敷出，也以出租甚或出賣土地，以為挹注；不論何種情形，到內蒙墾殖之漢人，勤勞節儉，時日稍久購地築屋而居，繼而落地生根，從此成為內蒙古地區之人民。

由於時間之累積前往內蒙古地區墾殖之漢人安家落戶者，越來越多，清廷為便於管理及徵收稅賦，乃在漢人聚居較多地區設立內地式之府廳州

縣，使漢人不再歸盟旗管理，但不論蒙古盟旗或府廳州縣，其上尚有將軍、都統或副都統官員管轄，因此盟旗與州縣尚能相安無事，不致發生較大規模蒙漢衝突。但民國肇建後，將卓索圖、昭烏達兩盟設為熱河特別行政區，將錫林郭勒盟、察哈爾部大部分旗群設為察哈爾特別行政區，將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察哈爾部四個旗、歸化城土默特旗設為綏遠特別行政區；稍後又將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及阿拉善和碩特旗設為寧夏特別行政區，但未規定上述各盟、旗是否屬於各特別行政區管轄，於是形成同一地區有兩套地方行政組織，但四個特別行政區乃是經過中華民國政府（北洋政府）明令公布者，而蒙古盟旗地方行政組織則是沿續前清而來，自民國建立以來，從未以法律或命令方式宣布蒙古盟旗地方行政組織為合法的組織，使盟旗成為妾身未明之機構，這也充分證明北洋政府既不重視蒙藏新疆等邊政問題，也未進用熟知邊務人才，雖然任用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扎薩克貢桑諾爾布親王為蒙藏院總裁，但只屬於酬庸羈靡性質，其實後來國民政府情況也是一樣，完全不重視邊疆。

由於內蒙古地區出現同一地區有兩套地方行政組織，彼此又無統屬關係，而且省縣人口既多於盟旗，力量更大於盟旗，使蒙人感到有被欺凌壓迫情況，而自清末以來，頗有不少內蒙古籍青年到內地各大城市大中學讀書，甚至也有出國留學者，對新知識頗有認識，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唯恐天下不亂的所謂「民族自決」口號，使內蒙蒙籍知識青年認為內蒙古乃蒙古人之蒙古，漢人屬外來者，因而高喊內蒙古自治，其實所謂「民族自決」完全只是口號，否則美國何以不給印地安人、黑人自決？其次所謂「民族自決」必須要獲得多數民族之同意，否則除了訴武力抗爭，別無他途，既是少數，在抗爭中必居劣勢，可見「民族自決」只是口號；抑有甚者，所謂內蒙古地區屬於蒙古人，更是無稽之說，試看古往今來，可曾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到這世界時帶來寸土尺地？事實上連一顆泥砂也不曾帶來，人屬於土地，土地從不屬於人，人只是土地的過客。何況十三世紀以前，漠南地區可曾有過蒙古人？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先於蒙古人聚居大漠南北地區有匈奴、柔然、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這些人可說是大漠南北的早住民族，相對這些民族而言，蒙古是晚住民族，大漠南北何嘗屬於某一民族所專有，更何況自乾隆



（1736~1795 年在位）至民國元年（1912 年），漢人之定居漠南也已超過二個多世紀，稱之爲漠南世居民族，誰曰不宜？

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全國後，又進一步將熱、察、綏、寧四個特別行政區改設爲行省，仍然未對盟旗法律地位作出界定，蒙人心中自不免有所疑懼，蒙古王公希望仍保有既有之爵位，且仍沿舊例可以世襲（蒙古各旗扎薩克、盟長、副盟長幾乎都是親王、郡王、貝勒等爵位）。而在內地求學畢業或留學有成回國之蒙古青年，回到本旗後，幾乎找不到工作，按原有之旗衙門，多設在扎薩克府邸，所任命之仕官幾皆爲扎薩克之親信，且員額有限，不可能再進用新人，而這些知識分子潛意識要剷除世襲王公制度，實行自治，擴大盟旗行政機構組織，設立一如內地省縣市政府有民、財、建、教等單位，如此渠等不但能一展所學，而且也能使盟旗逐步現代化，所以一時之間仍需在世襲王公貴族羽翼之下，以民族自治爲包裝，要求蒙古盟旗自治，如此一來原先貴族要求國民政府必需保留王公世襲制度，知識青年求實行蒙古盟旗自治，這兩件基本矛盾的思維，一時統一了。

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定都南京後，成立蒙藏委員會籌備處，就國民政府所奉行之《三民主義》理念，不可能會有王公貴族世襲制存在的空間，稍早幾年即 1925 年時，由白雲梯、樂景濤、包悅卿、金勛卿、郭道甫（此人自組蒙古青年黨任黨魁、係呼倫貝爾部達斡爾人）等人在張家口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見那木海扎布《東蒙要事雜憶》一文，此文輯入《我的經歷見聞》，列《內蒙古文史料》第三十一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按此輯共收錄屠義源、趙國鼎口述劉映元整理、達瓦敖斯爾及那木海扎布四人之經歷與見聞，上引白雲梯組黨事見頁 193），事實上白雲梯是國民黨員，因此國民政府設立蒙藏委員會籌備處時，白雲梯很受重視，可能派白氏爲此籌備處負責人（因文獻不足，只能以「可能」表達），因此外傳白雲梯要當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見張紹庭《吳鶴齡和“蒙古各盟旗代表聯合駐京辦事”的活動》一文，該文輯入《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六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24），白氏委派李舟山、于蘭齋等到北京爲接收北洋政府蒙藏院的接收委員，當時蒙藏院任秘書之吳鶴齡，爲尋求政治上新出路，乃邀集在北京的蒙古檯面上人物在豬市大街五十五號

（哲里木盟那遜阿爾畢濟呼舊府邸，當時由希爾巴敦魯布等借住）開會，研究今後的出路問題，當時一致決定接受國民黨的提倡之「國內各民族自決自治」之政治主張，但要求保留傳統的盟旗地方行政組織，同時互推汪自洋、趙化民、蘇兆民、希鴻圖（蒙名希爾巴敦魯布）、趙福海（蒙名補英達賴）、張紹庭（蒙名恩和阿木兒）、吳鶴齡等組成所謂「蒙古代表團」，準備展開活動。

## 二、「蒙古代表團」的活動

原蒙藏院秘書吳鶴齡，字梅軒，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人，既聰明又有活動力，可稱得上是一位才華揚溢的蒙古才俊，經他努力邀集在北京的蒙古檯面上人物自行組成「蒙古代表團」，當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已到北京（不久即稱北平）暫住碧雲寺，於是「蒙古代表團」第一步就是到碧雲寺求見蔣介石，由蔣的秘書長邵力子代表蔣氏接見，代表團遞上手摺（等於團員名冊），表示歡迎北伐成功，國家統一之類的客氣話後即行辭出，並約定次日繼續展開各項拜會活動。

第二天，吳鶴齡等人乘車去接補英達賴，但久候補英達賴不出來，這是由於補英達賴有抽鴉片的習慣，無法早起，眾人為爭取時間，不能因等他而誤了「大事」，於是撂下他，事後補英達賴為此惱羞成怒，認為這是吳鶴齡從中作梗，從此便不與吳鶴齡共同出席活動，補英達賴之如此作為，也有其靠山，按補英達賴係察哈爾部廂黃旗牛羊群蒙人，曾任廂黃旗協領（為旗內之官員，位在參領之下），早年曾在張家口錫林郭勒盟辦事處認識辦事處負責人，透過這位負責人認識了蘇尼特右旗扎薩克那木濟勒旺楚克郡王（德王之父），由於補英達賴頗有才華，精通蒙滿漢文，能言善道，又工於書畫，經過介紹到蘇尼特右旗作事，那王有四個妻子，德王係三夫人所生，那王去世後，老福晉（大夫人）也相繼過世，德王生母三夫人不願管事，因此王產就由四夫人當家，德王對四夫人也頗為孝順，四夫人可能由於欣賞補英達賴的才華，使之成為德王老師群之一員，不久四夫人與補英達賴有了私情，乾脆把妹妹嫁給補英達賴（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偽蒙古軍史料》，內蒙古文史書店發行，1990年，頁2，此書列為《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三十八

輯），於是一般人就認為補英達賴是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俗以德王稱之而不名，也係民初蒙古名王之一）的姨丈，他有這個背景，也就有了與吳鶴齡抗爭的本錢。

由於補英達賴與德王既是長輩，又是老師，在德王面前說話有其份量，他既不滿意吳鶴齡，免不了在德王跟前說三道四，於是初期德王對吳鶴齡也不具好感，甚至於抵制、對立，有一段時間雙方幾乎處於劍拔弩張的情形，後來經過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居中調解，而吳鶴齡又確實是個人人才，可以稱得是一顆閃爍耀眼的智多星，德王後來爲了要推展他的「大業」（內蒙古自治與投靠日本），不得不借重這位聰穎過人的智多星，雙方有很長一段時間合作無間，一直到中共建政前夕，德王不改其內蒙古自治初衷，到阿拉善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然而中共建政已是勢不可擋，阿拉善和碩特旗扎薩克達理扎雅響應中共和平解放，德王遂逃往外蒙古，後被中共引渡回內地，接受再教育，曾寫下一本《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此書列《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十三輯，內蒙古文史書店發行，1984年），而吳鶴齡則攜家帶眷來台，擔任國民大會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最後病逝台灣，其兩位公子赴美加留學都極有成就（另其長公子有聽障問題，蒙藏委員會長年予以照顧）。

回過頭來看，蒙古代表團在北京的活動，除了前述到碧雲寺拜會蔣介石，由其秘書邵力子接見，並收下手摺，接著又去拜會時在北京的桂系大將李宗仁與白崇禧，就在與白崇禧會談時，恰巧蔣介石走了進來，就由白崇禧向蔣介紹稱：「這是蒙古代表團，他們來歡迎國民革命軍勝利，並陳述蒙古地方情況。」蔣只說「好！好！」，隨即又出門離去，並未與蒙古代表團交談。

接著蒙古代表團又去見「蒙藏委員會籌備處」派往北京，預備接收北京政府蒙藏院的李丹山及于蘭齋，李、于兩人到北京後，住在蒙藏院舊址內，李、于兩人都是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人，跟吳鶴齡不僅是小同鄉，而且還有些親戚關係，照道理應該很好說話，但蒙古代表團曾兩度前往拜會，都未蒙接見，於是便出函邀李、于二人到豬市大街五十五號那王府開會，以表示歡迎之意，不料李、于兩並沒有依邀約前來開會，而是以書信回覆，而且口氣極為不遜，據稱其回函大意爲：

「這次我們來接收蒙藏院，就是和你們這些王公走狗們來算老帳。」（見前註張紹庭專文頁 24）

果而李、于二人回信中有這一段話，則不但是他們修養太差出口無狀，羞辱了「蒙藏委員會籌備處」，更代表白雲梯識人不清，用人不當，無論如何蒙古代表團是懷著善意邀約，俗語說伸手不打笑面人，而李、于兩人竟以如此不堪的粗俗語言回覆，殊屬不當，但願張紹庭之專文所載有誤，否則真為國民政府的邊政官員感到慚愧。蒙古代表團這次遭遇真可以以「我本真心向明月」，換來的卻是「其奈明月照溝渠」。李丹山、于蘭齋不僅伸手打了笑面人，更使人到警察局要警局派人到豬市大街那王府調查蒙古代表團成員及其動向，這簡直是濫用公權力，至為不妥。然而蒙古代表團也非烏合之眾，尤其吳鶴齡黠慧無比，為化被動為主動，乃自動到警察局說明代表團是為蒙古地方制度問題，向政府報告，要求政府重視並合理解決，目前正與有關當局聯繫之中，絕無任何不軌行為，獲得警方諒解，從此吳鶴齡與白雲梯有了心結，據了解來台灣後，這個結還未完全解開。

據傳李、于兩位接收蒙藏院的官員，眼見支使警方監視蒙古代表團不成，便又發送傳單，攻擊蒙古代表團，並在報端刊登不利於代表團的消息，本來所謂蒙古代表團也不過是幾個在北京的蒙籍人士及原蒙藏院秘書吳鶴齡所組成的小團體，為求個人今後的新出路，既未經各盟旗指派，也沒有經任何蒙古社團推舉，自稱蒙古代表團確屬有些自我誇大，縱或如此，眼見李、于兩人既散發傳單，又在報端批評蒙古代表團，於是也展開反擊，雙方開始筆戰。當時北京有個《多聞通訊社》，站在蒙古代表團這一邊，大力支援代表團，其社長據說每天都到代表團來採訪，在筆戰中李、于兩人似又居於劣勢，自北伐之後，國民政府從未在宣傳戰上占據上風，總是處處挨打。

或許「蒙古代表團」也知道自己的代表性不足，於是致函各盟旗公署，請派代表來北平（北伐後，改北京為北平，中共建政後，又恢復為北京），以便共同集會研商蒙古自治及盟旗問題，這確實是當時內蒙古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當時外蒙古已在蘇聯操控之下成立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不過在法理上外蒙古仍屬中國領土），可惜國民政府見不及此，在

奠都南京時，就該提出蒙古盟旗制度問題，掌握處理蒙古問題的主動權，由於國民政府既缺乏，又不用邊政人才，結果「蒙古代表團」對蒙古問題的話語權先鞭一著。各盟旗接到代表團的書函後，確有若干盟派出了代表到北平，計有：卓索圖盟派戴國儒與戴清廉二人、昭烏達盟派趙化民爲代表、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派拉希策楞等人爲代表、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扎布派僧格仁沁等爲代表，按內蒙古（除外蒙古以外之蒙古）有十幾個盟、部及不屬於盟部的旗，只來了四個盟的代表，要代表所有內蒙古，其代表性仍然薄弱，不過較原先的幾個人，畢竟有了相當的代表性，每次開會時，都推舉昭烏達盟的代表趙化民爲主席。這裡我們注意到錫林郭勒盟沒有派出代表，而當時錫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是很活躍的一個「名王」，其所以未派代表，一則可能之前補英達賴與吳鶴齡鬧得不愉快有關，再則德王自視很高，不願參與由他人主持的活動或會議，其他未派代表的盟、部、旗，或許由於通訊問題，至於新疆蒙古三個盟（其中烏納思素珠克圖盟又分爲東、南、西、北四個盟），以其時新疆完全與內地隔絕，自不可能派代表參與，何況這個「蒙古代表團」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還只是私人組織，不具官方色彩，總的來說，在北平所召開的蒙古代表團會議，等於只是私人集會，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雖則如此，蒙古代表團活動力很強，特別選在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招待北平各界的軍政各界及新聞記者，當時北平市長何其鞏還親自出席這個招待會，招待會先由蒙古代表團趙化民致開場白，繼由吳鶴齡報告蒙古代表團成立的目的，指出當前省縣與盟旗關係並不融洽，並訴求今後要實行蒙古地方自治等，請各界給予支持與指導，完全搶得蒙古問題的話語權，博得各界的同情，可見蒙古代表團政治嗅覺靈敏度極高。

恰在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派張繼到北平辦理交接事宜，住在北海團城上，蒙古代表團也前往拜會，張繼指定由他的秘書貢沛誠爲聯絡窗口，這位貢沛誠經常與代表團討論蒙古問題，此際內政部長鈕永建也到北平，代表團的吳鶴齡又去拜會鈕永建，蒙古問題、地方自治或盟旗行政組織，都是內政問題，鈕永建意識到茲事體大，不可能在北平談談就會有任何結論，必須到南京去解決，於是貢沛誠起草，以張繼名義電告南京當局，介紹蒙古代表團前往南京，並由政府包專車把代表團送往南京，蒙古代表團

遂以吳鶴齡爲首，率同四個盟的代表，並任命了陳效藩爲代表團秘書長，同行的還有幾個記者、國民政府還派了參事克興額等，隨同到南京，既到南京，國民政府派專人接待，住大華飯店（另有一說是住安樂飯店），每日公出還派備專車供其乘坐，看來頗受國民政府禮遇。不過現在事後看這件事，無論張繼或鈕永建，乃至貢沛誠，對於蒙古代表團的合法性、代表性，似乎都沒有進行查證，貿然聽信吳鶴齡等片面之說認定其爲全內蒙古各盟、部、旗、及蒙人的代表，未免過於草率，設若當時另有一批蒙人也自稱是蒙古代表團，則將如何處理？政府處理邊政事務，如此粗糙，實令人難以理解，但同時也反襯出吳鶴齡等人算準國民政府做事風格，強行闖關，果然先馳得點。

國民政府禮遇蒙古代表團，使白雲梯深感不安，於是也指派那木海扎布等人在北平組織「內蒙民眾聯合會」，向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必須廢止蒙古世襲的王公制度（見那木海扎布所撰《東蒙要事雜憶》第五段《白雲梯派與王公代表團之爭》，此處王公代表團就是吳鶴齡等所組的蒙古代表團，稱其爲王公代表團，有些名不符實），本來這個要求（無論其動機爲何），與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主張是一致的，普天之下那有一個號稱民主共和的政府，還保留世襲的王公制度，而且這些王公還握有實際權力，然而國民政府並沒有採納廢除世襲王公制度的要求，爲了一時的苟安，仍然維持王公制度，白雲梯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悶聲不響，待蒙藏委員會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正式成立，次年一月五日，正式任命閻錫山爲首任委員長，白雲梯只得到蒙藏委員會委員一職，但是閻錫山從未到南京就職，仍然坐鎮山西。

蒙古代表團在南京既得到國民政府的承認，又受到政府的禮遇，因此又有一批盟旗代表陸續到南京加入代表團，計有哲里木盟的瑪尼巴達拉（漢名瑪鳴周）、包維新、包日新、陳賡揚等，昭烏達盟的吳雲鵬（此人後來任第一屆立法委員，隨政府來台，其弟吳化鵬政校畢業後，即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行憲後又任第一屆國大代表，但不具投票權，1986 年至 1993 年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卓索圖喀喇沁中旗齊之彥，土默特旗任殿邦（係卓盟之土默特，非歸化城吐默特）等，蒙古代表團在南京長期受政府招待，覺得如有一個常設機構當然更好，於是便向政府請准經費，

在大華飯店隔壁賃屋掛牌成立了「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處」。

閻錫山於 1929 年一月宣誓就職後，就離京乘輪船北上，要返回山西，吳鶴齡趁機與閻錫山同船北上，途中得以與閻錫山攀談，吳氏既有學識，口才又好，而且點慧異常，極得閻之賞識與信賴，隨任之為蒙藏委員會蒙事處長（蒙藏委員會共有總務、蒙事、藏事三處），並准由吳氏一手包辦蒙事處人選。吳鶴齡從蒙藏院秘書開始「搞」蒙古代表團，經過一年的努力，至此可說大獲全勝。

### 三、蒙古會議之召開

吳鶴齡以蒙古代表團為階梯登上政治舞台，試想蒙藏委員會為行政院下之部會，位階極高，蒙事處長與各部司長位階完全一樣，可說是地位崇高，而且處內人事由他一手安排，這更是其他部會司處長所沒有的權力，於是吳氏以陳賡揚為第一科科長、戴清廉為第二科科長、巴文峻為第三科科長，「清一色的蒙籍人士，似乎時間回到清代的理藩院（部）只用滿蒙籍官員一樣，不過吳鶴齡倒是戮力從公，白天在蒙藏委員會上班，晚上七至九點在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處工作，兩不耽誤，也算不易。每月定期出刊《蒙文公報》，分送到各盟旗公署，如今不知是否還有那些盟旗保存有這份刊物，這些都蒙古近代史上既重要又稀珍的歷史文物，透過這份刊物可以知道蒙藏委員會初成立時到底作了那些有關蒙古方面工作。

北伐雖號稱成功，但各地仍在舊勢力控制之下，只是易幟而已，東三省及熱河也都歸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統轄，而這一地區裡有蒙古呼倫貝爾部、布特哈部、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以及不屬盟部的伊克明安旗，所以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處認為東北地區與蒙古關係密切，而以哲盟就曾發生過盟旗與省縣衝突事件，也發生過盟旗扎薩克貪圖私利濫行賣地放墾，使蒙古牧民生計受到威脅，引起暴動，因此有必要與張學良聯繫，於蒙古代表團公推吳鶴齡（事實上整個蒙古代表團都在吳氏運作之下成立）前往瀋陽面見張學良，吳氏與張學良見面後，深談約兩小時，陳述盟旗與省縣重疊問題，以時有紛爭，今後應當設法改善雙方關係，使蒙漢人民都能和睦相處，避免再生事端，張學良聽後深有感觸，對吳鶴齡說：

「我今天聽到蒙古地方問題，願多談一談。過去與蒙古王

公見面，他們一言不發，只是唯唯諾諾，使人感到苦悶。今日得以暢談蒙古地方問題，實感快慰。」（見張紹庭前引專文見 27）

吳鶴齡與「東北王」見面而且作深度暢談，對吳鶴齡的政治聲望自有加分作用。吳氏又去拜訪常住瀋陽的哲里木盟盟長達爾罕親王那木濟勒色楞，此人與張作霖是兒女親家，吳氏與之會面使其在哲盟蒙人心中也增加了聲望，不過位達爾罕親王不善言談、低調保守，兩人會面時只說：「吃煙，喝茶。」此外不談任何問題，對吳氏所談也不表示任何意見，是一個極度明哲保身之人。此外又會見了東北盟旗處處長袁慶恩，另也拜會了王維宙、袁金凱等東北地方的檯面上人物，套一句時下流行的話，吳鶴齡此次瀋陽之行「該見的人都見到了。」可以說又是一次豐收。

閻錫山雖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28 年 12 月 27 日任命，1929 年 1 月 5 日宣誓就職，1930 年 4 月 5 日離職），但從未在南京上班，仍然坐鎮山西，山西地近內蒙，而察哈爾（有錫林郭勒盟、察哈爾部）、綏遠（有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歸化吐默特旗）都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對省縣、盟旗糾葛問題，知之甚詳，也深知其中千頭萬緒，要想解決，誠非易易，因此對於蒙古地方盟旗制度問題，絕不貿然碰觸，既不碰觸自談不上作出何種決定，且其任期既短，又不親自坐鎮蒙藏委員會，閻錫山這兩年並無甚作為，在蒙古事務方面完全由吳鶴齡唱獨角戲。1930 年閻錫山離任後（實為免職，因閻參與反蔣內戰，詳情可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弘文出版，1978 年，第十六章《兩種內戰》，頁 591~622，閻自是被免職），幾長達半年未發布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人選，遲至 1930 年 9 月始發表馬福祥為委員長，馬氏係甘肅臨夏人，為穆斯林，以之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顯然不甚妥適。當時除外蒙古外，呼倫貝爾、布特哈兩部、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三盟、伊克明安旗在東北屬張學良所控制（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退出東北，遂為日本所控制，其後更設立滿洲國，其時東北蒙古改設為興安四省，其上設興安總省）、察、綏境內各盟旗又受閻錫山影響，其中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係蘇尼特右旗扎薩克）心中別有想法，欲自立山頭搞內蒙自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根本掌握不到幾個盟旗，兼以國民政府始終不重視邊疆問題，既不培



植邊政人才，也不任用具有邊政知識者，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職位視為酬庸職位，安置黨國大老職位，對蒙古要求自治問題，根本無法處理，說直白些也不知如何處理，因此遂予蒙古代表團以操作空間，試想當初吳鶴齡以區區幾人自行組成蒙古代表團，南京國民政府派往北京辦交接之大員，竟然不加查證，也不向相關盟旗或特別行政區首長詢問是否確有此等代表團，縱然有，區區幾人豈能代表十多盟數十旗之蒙人，貿然予以承認，更派專車接其到南京，以公帑招待住飯店，其後更撥經費設立所謂「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一齣假戲竟然唱成真的，只能說南京國民政府草率，其所以草率者，實由於對邊疆問題認知不足，良可歎息。

蒙古代表團見南京政府對蒙古邊疆問題之無知，遂假戲真唱，更要唱成「大戲」，遂向國民政府要求召「蒙古會議」，廣徵求各盟旗、省縣各方面意見，表面上看立論正當，此因北洋政府於民初設立四個特別行政區時，既未考慮到旗、縣劃界問題，也未考慮特別行政區與盟部的位階問題，此一錯在前；及北伐後又將四個特別行政區升為省時，完全沒有考慮蒙古盟部旗之位階及蒙人之權利義務，質言之錯在中央，政治上重大措施之推行，是力量之呈現，而非理念之訴求，合理的未必存在，既存者也未必合理，北伐雖告「成功」，只是各地軍閥「易幟」而已，並非中央實力造成之統一，貿然將四特別行政區升格為省，對蒙人確實欠缺一合理之交待，此際蒙人要求召開蒙古會議，在理論上有其合理性，而閻錫山因參與倒蔣活動，於 1930 年（民國十九年）四月五日被國民政府免職，而新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於 1930 年九月八日始到任，其間蒙藏委員會可說是群龍無首，而蒙事處科長、專門委員、秘書乃至科員，概為吳鶴齡一手進用，自然決定召開史所未有之「蒙古會議」，也即閻錫山被免職後，立即籌備召開事宜，此時蒙藏委員會群龍無首，正好由蒙事處一手包辦其事，當時指定每旗派代表二人，即官方代表一人，可稱為王公代表，群眾代表一人，可視為旗民代表，有關省政府派代一人、南京國民政府有關部門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共同集會研商蒙古地方行政制度及其他事宜。看起來尚稱公允，不過當時蒙人還沒有選舉經驗，所謂每旗群眾代表一人，如何產生，如果仍由旗扎薩克或王公指派，焉能稱為「群眾」代表？但此時已是箭在弦上，只得向前推進。

東北地區各盟旗都派出代表與會，計有科爾沁左翼前旗博彥滿都、壯爾伯特旗烏爾圖那蘇圖、郭爾羅斯旗蘇寶麟、科爾沁左翼後旗袁崇阿、科爾沁右翼中旗格明阿、科爾沁右翼前旗烏爾圖那遜、科爾沁左翼中旗那德木德、扎賚特旗朝克布彥、庫倫旗那達木得（此旗為喇嘛旗）；呼倫貝爾部各旗（當時尚無呼倫貝爾盟之名，張紹庭文稱盟有誤）春德、彭楚克，布特哈部哈斯代等人；卓索圖盟各旗有李芳、陳效良、陳效藩（蒙事處秘書）、郭文田、吳鶴齡（蒙事處處長）、戴清廉（蒙事處科長）、恩和阿木爾（蒙事處專門委員）；昭烏達盟代表有吳雲鵬等十多人；青海左右翼盟二十九旗代表有祁寶善、官保加普、阿福壽、何永信等；省方代表有李芳春，東北蒙旗處處長袁慶恩，科長王宗洛等，總共約七十多人（以上名單見張紹廷專文）。錫、察、烏、伊盟部旗及吐默特旗均未派代表，至於新疆各盟旗也無代表，寧夏地區兩旗也無代表，使蒙古會議代表性打了折扣。

按當時內蒙古地方還有一個民間社團叫「蒙古平民同志會」這純粹是具草根性的地方社團，其主張要廢除世襲的王公制度，認為應趁召開蒙古會議的機會，提出這項主張，上面提到的哲盟科左前旗的博彥滿都，就是這個社團的成員，並由社團派其負責此事，但起初博彥滿都並不是科左前旗的代表，為了達到在會議中提出廢除王公制度的目的，必須先取得參加會議的代表資格，博彥滿都與科左前旗代理扎薩克的協理台吉薩嘎拉私交頗篤，且曾助其爭取到代理扎薩克之位，因此博彥滿都向薩嘎拉表示要作為旗代表，以便參加蒙古會議時，薩嘎拉「很慷慨地指定我（博彥滿都）為該旗代表」（見博彥滿都《我參加南京“蒙古會議”的回憶》一文，文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十六輯，內蒙古文史書店發行，1985年，頁152），如果博彥滿都所言可信，則所謂「群眾」代表，仍是由扎薩克等王公所指派，並不能代表真正的群眾。哲盟各旗代表既經派定，就在1930年四月間，被召到盟長郭爾羅斯前旗扎薩克齊莫特色木丕勒親王府邸召開「會前會」，參加這個「會前會」的，除了要去南京的代表外，還有幫辦盟務，代理副盟長的科左中旗的陽桑札布溫都爾郡王、扎賚特旗軻特瑪拉布坦郡王等王公，會議由齊莫特色木丕親王主持，齊王在會中說：

「此次去南京開會的代表，我盟共有十名，其中五名是王

公代表，五名是旗民代表。王公代表是：杜爾伯特旗貝子烏爾圖那蘇爾，郭爾羅斯前旗梅倫（係職官名，非人名）、彭斯克（漢名蘇寶麟）、郭爾羅斯後旗協理台吉陶克陶呼、科爾沁左翼中旗梅倫格明額，科爾沁左翼後旗管旗章京袁崇阿；旗民代表是：札賚特旗梅倫台吉朝格布顏，科爾沁右翼後旗梅倫阿明烏爾圖，科爾沁右翼前旗梅倫阿敏烏爾圖，科爾沁左翼中旗札蘭那達穆德，科爾沁左翼前旗博彥滿都。另有伊克明安旗代表輔國公哈欽蘇倫，也作為王公代表參加會議。組成一個代表團，由杜爾伯特旗代表貝子烏爾圖那蘇圖擔任首席代表，到南京開會時，各代表都要聽烏貝子的話」（見博彥滿都專文，此名單與張紹庭專文所提名單略有出入，未省孰是）

齊王語畢，遂把事先備妥的提案宣讀一遍，徵詢眾人意見，提案主要內容仍是藉口蒙古情況特殊，王公制度必須予以保留，會中多數代表並無意見，其時博彥滿都，心中雖不以爲然，但並未發言反對，於齊盟長就要各代表在提案上簽名，並親書「我愛王公」四字，形同爲保存王公制畫押，其時除了博彥滿都一人外，所有要參加南京蒙古會議的代表都照辦，齊盟長與烏貝子看完名單簽名，瞪了博彥滿都一眼，不無責怪之意；當晚郭爾羅斯前旗梅倫蘇寶麟就勸博彥滿都不宜與王公作對，並有警告意味，但博彥滿都不爲所動，仍堅持反對王公制度立場，蘇寶麟見遊說無功，悵然離去。

次日，繼續開會前會，代表副盟長陽桑扎布向眾人宣布：

「代表資格審查結果，認為科爾沁左翼前旗代表博彥滿都不是旗屬官員，不合代表資格。」（見博彥滿都專文，頁153）

博彥滿都則堅稱渠擁有旗扎薩克之指派令，是合格旗民代表，雙方你來我往爭辯，但均無結果，最後博彥滿都還是與哲盟代表一起南下參加蒙古會議。可見這個會議在開會之前，似乎無論與會的蒙古代表或主辦會議的蒙藏委員會，都已經爲會議定了調，失去集思廣議爲蒙古問題找到真正解決良方的機會，殊屬可惜。

蒙古會議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召開，由時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

長馬福祥主持（馬係甘肅臨夏回族，係穆斯林），國民政府黨政要員譚延闓、胡漢民、戴季陶、孔祥熙、孫科等都參加二十九日的開幕典禮，其中某些人還在典禮中致詞，此處不加引錄，但主持人所致開幕詞，等同初成立之蒙藏委員會之立場，有加以引錄之必要，馬福祥致詞全文如下：

「關係黨國大計之蒙古會議，歷無數波折迴旋，乃得於今日實行開幕，凡我國人宜無不歡欣舞額手稱慶，而蒙古諸代表以素習大陸生活之民族（「大陸」應係「大漠」之誤），此次竟不憚艱險浮海南來出席大會，此種堅忍不屈奮鬥圖強之精神，尤足為吾民族生色。本席謹代表委員會全體委員及職員極表歡佩之忱，並致無窮希望之意，幸垂察焉。本會（按係指蒙古會議）之產生，根據於十八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之決議案，召集之期原定十九年三月以前，嗣因道路寫遠，時局變遷及交通阻滯種種困難，迭經本委員會呈准展期，直至今日竟達開會目的洵幸事也。其在籌備期間，各院部會咸派重要人員會同本委員會通力合作，共策進行，足見我中央政府重視邊疆，迥非從前帝制軍閥時代之虛與委蛇、不關痛癢者可比。吾輩廁身茲會負建設新蒙古責任，若能竭智傾誠為全蒙人民謀久大之幸福，則上可副中央殷殷圖治之心，下可慰全蒙喁喁望治之意，此項成績將與內外興安嶺同時不朽；反之，若虛應故事，隱挾私心，或含意而莫伸，或固執而不化，則坐失良機，將不免有噬臍無及之虞也。本會任務在研究蒙古實況，而為訓政之推行建設之猛進，所有一切應興應革事宜，自應本此範圍於開會逐一提出討論。惟本席於此不能不有一言先為我全體會員諸君告者，即中央與地方各代表，務請於開議時，捐除雙方固有之己見，對於一切問題，均以客觀的態度為解決標準，中央代表於不違背本黨主義之可能範圍內，須充分顧慮蒙古地方之特殊情形，而不偏於急進，蒙古代表於保留固有良善制度之中，亦應以本黨主氣（「主氣」應為「主義」之誤）、世界潮流為依歸，力體中央統籌兼顧之苦心，而不偏於保守，如是則內外協調、新舊互諒，既不貽膠柱

鼓瑟之譏，復可免削足適履之誚，自可獲十分美滿之結果，區區愚誠，尚希我明哲諸會員共鑑納之。」（見《蒙古會議彙編》，民國十九年蒙藏委員會編，原文未加標點，見《演講詞》頁1~2）

通篇講詞除手民誤植一、二個錯字外，其中「此次竟不憚艱險浮海南來……」句，必須稍加說明，按其時正發生所謂「中原大戰」，陸路不靖，諸蒙古代表係從天津乘輪船南下，故有此句，從講詞中看不出其時國民政府之蒙古政策究竟為何，不過通篇文字頗佳，可見其時公務人員文字素養頗高，惜乎未能藉此機會向蒙人闡明中央之邊疆政策，不過憑心而論，國民政府向來少有明確之邊疆政策。

蒙古會議自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開幕，至六月十二日閉幕，前後歷時十五天，不過其中六月一、六、七、八、九、十一日這六天休會，實際開會七天，除開幕典禮外，共召開八次大會，另分三組審查議案，共召開分組審查會十八場次，共討論「蒙古盟旗制度案」等一百一十八案（原收到議案一二七案，經合併為後為一一八案），最後決議通過者為六十六案，就數字看，成果也頗豐碩，蒙藏委員會於閉幕後一個月（1930年7月12日）將蒙古會議經過情形呈報行政院，其呈報事由稱《呈為呈報蒙古會議經過情形並附呈決議案仰祈督核轉呈事》，其全文如次：

查蒙古會議原定本年四月舉行嗣以西盟各代表行抵北平為地方當局勒令回旗青海二盟代表亦在綏遠中途陂阻僅到一人惟東北各盟旗及呼倫貝爾代表以竭誠擁護中央改由海道來京當經屬會呈奉鈞院核准於五月二十九日在勵志社正式開幕共到會員五十七人計收議案一百二十七件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開各組審查會下午三時至六時開大會所有關係重要各案均分別交付審查並經主席團之決議為集思廣益起見敦請中央黨部市黨部各院部會及有關係之機關團體各派代表一人列席會議所有列席代表均得參加各組審查以期群策群力討論周詳各會員朝夕從事歷時兩週共計開審查會七次大會八次各組審查報告或以意義相同併案歸納或以時機未至暫為保留結果經大會決議通過者共六十案於六月十二日舉行閉會禮此次各盟旗代表不避艱難險阻來京出

席均以蒙古會議為中國空前創舉所負責任至為重大莫不慎重將事按期出席且深知蒙族人材智識經濟種種落後其原因皆由於政治教育交通實業諸端之不發達故關於前項方案建議極多如行政之組織教育之振興實業交通之開發衛生宗教之改善均經悉心規畫議訂詳細辦法各會員討論議案復能悉本持平客觀之態度力求切合實際之需要理論事實雙方兼顧綜觀全會結果成績尚優所有決議各案除由屬會分別先後緩急另行專案呈請

鑑核施行外謹將決議案六十件繕印清冊三份備文呈送仰祈

鈞院鑒核轉呈至蒙古會議彙編刻正著手編造一俟編印竣事續行呈送合併陳明謹呈行政院附呈決議案清冊三份

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馬福祥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縱觀蒙古會議最具體「成就」是成立了「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及完成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

在蒙古會議進行中，曾發生發生頗值一敘之插曲，按參加此一會議的蒙古代表，雖分為王公代表與群眾（旗民）代表兩類，但均由扎薩克等王公所指派，其無法代表真正群眾（旗民，也即一般蒙古人民）意志，乃是必然現象，試想可有一般蒙人願意每年有一段時間無酬為王公服勞役？所有土地、草場概屬王公貴族所有，然而參加蒙古會議的代表，既為王公貴族所指派，在會議中自然全力維護王公貴族的利益，此乃理所當然，事所必然者，原不足為怪，但上文提到之博彥滿都（見附圖）則異於是，他是內蒙「蒙古平民同志會」成員，一向反對世襲的王公制度，認為必須實行內蒙古民族自治，所以覺得透過蒙古會議表達廢除王公制度，或許可以達到此一目的，所以透過私人關係，由哲盟科左前旗代理扎薩克薩嘎拉協理台吉派他為該旗出席蒙古會議的代



博彥滿都

表，在出發前由哲盟盟長召集所有代表開會，宣達維護王公制度的主張，並作成書面文件，要各代表簽名，當時博彥滿都就拒絕簽名，曾引起盟長等相關人士的不悅，到了南京開會時，博彥滿都果真提出蒙古地方自治方案，主張廢除內蒙古王公制度，應設立內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直轄中央，不受各省、縣管理等，此案提出後，當時出席之蒙古王公代表及東北四省代表（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立即反對，幾經爭辯，最後被否決而不成案（見張紹庭專文，頁 29），據博彥滿都自稱：

「我的提案是要求依照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精神廢除封建王公制度，實行真正的民族自治，並改變行政系統和區劃，設立『內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直轄中央，不受省縣的管轄。在自治政務委員會之下設盟，盟下設旗。其他蒙旗代表的提案，都是要繼續保留王公制度。因之王公代表和東北四省的代表，都蠻橫地反對我的提案。這個問題成了大會爭執的主要問題，每次會議都為之爭吵不決。」（見博彥滿都專文，頁 155）

張紹庭與博彥滿都的說法相當一致，可以印證當時會場的實際狀況，不過博彥滿都的說法「改變行政系統和區劃」就理論而言，似乎頗有道理，但實際的情形是蒙漢雜居已有近二百年歷史，許多旗縣（或將設縣的設治局）是在同一個地方，如何區隔或劃分旗與縣？所以博彥滿都主張改變行政區劃，設立容易，卻無法實際運作的方案。至於主張保留王公制度者，以哲盟王公代表以烏爾圖那蘇圖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說：

「蒙古王公都是成吉思汗的後裔，自從元朝開始，經過明、清兩代，以至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並得到各個朝代、各個政府的承認和保護。這是因為成吉思汗的子孫各蒙旗王公就是蒙古民族，沒有王公就沒有民族了，旗民一旦離開王公，就不能生活，這是蒙古民族的特點，所以內蒙古的王公制，必須仍舊保留。」（見博彥滿都專文，頁 155）

這一段話引歷史為證，卻不合史實，蒙古王公幾乎都清朝所封，有多少王公並不是成吉思汗的後代，就以哲盟的王公來說，都是成吉思汗之弟

哈布圖哈薩爾的後裔，雖然是博爾濟錦氏，但絕不是成吉思汗的後代，卓盟的王公根本不姓博爾濟錦氏，連「黃金氏族」都沾不上，怎會是成吉思汗的後代？至於說「旗民一旦離開王公，就不能生活。」這簡直低估了全體蒙古人的智慧，這純粹是封建世襲王公自我膨脹的想法。

蒙古會議決議通過《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經蒙藏委員會審議並報請國民政府核定公布，時為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二日，除公布外，並刊載於《國民政府公報》第八九七期，該法全文共計三十七條，其中特值注意者為第五條，其文為：

「蒙古各盟及各特別旗直隸於行政院。」

另第七條：

「蒙古各旗，直隸於現在所屬之盟。……」

從這兩條條文看，其一，以法律賦予蒙古盟、特別旗、旗以合法之地方行政組織地位；其二，明白規定盟、旗與省縣沒有隸屬關係，但對於盟旗、省縣管轄地區重疊問題，仍然未予解決，縱或如此，也可以視之為蒙古會議之一大成就。

#### 四、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之設立

蒙古會議除通過《蒙古盟部旗組織法》並經政府明令公布成為法律，可視為具體成就外，另有雖也具體但未必屬於成就，則為設立《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此因中國幅員廣大，地方為瞭解中央措施，往往派人長駐首都，一則中央將最新動態通知地方，再則地方官員晉京時，既有落腳之處，也有人嚮導，三則地方人員進京趕考或經商，駐京人員也會給予協助，通常都稱為某某省（市）駐京辦事處，相沿成習，至今猶然，但民國成立後，內、外蒙古盟、部從未派人駐京，致使蒙古盟旗地方與中央有所隔閡（外蒙古於民元在俄國蠱惑下宣稱獨立，其後北洋政府與俄、蒙交涉，改獨立為自治，之後再撤銷自治，完全回歸中國，嗣因在談判過程中，西北籌邊使徐樹錚操之過急，失去外蒙人心，而北京又因直奉之爭，徐樹錚離蒙，白俄餘黨竄入外蒙，從此外蒙局勢一發不可收，最後又落入蘇聯操控之下，成立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自不可能有派人駐京之



事。但在清末以前仍有三音諾顏部親王那彥圖爲外蒙駐京官員），爲彌補此項缺失，乃有此項各盟旗推派代表駐京之議，以便隨時反映盟旗對地方意見，也可隨時將中央政策、措施向盟旗宣達、並照料來京洽公之蒙籍人士，乃至在京求學之蒙籍青年，此項構想頗合於事實需要，何況當時已有「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處」的既成事實，其費用全由政府負擔，遂將代表團制度化，於是蒙藏委員會訂定《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組織簡章》一種（當時蒙藏委員會蒙事處長及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處處長，均由吳鶴齡氏擔任），於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呈奉行政院准予備案，該簡章共計十三條，全文引錄如次：

- 「第一條 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本各盟旗之意旨受蒙藏委員會之指導，辦理下列（原文爲左列）各項事宜：
- 一、中央各機關交辦事項；
  - 二、蒙古各盟旗委辦事項；
  - 三、宣達中央黨政情形於蒙地；
  - 四、報告蒙古實際情況於中央；
  - 五、照料蒙古因公來京人員及來京求學學生；
- 第二條 本處由蒙古各盟及等於盟之各部，各推派駐京代表二人，各特別旗各推派駐京代表一人組織之。
- 第三條 各盟及等於盟之各部暨各特別旗駐京代表，須由各原派盟部旗公署發給證明文件，並咨呈蒙藏委員會備案。
- 第四條 各盟部旗駐京代表，各對原蒙部旗公署負責，各盟部旗公署對於所派代表，得隨時撤回改派之。
- 第五條 本處以代表會議爲最高權力機關，代表會議議事細則另定之。
- 第六條 代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 第七條 代表會議以在京代表過半數出席爲法定人數。
- 第八條 本處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由全體代表公推之。
- 第九條 本處全體代表分下列（原文爲左列）五組辦事：
- 文書組
  - 翻譯組

宣傳組

會計組

庶務組

第十條 本處設下列（原文爲左列）各職員，輔助主任、副主任及各代表，辦理各項業務。

秘書二人

總幹事每組一人

幹事五人

前項各職員均以本處代表會議之決議，任免之。

第十一條 本處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簡章如有修正必要時，由本處代表會議議決呈請蒙藏委員會核定之。

第十三條 本簡章自呈准之日施行。

之前蒙古代表團駐京辦事處處長係由吳鶴齡兼任，自是「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主任順理成章也由吳鶴齡兼任。試看除外蒙古外，計有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青海左右翼、新疆烏納恩素珠克圖東、南、西、北路盟、巴圖塞特啓勒圖、青塞特啓勒圖等十四個盟；察哈爾、呼倫貝爾、東、西布特哈四個部；伊克明安、歸化吐默特、阿拉善和碩特、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四個特別旗；如全部派代表駐京，人數多達四十人，再任用職員十二人，總人數有五十二人，差役人員尚未核計在內，這個辦事處規模也頗可觀。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不久，此一辦事處雖無辦事處所，但仍透過蒙藏委員會爭取到少量預算，作爲「駐京代表」之生活補助，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始予撤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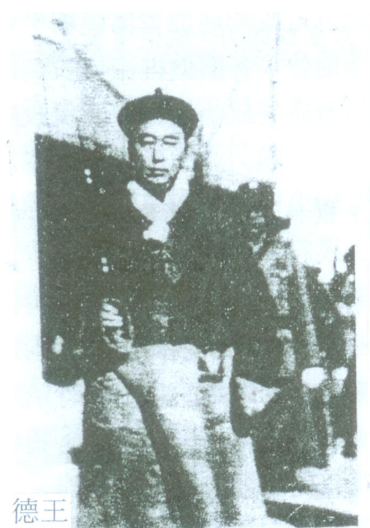
## 五、結語

內蒙古今日的狀況，與以往已有絕大不同，同樣的近代內蒙古與兩、三百年前的內蒙古也是天差地別，時代在變，任何空間也必然隨之改變，如果堅持不變，則不僅是保守，而必然是落伍，最後會被歷史的遺忘，但雖然必須跟隨歷史腳步前進，對過往的足跡必須瞭解，任何「今天」都是

無數個「昨天」累積而成的，我們今天所作所爲，都是「明天」的歷史。遺忘歷史的民族，終將被歷史所遺忘，本文所載的幾件事，都是關乎蒙古近代史的幾件大事，其中提到人物，對內蒙古近代史都曾經起到極大的影響，試看吳鶴齡先生，1928年（民國十七年）時原爲北洋政府蒙藏院秘書，因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由行政院下之蒙藏委員會籌備處派員接收蒙藏院，吳氏初僅爲找出路，邀集在北京幾個蒙籍人士自行組成「蒙古代表團」，憑他精準的判斷力與旺盛的活動力，使一個臨時組成無藉藉名的所謂「蒙古代表團」，展開對國民政府派往北京接收官員游說，獲得南方官員的重視，這期間一則吳氏有過人的智慧與便給的口才，使北上的國民政府官員意識到內蒙問題的重要性，對吳氏等人遂加以重視；再則，那些國民政府派往北京接收人員太以粗心大意，其時在北京的蒙古重要人員很多，如蒙藏院貢桑諾爾布親王，其學識氣度均高於常人，即使從外蒙古流亡到內地的三音諾顏部大呼圖克圖迪魯瓦活佛（民國十三年逃到內地，1948年或49年時被美國情報單位接到美國），南方官員都未加以接觸、請益，對「蒙古代表團」之性質、代表性也都不加查證，可見其處事相當草率，另者蒙古代表團以禮貌性拜訪蒙藏委員會籌備處前往北京預備接收蒙藏院之李丹山、于蘭齋，兩訪未遇，改以函邀集會，李、于二人居然回函責罵，殊非待人接物之道，不僅代表李、于二人涵養不足，更使南京政府蒙羞。而在蒙古代表團內部又因補英達賴與吳鶴齡之不和，引起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與吳鶴齡之立，凡此均爲內蒙古近代史上重要人物與事件。德王與吳氏初期雖有齟齬，後以德王欲圖謀內蒙自治，需才孔殷，又經班禪額爾德



吳鶴齡年輕時肖像



德王

尼從中調解，而吳氏確屬才華洋溢智多星型人物，於是前嫌盡捐，攜手共圖「大業」，惜乎抗戰期間投日，在日本操控下成立所謂「蒙疆政府」，背叛國家，此也內蒙古近代史上一重大事件，抗戰勝利後，德、吳、李（李守信）一行飛往重慶謁見蔣介石，後雖經蔣氏赦免其投日應受之刑罰，但絕不代表德、吳、李未曾犯下投日之罪行，以往曾有論者以既經赦免，等同未犯投日之罪，此實係誤解，元首所能赦免者乃犯者所受之刑罰，而非既成事實之罪行，這是基本法律常識，實不宜混淆。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學懶三天，學勤三年。（仫佬族）

人勤，荒坡生寶；人懶，農田生草。（毛南族）

蠢人靠幸福過日子，智者靠勤勞過日子。（苗族）

快樂和汗水是兄弟，幸福和勤儉是一定。（白族）

要想有吃穿，必須勤動彈。（畚族）

勤問路的人，不會迷路。（德昂族）

鐘錶靠發條，發家靠勤勞。（土家族）

手勤能致富，話多生事故。（景頗族）

憐憫惡狼的人，反被惡狼吃掉。（烏孜別克族）

臉上無光身有病，眼裡無光心有病。（哈尼族）

英雄難得戰時伴，年邁難得兒時伴。（哈薩克族）

穀在於幼苗，人在於幼年。（撒拉族）

一棵樹不能萬世長青，一個人只有一段青春。（鄂倫春族）

笑一笑，不讓老；跑一跑，病沒了。（維吾爾族）

獨樹難擋風，獨木難取暖。（蒙古族）

只顧自己，不算好官；脫離眾人，不算好漢。（哈薩克族）

虎怕離心，人怕孤單。（布依族）

夜鶯思念草花，人民熱愛國家。（烏孜別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布勒瑚里湖考略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 摘要

據《八旗通志·初集》記載：「（長白）山之東有布庫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降池畔，吞朱果，生聖子…是爲本朝開基之始也。」與此呼應的是，至今吉林省安圖縣境內尚有「天女浴躬池」一座，號稱正是天女降臨之湖，咸認真跡，招徠遊人如織，流連忘返。不過這座池子實爲清末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由奉天候補知縣劉建封所發掘命名的仿冒品，許多條件並不符合歷史情境，難昭公信。根據最原始的滿文資料《舊滿洲檔》上記載可知，布勒瑚里湖實位於黑龍江畔，即舊稱江東六十四屯處。推測當初〈三仙女〉傳說源自虎爾哈人所述，後經清太宗皇太極採用，當作族源傳說，惟將起源地略而不論。再至康熙朝，才又將祖源地正式確認為長白山，形成定制。於是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時代名噪一時的黑龍江布勒瑚里湖，此後即爲朝廷所忽視，而乏人問津。時至今日，該湖區已劃入俄境，屬阿穆爾州康斯坦丁鎮管轄。更由於滄海桑田，湖面多已開發爲農地，水域縮減爲兩條小河，早已不復當年廣袤與靈氣矣。

**關鍵字：**黑龍江、布勒瑚里湖、天女浴躬池、鏡泊湖  
吉利欽水庫

## 壹、前言

清朝始祖發祥地何在？根據《八旗通志·初集》記載：「（長白）山

之東有布庫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降池畔，吞朱果，生聖子…是爲本朝開基之始也。」<sup>1</sup>因此，只要能找到這座稱爲「布爾湖里」的池子，<sup>2</sup>似乎就可以瞭解清朝始祖發祥地了，看起來並非十分困難。

不過由於滄海桑田，世事變化。三仙女所沐浴過的布勒瑚里泊，在地理上、名稱上都有改變的可能，於是學術界就提出了許多看法，讓人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感覺。

其實有清一朝，自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齊在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正式建國，國號「後金」，建元天命之後，<sup>3</sup>至今（2016）僅只四百年，在歷史長河中，時間甚近，簡直恍如隔日。資料存留亦甚豐富，可稱汗牛充棟。堂堂一座大湖，不可能憑空消失，查不出來。惟在於資料的解讀上，或許各有識見，以致答案有所分歧。只要能釐清其間疑問，找出大湖的位置，當屬可能。

## 貳、各種解讀

學者董萬侖對於清初歷史的研究，頗有心得。曾寫過《東北史綱要》、《清肇祖傳》等名著。<sup>4</sup>他數度爲文，詳細說明布勒瑚里泊的來龍去脈，認爲就是現代的鏡泊湖。<sup>5</sup>這個講法頗有影響力，也有人引用。例如安介生所著《民族大遷徙》一書，就採用這個說法。書中提到：

<sup>1</sup> 鄂爾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民74[1985]，第1版），卷一，頁1-2。

<sup>2</sup> 布勒瑚里湖是滿語（bulhūri omo）的音譯，omo 意爲「湖泊」，bulhūri 是該湖的名稱，音譯頗爲多樣：康熙二十一年（1682），重修完成的《太祖高皇帝實錄》記爲「布爾湖里池」；在乾隆元年（1736）編修完成的《太祖高皇帝本紀》，譯爲「布爾湖里池」；於乾隆四年（1739）正式成書的《八旗通志·初集》寫爲「布爾湖里池」；乾隆四十四年（1779）成書的《滿洲實錄》譯爲「布勒瑚里泊」；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清開國方略》成書寫成「布勒瑚哩池」；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的《清朝通志》譯爲「布勒瑚哩池」；乾隆五十四年（1789）成書的《滿洲源流考》「布勒瑚哩池」。

<sup>3</sup> 程光裕，《中國通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3[民102]），頁386。

<sup>4</sup> 《東北史綱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清肇祖傳》（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

<sup>5</sup> 董萬侖，〈論滿族三仙女神話的形成與價值〉，《民族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3期），頁34-36。

又如滿、漢文對照《滿洲源流》一書也指出：「滿洲原起於長白山之東北布庫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即今鏡泊湖）」<sup>6</sup>

至於另有將布勒瑚里泊認定是天池、天女浴躬池等總共五種論述，董萬侖雖不贊成，卻也並未加以反駁。這麼一來，真相反而更為模糊。現在就將其引出，並略加申論如下：

### 1、天池說

「天池說」是相當傳統的說法。天池是長白山頂上的火山口湖，又名龍潭。韓國稱白頭山天池，是中國和北韓的界湖，位於吉林省南部，北韓兩江道北部，也是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等三江的源頭。<sup>7</sup>現在交通便捷，遊客頗多，成為旅遊勝地。「天池說」最早是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在《讀史叢錄》一書裡提出來的，認為天池就是布勒瑚里泊，清始祖布庫里英順是從長白山天池乘舟，順著圖們江而下，到鰲莫惠的鰲朵里城里，並建號滿洲：

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在《讀史叢錄》一書說：清始祖布庫里英順從長白山天池乘舟順圖們江而下至鰲莫惠鰲朵里城。此說的根據是：他認定此鰲莫惠即是圖們江上游的會寧，蕭一山在《清代通史》裡同意此說。<sup>8</sup>

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的說法，不只在《讀史叢錄》一書裡看得到，另外在稻葉君山著的《清朝全史》裡也有類似記錄。內藤認為此鰲莫惠即是圖們江上游的朝鮮會寧，<sup>9</sup>其說法如下：

俄朵里為朝鮮會寧府。敦化縣治既不足擬定俄朵里之位

<sup>6</sup> 葛劍雄主編；安介生著，《民族大遷徙》，（香港：中華書局，民 103[2014]，收入《地圖上的中國歷史叢書》），頁 53。

<sup>7</su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天池\\_\(長白山\)](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天池_(長白山))。

<sup>8</sup> 董萬侖，〈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2 年第 01 期），頁 63。

<sup>9</sup> 朝鮮會寧府現稱會寧市，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咸鏡北道圖們江（韓語：豆滿江）沿岸城市，與吉林省龍井市接壤。天池到會寧市有圖們江相連，直線距離約 145 公里。



置，吾人別考實錄之記事，而求此於長白山之東方。參對朝鮮、支那及清朝史料，殊有可以供研究者。就此問題，而與以明快之判斷者，文學博士內藤虎次郎氏有言：清之長白山東俄莫惠野，即指今之朝鮮會寧州。會寧之土名、女真名之曰幹木河 Wa—mo—ho，又曰吾音會 o-eum—hoi。朝鮮李太宗時，幹朵里酋童孟哥帖木兒，乘其地空虛，入據之。事載東國輿地勝覽，此孟哥帖木兒，與清稱肇祖孟特穆相符。幹朵里為女真之種名，清之俄朵里城，亦當為種族之名。孟哥帖木兒被兀狄哈襲殺，其弟凡察及兒童山等逃出遼東。明與朝鮮記錄亦同，關於清朝祖先之傳說，當以此說之解釋，最為合理。又幹朵里酋長孟哥帖木兒，居今三姓附近，為元代三萬戶之一。清初編纂實錄時，既不能確指其發祥地，則忘俄朵里為彼等部族之種名，亦何足怪也。至關於滿洲國號之由來，清朝記事，其妄更甚。<sup>10</sup>

「天池說」有會寧的土名、女真名稱幹木河 Wa—mo—ho、吾音會 o-eum—hoi 支持，又與朝鮮記錄、清朝祖先傳說相符，解釋起來，似也相當合理。不過天池周長根據現代丈量的結果是 14.4 公里，以一公里二華里估算，天池周長約 29 華里，與《舊滿洲檔》上所說「布勒瑚里湖方圓百里」，<sup>11</sup>並不一致，因此似乎可以直接排除長白山天池是布勒瑚里湖的說法。

不過在歷史上，康熙皇帝卻始終認定清朝始祖發祥地是在長白山，而且一再派人前往探勘，希望能加以證實，就是傳說中的布勒瑚里湖：

長白山[土名歌爾民商堅阿鄰，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皆曰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二百里，橫互五之無樹木，惟生叢草。草多白花，山半

<sup>10</sup>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68。

<sup>11</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九，頁 4241-4243。天聰九年（1635）五月初六。滿文原文為：tere bolkori omode šurdeme tanggū ba，該布勒瑚里湖周約百里。

有石台，可四望。山巔積雪皚皚，五峰環峙。南一峰稍下如門，中有潭，週二十五里[大明一統志雲：周八十里，盛京志雲：四十里，吳漢槎長白山賦自注雲：形如豕腎縱餘五里、橫八里]。峰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副都統薩不蘇奉旨丈量，得此數]。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賽因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脊革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尚書圖納奉旨往繪全圖]。<sup>12</sup>

爲了丈量天池，康熙派出寧古塔副都統薩不蘇前往。另外爲了要確勘長白山山北的一座廟，號稱供奉著稱爲「興國靈應王」、「開天弘聖帝」的神靈，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又遣官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劄、三等侍衛臣索口等四人前往，並發出皇帝的諭旨如下：

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sup>13</sup>

於是這四名官員，立即銜命出發，到長白山上探尋清朝始祖發祥之地，同時確勘那座「開天弘聖帝」廟。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初五日起行，當月十四日到了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二十三日抵達兀喇地方。一問之下，才知當地軍民人等包含獵戶，根本沒有確知長白山的人，因此只去找湖，不再找廟。不過幸好還有人知道，長白山頂離額赫訥陰地方不遠，可以將之當作補給站，因此立即載米十七小船，到額赫訥陰地方預備。經歷不少困難，探勘人員於六月十七日奮力抵達天池，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

山頂有池，五峰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

<sup>12</sup> (清)楊賓撰，《柳邊記略》，（臺北市：藝文，民 60[1971]，收入《遼海叢書》），卷一，頁 7-8。

<sup>13</sup> (清)楊賓撰，《柳邊記略》，（臺北市：藝文，民 60[1971]，收入《遼海叢書》），卷一，頁 8。

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峰，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峰，較諸峰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sup>14</sup>

由天池下來，回程中也遇到許多困難。由於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險灘頗多，號稱是「大江九險」，記錄如下：

二十九日。因馬疲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蔭克錫險處、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sup>15</sup>

探勘的行動，並未就此中止。前面說過，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刑部尚書圖納，曾經「奉旨往繪全圖」。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爲了繪製《皇輿全覽圖》，朝廷派遣烏喇總管穆克登，前往鴨綠江、圖們江、長白山一帶，調查中、韓之間的邊界，以釐清地圖上未曾註記的區域。同時豎立界碑，立於長白山天池以南十餘里的分水嶺上：

長白山天池對於清朝意味著什麼，清朝之看重長白山，幾次欲派人探查，甚至派官祭祀此山，都因清朝出自長白山，視其為王朝發祥之地。所以，當朝鮮譯官金指南面見穆克登時，未敢發以“天池橫截做限”，而是提出長白山“大池之南即我國界”。定界結果，界碑立於長白山天池以南 10 餘里的分水嶺上。碑文記載：“大清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查，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為分水嶺上勒石為記。”此次定界再次確認中、朝兩國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的事實，並且使以前模糊不清的長白山一帶邊界變得清晰。長白山天池作為清王朝

<sup>14</sup> (清)楊賓撰，《柳邊記略》，（臺北市：藝文，民 60[1971]，收入《遼海叢書》），卷一，頁 9。

<sup>15</sup> (清)楊賓撰，《柳邊記略》，（臺北市：藝文，民 60[1971]，收入《遼海叢書》），卷一，頁 9。

發祥聖地歸入清朝，天池以南，更確切地說，界碑所立分水嶺以南劃歸朝鮮，朝鮮達到了預期的定界目標。從此，長白山成為中朝界山，它既是中國山也是朝鮮山。<sup>16</sup>

由以上所述可知，「天池說」雖因天池的規模，較諸布勒瑚里湖為小，無法令人信服。卻因康熙皇帝的一再派員探勘、立碑，有所認證，讓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成為最傳統的說法。

清廷雖然一直堅持「天池說」，不過到了清朝末葉，內憂外患不斷。甚至在與外國人談判邊界問題時，還是漏了口風，承認黑龍江一帶，方為祖宗發祥之地：

穆拉維約夫認為已經到了時刻，必須對“事態作肯定而堅決的扭轉”了。第二天，即 5 月 23 日，他上岸把他的全部要求用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滿人開始提出他們對於阿穆爾河和烏蘇里地區擁有主權的証據；他們說他們以主人身份向當地居民徵收貢賦。他們在這些地方和沿海都一直設有卡哨，足証他們對土地的主權。從烏蘇里江以至海濱的土地，都是當今皇朝的祖宗發祥之地。如果這片土地讓給俄國，那就無異是“叛逆”。俄國人對此統統加以否認，辯稱：在阿穆爾河與烏蘇里江地區的原住居民，從未向中國納貢。而在 1854—1855 年間英國入侵犯時，保衛他們的是俄國人，沒有見過中國有什麼幫助。至於清朝的老家則係寧古塔地方。對此種說法，奕山答稱，他決不懷疑俄國政府要求很高，可是，如果中國也跟你們一樣要求把尼布楚要回來，請問俄國政府肯不肯讓中國人越過瓊瑯，去把夷人趕走。穆拉維約夫駁道：這種說法與本題毫不相干。他假裝大怒向希什馬廖夫說，他放棄和平解決的希望了，他的要求都是不容更改的，中國人至遲必須在明天早晨予以接受。他起身回船時，用眼憤怒地瞪著這一大幫滿人。奕山午後派一位官員去問他發脾氣的原因時，並說“他們今後的行

<sup>16</sup> 李花子，〈朝鮮王朝的長白山認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 期），頁 129。

動必不致使將軍生氣”。5月27日一早，滿人派協領一員與愛紳泰同到穆拉維約夫船上。他們聲言可以同意接受條約，如果能把約文內提到烏蘇里江之處的“邊界”字樣刪略。那就是說，自烏蘇里江直至於海的土地，在條約未經北京批准之前，應作為未經劃定土地。《璦琿條約》遂於1858年5月28(16)日(咸豐八年三月十五日)，以頗為隆重的儀式簽了字。<sup>17</sup>

以上這一段文字，是1858年5月28(16)日(咸豐八年三月十五日)，《璦琿條約》草案，「以頗為隆重的儀式」簽約時的洋人記錄。中方代表奕山提出証據說，對於阿穆爾河和烏蘇里地區擁有主權，除了徵收貢賦、設有卡哨外，還「都是當今皇朝的祖宗發祥之地」。不過俄方代表穆拉維約夫則反駁說，清朝的老家是寧古塔地方，這正是康熙當年所開始的主張的「天池說」。由此可知，奕山知道皇朝的真正的發祥地在黑龍江（阿穆爾河），而穆拉維約夫也清楚，康熙曾講過：「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的那段話，雙方都讀過清初歷史。

## 2、圓池說

「圓池說」是董萬侖先生所整理出來，談布勒瑚里湖何在的第二種說法。根據《安圖縣志》上的記載，安圖縣第一任知縣劉建封曾經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勘邊時，找到圓池並樹立天女浴池碑，宣稱圓池就是所謂的布勒瑚里湖原址：

延邊地名辨在《長白山遊覽》一書說：長白山東六十餘里有一布庫里山，山下有一圓池，即是相傳三仙女沐浴的布兒湖里泊。范垂政先生在《北方文物》上發表《布勒瑚里湖考》一文，亦持此說。此說的依據是：《清史稿·地理志》記：“安圖縣西二百里布兒湖里，有天女浴池碑，土人呼圓池。”此天女池碑，據《安圖縣志》記載，是安圖縣第一任知縣劉建封在光緒三十四年勘邊到達該地時樹立的。<sup>18</sup>

<sup>17</sup> Quested, R.K.I.奎斯特德著；陳霞飛譯，《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北京市：商務，1979年，第1版），頁153-154。

<sup>18</sup> 董萬侖，〈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

所謂「勘邊」，在當年國力衰弱，內憂外患頻仍時，可是一件攸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現在還能看到當時的一些公文記錄：

會議政務處議奏，為遵旨會議，恭摺仰祈聖鑒事。八月二十日由軍機處抄交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奉朱批，會議政務處議奏，欽此。臣等覆核原奏所稱：擬劃臨江縣以東長生、慶生二保之地及吉林長白山北麓龍岡之後，添設府治，名曰長白，駐於十八九道溝間之塔甸等因。伏查舊志云：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北千餘里，橫亘千里，有水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元史》所謂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向為邊防控扼之區。又其地夙多金礦，而林木之饒，久為他族所覬覦。曩時興京廳之設臨江縣，審得地利之宜，倘於該縣東界與吉林府西南界添設府治，《盛京通志》所謂長白之北，崇岡疊嶂，茂樹深林百餘里，土人呼為訥秦窩集等處適當其地。從前坐棄饒沃，轉致匪徒出沒，緝捕為難。而險要之區，守備空虛，亦不足以固疆圉。今擬添設府治，與臨江、輯安兩縣聯絡聲勢，呼應靈通，邊徼寇盜既無疏縱之虞，防衛邊疆又絕窺伺之慮，既無便於此者，應請飭下該督所有勘界、筑署、建官、駐兵之處。速即籌議具奏。將來地闢民聚，應否增添領縣，均由該督酌量情形，隨時奏咨立案。至原奏先派設治委員前往辦理，如能勝任再行奏補等情，亦與東省近例相符，應如所請，以重責成。所有臣等會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鑑，謹奏。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sup>19</sup>

徐世昌以東三省總督的身分，向慈禧皇太后、光緒皇帝陳奏，擬議添設長白府治，<sup>20</sup>以固疆圉。時為光緒三十四年（1908）九月十一日，正是清廷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關鍵時刻。不過才一個月，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的

究編輯部，2002年第01期），頁63。

<sup>19</sup> 張鳳台編撰；黃甲元，李若遷校注，《長白匯征錄》，（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頁10-11。

<sup>20</sup> 長白府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後，於宣統元年（1909），下轄安圖縣、撫松縣。民國二年（93）改稱為長白縣，1958年9月15日再改稱為長白朝鮮族自治縣。

光緒帝載恬得了重病，十月二十二日，光緒帝駕崩，第二天，慈禧也薨逝了。<sup>21</sup>奏摺是恭陳皇太后、皇上聖鑑的，可是面對這兩個垂死之人，讓人不得不懷疑，這些聖旨、批示，到底是從何而來。在此亂局之中，徐世昌竟步步高升，十年後於民國七年（1918），獲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支持，選舉當上第二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大總統。<sup>22</sup>

徐世昌當年以東三省總督身分上奏朝廷，擬添設長白府。批准後當然要探勘府界，以標明所管轄區。這時安圖縣第一任知縣劉建封於焉登場，他率領陣容堅強的勘界大軍，從容上陣，其名單如下：

襄辦人員銜名籍貫：安圖調查員，留奉知縣劉建封[諸城]、撫松調查員，調奉直隸試用府經歷許中書[安陽]、編輯員，縣丞職銜附貢生劉龍光[安陽]、編輯員，日本宏文學院畢業縣丞職銜附貢生王大經[安陽]、文案兼編輯員，布政司理問銜徐家馨[銅山]、測繪兼調查員，北洋陸軍測繪畢業陳德元[青縣]、測繪兼調查員，北洋陸軍測繪畢業康瑞霖[武強]、測繪兼調查員，北洋陸軍測繪畢業王瑞祥[德州]、測繪兼調查員，北洋陸軍測繪畢業劉殿玉[新野]、襄校員，五品頂戴山東盡先補用知縣陳鑒[光山]、襄校員，北洋高等巡警學堂畢業附生吳瑞芬[安陽]、襄校員，北洋高等巡警學堂畢業廩貢生饒亮采[固始]、襄校員，北洋高等巡警學堂畢業候選縣丞陳鴻圖[光山]、襄校員，北洋高等巡警學堂畢業附生王毓秀[吳橋]。<sup>23</sup>

這份名單開出，可說令人眼睛一亮。有傳統科考貢生、有當紅日本留學生、有新制北洋學堂畢業生等，無論學歷、經歷，都可稱得上是一時之選，理當可以作出一些事業。不過安圖縣知縣劉建封卻在勘界測繪之餘，想到了找出布勒瑚里湖這件大事，說「安圖地廣人稀，較撫松稍難，而地界韓境，較撫松尤重。其西南二百餘里有布爾湖里，即三天女浴躬之池，

<sup>21</sup>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下四，頁 50。

<sup>22</sup> 章用秀，《總統畫家徐世昌》，（南昌市：江西美術，2009，第 1 版），頁 25。

<sup>23</sup> 張鳳台編撰；黃甲元，李若遷校注，《長白匯征錄》，（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頁 14-15。明清時代，參加童子試獲得取錄者為秀才。初進學的秀才，稱為附生，附生陞廩生，廩生陞歲貢生。

爲發祥聖跡要區。」頗令人拍案驚奇：

長白府踞鴨綠江上游，實為三省鎖鑰。則松、圖兩江仍當嚴密防範，藉資聲援。距長白府東北四百餘里為紅旗河流域，控圖們江上游，擬定為建署地點，名曰安圖縣，以為韓民東渡越壑之防。距長白府西北五百餘里為龍岡後以西之雙甸子，控松花江上游，擬定為建署地點，名曰撫松縣，藉作白山右屏。安、撫二縣即以二道白河為界，亦天然界也。就長白山論，安、撫如兩翼，就長白府論，安、撫如脊膂。襟帶江山，形勝便利，大有犄角之形，實於邊務上關係綦重，不可不兼籌並設，以維全局，而控岩疆。惟辦法尚有不同，撫松一縣民人較眾，物產亦饒，但咨由吉撫轉飭濛江州牧，江該州歷年戶籍租稅一切案卷移交清楚，便可派委籌劃，收功尚易。安圖地廣人稀，較撫松稍難，而地界韓境，較撫松尤重。其西南二百餘里有布爾湖里，即三天女浴躬之池，為發祥聖跡要區。若高張旗鼓，非特糜費，抑涉鋪張。惟查該處森林尚屬完全，擬將設治主義潛附於採木官局之內，先派員經理木植事宜，俟基礎堅定，有財有人，即行建署設官，則勢如破竹，不勞而理。此安、撫設治辦理之情形也。<sup>24</sup>

劉建封勘界測繪，為設治長白府、安圖縣、撫松縣做準備。其動機當然是與「韓民東渡越壑」有關。為了移民實邊，清廷只好放棄長期奉行的封禁政策：

從順治初年到同治初年的 200 多年裡，清朝對中朝邊境地區實行嚴格的封禁政策，造成這一帶人口稀少，土地荒蕪，從而導致「韓民越壑」發生。在中國邊疆危機日益嚴重的大背景下，「韓民越壑」成了日本蠶食中國領土的藉口。作為對策，清朝政府只好放棄長期奉行的封禁政策，實施「移民實邊」。<sup>25</sup>

<sup>24</sup> 張鳳台編撰；黃甲元，李若遷校注，《長白匯征錄》，（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頁 19。

<sup>25</sup> 張士尊，〈朝鮮王朝的長白山認識〉，《學術交流》，（哈爾濱市：黑龍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7 年 10 期），頁 174。



從設治移民實邊，到發現「天女浴躬池」，看似是發生了一件案外案。不過仔細思索，卻可以看作，這正是清朝末葉「內憂外患」的具體寫照。外患，當然是與「韓民越壑」，日本蠶食中國領土有關。而內憂，卻與「天女浴躬池」的發現有關。

前面論及「天池說」時曾舉出許多證例，天池是康熙皇帝的一再派員探勘、立碑所認證的「發祥聖地」，史不絕書。劉建封身為朝廷命官，又位居長白山區域，豈會有不知此事之理？然而安圖縣令劉建封，既非八旗子弟、天潢貴胄，卻擅自推翻前說，自己在轄區裡面，另尋「發祥聖地」，真可謂法理難容。不過當時確實是一個政權消亡的年代，皇上駕崩，太后薨逝，接二連三。即使是在東三省總督任內，推動長白府設治的要角徐世昌，不久前才爲了考察立憲，而遭到革命黨炸彈暗殺，僥倖逃命，驚魂未定：

考察憲政大臣之派遣。憲法發布國會開設等語，直如一種之福音，為全國上下所歡迎。阻撓新政之西太后，知大勢所迫，無可如何。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命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端方、五人為考察政治大臣，出遊日、英、美、法、德、奧、意、俄、比、九國，考察其政治。五大臣將出發，於北京之停車場，革命黨有投炸彈者，載澤、紹英、二人傷焉，出洋考察之舉，一時中止。後以端方之上奏，乃以李盛鐸、尚其亨二人，代徐、紹二人，而五大臣出發。<sup>26</sup>

徐世昌雖不敢出國考察，卻在驚嚇之餘，當上了東三省總督。但是，一葉知秋，在革命浪潮衝擊之下，皇帝老兒的權威，早已不再。劉建封雖擅自找出「發祥聖地」，原為大不敬之罪。可是亂世之中，朝廷、總督自身難保，對於基層的越軌之舉，也只好裝聾作啞、視若無睹了。另據安圖縣令劉建封的描述，圓池就是所謂的布勒瑚里湖：

天女浴躬池。長白山東布庫哩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

<sup>26</sup>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下四，頁 45。

傳有三天女，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次佛庫倫，降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之入腹，尋生一男，生而能言，貌奇偉。及長，母告之故，賜之姓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與小舡乘之，遂凌空去。男乘舡順河登岸，折柳蒿端坐其上。適鄂謨輝三姓爭長仇殺，有取水河步者奇其貌，歸語人曰：「汝等毋爭，天生非常人」。趨視之，且詰其由來。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等之亂者」。告以姓名，眾曰：「此天生聖人也。」交舡之，迎至家，推為國主，妻以女，尊為貝勒。是為滿洲生民之始。按：天女降浴，語近不經。顧媒姆孕周，玄鳥生商，載在《雅》、《頌》，尼山刪經而猶存其舊，豈故傳疑耶。天生神聖，固未可以常理論也。…紅土山：山舊名布庫里山，山下有池名布勒瑚里，即三天女浴躬池，水向東南流六里許，入紅土山河。<sup>27</sup>

劉建封稱「媒姆孕周，玄鳥生商，載在《雅》、《頌》」，似乎引經據典，頗有考據。但是他所發現的布庫哩山、布勒瑚里湖是考自何書，卻隻字未提，只說是舊名。可知這些山、湖，都是劉縣令的臆測，而毫無所據。

不過民間倒是跟得很快，有些作家就根據劉建封所發現的布庫哩山、布勒瑚里湖寫出生動的童話故事，讓滿族故事增添了不少色彩：

天女浴躬池。在長白山主峰下的浩瀚的林海中，有一座山，名叫布庫里，在布庫里山下，有一個不大的圓形水池，池水清澈見底，景色幽美。這就是天女浴躬池，有一段古老的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庭中有三個天女。大姐叫恩庫倫，二姐叫正庫倫，三妹叫佛庫倫。大姐、二姐都有些膽小怕事，不肯幫助別人。總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佛庫倫卻心腸很熱，頗有膽識，只是脾氣有點倔，又很好奇。姐仨當中數佛庫倫長得漂亮，還有一手好箭法，弓箭總是不離身。天狼星看中了佛

<sup>27</sup> 張鳳台編撰；黃甲元，李若遷校注，《長白匯征錄》，（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頁70-71。

庫倫，曾托媒求婚。佛庫倫討厭仗勢欺人的天狼星，拒絕了這門親事。天狼星惱恨在心。企圖帶兵行搶，又懼怕她那神箭，只得待機而動…。<sup>28</sup>

圓池除了位於長白山中，與康熙的主張「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相同外，圓池的範圍甚至比天池小得更多，周長只有五百多公尺，約合一華里，與《舊滿洲檔》上所說「布勒瑚里湖方圓百里」，<sup>29</sup>差別太大，還稱為布勒瑚里湖，真是略覺誇張。

### 3、江東六十四屯說

日本學者松村潤和中國學者李鴻彬等先生，都持此說。<sup>30</sup>

以上是董萬侖先生所整理出來，談布勒瑚里湖何在的第三種說法，十分簡短。根據李鴻彬《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立》上所記載的，布勒瑚里湖位於江東六十四屯，其立論如下：

綜觀上述史籍的記載和史圖的標注，十分清楚說明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的布庫里山，就是黑龍江右岸的薄寇里山（即博庫里山），滿族先祖布庫里英雄，這個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正是依據布庫里山取名的。布兒湖里湖就是黑龍江左岸，同布庫里山隔江相望的博兒豁里鄂謨（即薄和力池、博勒和涅鄂謨、博爾和里鄂謨、博勒霍若池），鰲莫惠就是布兒湖里湖北面的瓊琿，此處也是《舊檔》中所說的納爾渾。但是《武錄》中的鰲朵里城，在《舊檔》裡沒有提到，不過我認為鰲朵里城有可能就是瓊琿東南的博寇里城，又稱鄂爾多城。由上可見，滿族先祖活動的地區，並非在長白山以東，實是在黑龍江省愛輝縣和對岸江東六十四屯境內。所以說黑龍江是滿族的故鄉，這是完

<sup>28</sup> 紀祥春講述，李果鈞、劉忠義整理，〈天女浴躬池〉，《百花點將台：地方風物傳說》，（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吉林分會編，1982），頁5。

<sup>29</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58[1969]），冊九，頁4241-4243。天聰九年（1635）五月初六。滿文原文為：tere bolkori omode šurdeme tanggū ba,該布勒瑚里湖周約百里。

<sup>30</sup> 董萬侖，〈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2年第01期），頁63。

全符合歷史事實的，馬克思關於黑龍江流域是清代“中國統治民族的故鄉”，這一科學論斷是千真萬確的。<sup>31</sup>

學者李鴻彬的立論，並無標新立異之處。他只是將《舊滿洲檔》與《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對照比較，就找出許多端倪。第一，《舊檔》和《武錄》有許多相同之處，如三仙女在布勒和里湖(一稱布兒湖里湖)沐浴吞果生滿族始祖布庫里雍順(一稱布庫里英雄)又如始祖布庫里雍順開始生活在布庫里山下的布勒和里湖一帶，後來由此遷往納爾渾(一稱鰲莫惠)，等等。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兩者有密切聯繫，實際上是說同一件事。第二，《舊檔》和《武錄》有明顯不同之處，最重要的是滿族始祖布庫里雍順生長居住的地方，《舊檔》說是黑龍江(即薩哈連烏喇)流域的納爾渾，《武錄》說是長白山以東鰲莫惠的鰲朵里城。但是《舊檔》所載穆庫什克講述的三仙女傳說，早就在黑龍江一帶「世代相傳」。顯然比《武錄》成書的時間要早得多。因此，李鴻彬認為《武錄》的「長白山說」，很可能來源於《舊檔》的「黑龍江說」。所以，應把尋覓滿族祖籍的視線由長白山轉移到黑龍江。<sup>32</sup>

納爾渾是否可與鰲莫惠畫上等號，李鴻彬並未說明，因此存疑。但是從各種史籍的記載和史圖的標注上比對，「江東六十四屯說」立論相當堅實，倒是十分可信。

而李鴻彬所寫《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立》，出版於 2003 年，並非最早提出此說的。日本學者松村潤所編《清太祖實錄の研究》一書，是 2001 年出版的，時間較早，書中同樣提出了「江東六十四屯說」。根據松村潤的考證，在黑龍江城附近，當地一直有著布庫哩山與布勒瑚里湖等地名。<sup>33</sup>因為《欽定盛京通志》卷二十八黑龍江城項下，清楚記載著「博爾和哩泊，城東北六十里。」<sup>34</sup>附和認同這種看法的，包含日人吉田金一

<sup>31</sup> 李鴻彬著，《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立》，（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 1 版），頁 9。

<sup>32</sup> 李鴻彬著，《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立》，（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 1 版），頁 8。

<sup>33</sup> 松村潤[編]，《清太祖實錄の研究》，（東京都：東北アジア文獻研究會，2001 年），頁 24。

<sup>34</sup>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 一三〇卷》，（臺北市：臺灣商務，



江城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爲了邊疆防務需要，遷到了黑龍江右岸。<sup>37</sup>

再細查松村潤的著作，在 1988 年有一篇〈談清朝開國的傳說〉的英文論文，<sup>38</sup>發表於《亞洲學報》上，可知松村潤對此研究的時間更早。松村潤所提論述，與李鴻彬的論點，二者大同小異，在此不贅。

#### 4、布兒湖里泊漢意「鏡子湖」——鏡泊湖說

「鏡子湖說」是董萬侖先生所整理出來，談布勒瑚里湖何在的第四種說法。這個說法，是將布兒湖里泊的滿文 *bulhuri*，解釋爲「水清澈」之意，而認定布兒湖里泊即是今之鏡泊湖。這與第五種說法，將布兒湖里泊的滿文「*bulhuri* 布勒瑚里」，解釋成「水冒出湖」，同樣歸之於鏡泊湖，結論如出一轍：

張璿如先生在 1981 年《黑龍江文物叢刊》創刊號上發表  
《從傳說看清朝先世的族源》，提出布兒湖里泊滿文 *bulhuri*，  
是“水清澈”之意，從而認定布兒湖里泊即是今之鏡泊湖。<sup>39</sup>

#### 5、布兒湖里泊漢意「水冒出湖」——鏡泊湖新說

這是董萬崙於 80 年代初，解讀了布兒湖里泊滿文 *bulhuri omo*，提出漢意爲“水冒出湖”，從而認定布兒湖里泊即是今之鏡泊湖。<sup>40</sup>

以上這第四、第五種說法，理論相似，可以合併探討。就滿文「*bulhuri* 布勒瑚里」的解釋方面來說，意思還算接近，不必過於挑剔。只是在換算方法上，董萬崙將鏡泊湖的周長 120 公里，硬說成與布勒瑚里泊的「周圍百里」一樣，就難令人苟同了：

<sup>37</sup> 吳雪娟，〈黑龍江將軍駐地遷移新談〉，《北方文物》，（哈爾濱市：[北方文物編輯部]，2006 年第 03 期）

<sup>38</sup> Matsumura Jun. "On the Founding Leg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Acta Asiatica* 53 (1988), pp1-23.

<sup>39</sup> 董萬侖，〈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2 年第 01 期），頁 63。

<sup>40</sup> 董萬侖，〈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2 年第 01 期），頁 63。

切合布兒湖里泊廣度與距黑龍江里程的“水冒出湖”，非鏡泊湖莫屬該檔記，降人穆克什克說布兒湖里泊“周圍百里”。黑龍江北岸沒有這等廣度的湖泊，可是恰恰卻與鏡泊湖的廣度接近。鏡泊湖的廣度，據黑龍江省測繪局提供的數據：南北長約 45 公里，東西寬約 2 公里至 3 公里，沿湖邊繞一圈約有 120 公里。這說明，布兒湖里泊正是今之鏡泊湖。該檔記，穆克什克說布兒湖里泊“距黑龍江(helunggiyang)一百二三十里”。江東六十四屯在今琿琿城對岸舊琿琿城微北處，距黑龍江沒有如此之遙。可是卻與鏡泊湖距松花江里程接近。我們展開地圖測量一下鏡泊湖距松花江里程：鏡泊湖距松花江上游二道江最近處約 80 公里，距今松花湖亦不過 110 公里，其與穆克什克講述的里程大致接近。幾百年前，在這個里程範圍內“周圍百里”的湖泊，除鏡泊湖之外，還會是別的湖泊嗎？<sup>41</sup>

因為現在一般都說：一華里約等於五百公尺，二華里約等於一公里。鏡泊湖既然由黑龍江省測繪局提供的可信數據是周長 120 公里，那就是約等於 240 里，與史書上所說布勒瑚里泊的「周圍百里」，差異極大。董又聲稱現在「黑龍江北岸沒有這等廣度的湖泊」，那是沒有拿清朝古地圖出來看的結果。因此，把鏡泊湖當成布勒瑚里湖，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 叁、滿文分析

1969 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將其珍藏的《舊滿洲檔》滿文原檔影印公佈於世。這部檔案的公佈，對於解決清史研究中長期得不到解決的許多問題，很有幫助。而《舊滿洲檔》第九冊(天崇九年)，記述了清始祖傳說——三仙女沐浴布兒湖里泊的神話故事，正是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

現引用《舊滿洲檔》天聰九年(1635)五月初六的滿文紀錄資料，將其轉為羅馬拼音如下：

ice ninggun de, sahaliyan ulai ergi hūrga gurun de cooha

<sup>41</sup> 董萬命，〈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2 年第 01 期），頁 66。

genehe ambasa ceni dahabufi gajiha ambasa, sain niyalma be kan de acabure doroi, (emu) tanggū (jakūn) honin, juwan (juwe) ihan wafi sarin sarilara de kan amba yamun de tucifi uyun muduri noho aisin i isede tehe manggi, cooha genehe ambasa niyakūrame hengkileme acara de, kan ambasa coohalame suilaha ujulaha juwe amban bakiran, samsika be tebeliyeme acaki seme hendufi kan i hesei bakiran, samsika jergici tucifi kan de niyakūrame hengkileme tebeliyeme acara de kan inu ishūn tebeliyehe, acame wajiha manggi, amba beile de kan i songkoi acaha, terei sirame hošoi degelei beile, ajige taiji, hošoi erhe cohūr beile de tebeliyeme acaha, cooha genehe ambasa gemu hengkileme acame wajiha manggi, dahabufi gajiha juwe minggan niyalma niyakūrame hengkileme acaha, terei sirame sekei alban benjime hengkileme jihe solon gurun i baldaci sei jergi ambasa acaha, acame wajiha manggi, ice dahabufi gajiha coohai niyalma be gemu gabtabufi, amba sarin sarilara de kan bakiran, samsika juwe amban be hūlafi kan i galai aisin i hūntahan i arki omibuha, terei sirame emu gūsa de emte ejen arafi unggihe ambasa de omibuha, terei sirame fejergi geren ambasa, dahabufi gajiha ujulaha ambasa de omibuha sarin wajiha manggi, kan gung de dosika, tere mudan i cooha de dahabufi gajiha muksike gebungge niyalma alame, mini mafa ama jalan halame bukūri alin i dade bulhori omode banjiha, meni bade bithe dangse akū, julgei banjiha be ulan ulan i gisureme jihengge, tere bulhori omode abkai ilan sargan jui enggūlen, jenggūlen, fekūlen ebišeme jifi,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 be fiyanggū sargan jui fekūlen bahafi anggade ašufi bilgade dosifi beye de ofi bokori yongšon be banjiha, terei hūncihin manju gurun inu, tere bolkori omode šurdeme tanggū ba, helung giyang ci emu tanggū orin gūsin ba bi, minde juwe jui banjiha manggi, tere bulhori omoci gūrime genefi sahaliyan ulai narhūn gebungge bade tehe bihe seme alaha, tere dain de yabuha



gung be tuwame ilgafi ambasa be wesimbuhengge bakiran sahaliyan  
 ula de cooha genefi ulai golo be gemu gaiha, baha niyalma be yooni  
 boigon arafi gajiha, cooha gaifi yabuha sain seme ilaci jergi meiren i  
 janggin be uju jergi meiren i janggin obufi ni gidaha, jai juwe jergi  
 nonggifi juwan juwe jergi sirambi ,<sup>42</sup>

譯文：初六日，爲率兵往征黑龍江一帶虎爾哈部之大臣，及其攜降來族長及良民之謁汗禮，備宴殺羊一百零八頭、牛十二頭。時汗出大衙門，御九龍金椅，率兵出征之諸大臣跪謁。汗曰：「諸大臣軍行勞頓，主將二大臣霸奇蘭、薩穆什喀著行抱見禮。」霸奇蘭、薩穆什喀奉汗諭出班跪叩抱見，汗亦迎抱。謁畢，汗以同禮見大貝勒。繼之，與和碩德格類貝勒、阿濟格台吉、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行抱見禮。出征之諸大臣皆叩見。禮畢，降來之二千人跪叩謁。繼之，貢貂前來之索倫部巴爾達齊等族長叩謁。謁畢，悉令新降來之兵丁校射，射畢，大宴。汗召霸奇蘭、薩穆什喀，以御手金杯賜飲。繼之，至各旗，由派爲旗主大臣一旗一金杯賜飲。繼之，由下級諸將及降來爲首族長接金杯賜飲。宴畢，汗還宮。此次與會士兵由降來名爲穆克希克者稟告：「吾父祖世居布庫哩山麓之布勒瑚里湖，該處無文書檔冊，古來相傳，布勒瑚里湖有三仙女恩古倫、正古倫、佛庫倫來浴，季女佛庫倫得一神鵲啣來朱果，含之入喉，遂有身孕，生布庫哩雍順。其親族即滿洲部也。該布勒瑚里湖周圍百里，距黑龍江屯一百二三十里，我有二子後，即自布勒瑚里湖遷黑龍江畔那爾渾處居住矣。」此次戰功視大小分別晉升諸將：霸奇蘭出師黑龍江，盡取烏拉路，所獲人口悉予編戶帶來。指揮卓著，自三等梅勒章京擢爲頭等梅勒章京登錄在案，加襲二次，准襲十二次。

這段滿文，許多學者專家都曾加以引用並翻譯，不過誤會也由此而生。最有爭議的地方，往往是大家習以爲常的名詞「helung giyang」。這個名詞，以前大多解釋爲「helung giyang 黑龍江」，認爲它只是另一個名詞「sahaliyan ula 黑龍江」的異寫。

「helung giyang」一詞的滿文，念起來當然與漢文「黑龍江」相同，

<sup>42</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九，頁 4241-4243。天聰九年（1635）五月初六。

但是，能否翻譯成漢文「黑龍江」，則應該由「語境」來決定。

語境就是一般人常說的「上下文」。一個語詞，能解釋的含意極多，但是再多的含意，卻會在上下文的約束下，歸於單一。

語境概念最早由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提出，分為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sup>43</sup>語境是一種客觀存在，具有現實性的特點，因此也可以進一步區分成現實語境和非現實語境：

具有現實性特點的語境可以稱為現實語境。現場語境是最典型的現實語境；伴隨語境人們在交際中也能感受得到它的存在，也屬現實語境；上下文語境直接訴諸語言，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現實語境；而社會文化語境多是以客觀存在作為基礎的，也具有現實性的特點，也是現實語境。與現實語境相對的是非現實的語境，或稱為虛擬的語境，它是不在眼前的想象的語境。<sup>44</sup>

有了語境的介入，除了能使多義的語言符號，趨向單義。然而另外也有可能使得語言節外生枝，增生出言外之意的語境意義。因此，語境十分重要，忽視不得。探索了解上下文脈，並掌握語境，就可避免斷章取義的缺失，也能從旁人漏失的重點裡，找出微言大義。例如，以下幾個包含「淡水」的句子，都有不同的含意：

句 1 據許家的兩個下女說：她們一個叫王月嬌十八歲，一個叫王美昭十七歲，都是淡水人，在許家做下女，已有半年。<sup>45</sup>

句 2 黃教授以魯迅名篇〈藤野先生〉與陶晶孫的日文創作〈淡水河心中〉兩個文本，討論語言翻譯、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過

<sup>43</sup> 白解紅，〈語境與語用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市：湖南師範大學期刊社，2000年03期），頁88。

<sup>44</sup> 王建華，周明強，盛愛萍著，《現代漢語語境研究》，（杭州市：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第1版），頁374。

<sup>45</sup> 蔡登山，《魯迅愛過的人》，（台北市：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07年，初版），頁111。

程的糾結。<sup>46</sup>

句3 今日淡水溝渠中動物希特拉 (Hydra)，亦如是也。<sup>47</sup>

以上三個句子都與魯迅有關，這是因為魯迅是知名作家，例句好找。句1的「淡水」，是淡水鎮的意思。因為句中說王月嬌、王美昭都是淡水人，人是屬地的，所以「淡水」在這裡是一個地名。句2的「淡水」，很明顯跟河有關，〈淡水河心中〉提到了河，是指穿越台北區域中心的一條河。句3的「淡水」，是指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中的「淡水」，因為提到了溝渠、動物，是對含鹽成份很低的水的通稱。

因此，「淡水」一詞不能只照著字面上的某一含意，執意解釋。說這麼複雜，其實只是為了說明，滿文名詞「helung giyang」，看起來是江，其實是一個地名。何以知道這是一個地名，當然是與「上下文」語境有關。

先來看一看一些把「helung giyang」當作江的說法。董萬崙將滿文「helung giyang」翻譯成「黑水」，其說法如下：

《舊滿洲檔》記載的穆克什克徙居地 Sahaliyanula(薩哈連烏拉)，從天聰八年十二月太宗皇太極命霸奇蘭督師征討的地方分析，是今黑龍江中游(這是學術界公認的)，而同書記載的距穆克什克原居地布兒湖裏泊一百二三十里的 helung giyang(黑龍江)，則是另一水流——曾經稱作黑水、黑龍江但並不是今天黑龍江的水流。黑龍江，歷代所指水域不同。唐代多指今黑龍江下游，如《新唐書·黑水靺鞨傳》的黑水軍，遼金多指松花江與黑龍江下游，如《大金國志》記，“長白山，黑水發源於此”，至清代仍有沿遼金者，如與《舊滿洲檔》同年成書的《滿洲實錄》注記，“黑龍江……，此源從長白山發出。”這就更加明確，《舊滿洲檔》記載的距穆克什克原居地布兒湖里泊一百二三十里的 helung giyang(黑龍江)，指的是與之同年成書

<sup>46</sup> 黃英哲，《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6年，初版），序，頁vii。

<sup>47</sup> 魯迅，〈人之歷史〉，《魯迅自編文集 5：墳》，（北京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版），頁5。

的《滿洲實錄》所記“此源從長白山發出”的松花江。<sup>48</sup>

董萬崙認為古代的「黑水」，就是現代的「松花江」，把「helung giyang」當作松花江，還牽扯出《滿洲實錄》的說法「黑龍江…，此源從長白山發出。」才會讓「布勒瑚里湖 bolkori」從黑龍江搬到松花江。

董萬崙又說「我們展開地圖測量一下鏡泊湖距松花江里程：鏡泊湖距松花江上游二道江最近處約 80 公里，距今松花湖亦不過 110 公里，其與穆克什克講述的里程大致接近。」<sup>49</sup>前面說過：一華里約等於五百公尺，二華里約等於一公里。鏡泊湖距今松花湖約 110 公里，就是約等於 220 里，與史書上所說布勒瑚里泊的「距離一百二、三十里」，又差了約一倍。董卻聲稱「大致接近」，可說有些牽強。

更重要的一點，「上下文」裡提到「自布勒瑚里湖遷黑龍江畔那爾渾處居住」、「霸奇蘭出師黑龍江」等好幾個地方，所用的都是「sahaliyan ula 黑龍江」。惟獨此處不用「sahaliyan ula 黑龍江」而採用「helung giyang」，可見這裡不能再以江視之，明顯的是一處特殊的地方，而不是江。

「helung giyang」在哪哩，一時之間並無頭緒。還好天聰九年（1635）五月十三日的一封書信，打破了這種含混。原來是金國汗皇太極，致書朝鮮國王。主旨裡的「黑龍江」，卻記為「helung giyang」，說明了滿文「helung giyang」就是「黑龍江」地方。原來是金國汗皇太極，致書朝鮮國王。主旨是講天聰八年（1634）年七月，由大明返回朝鮮的朝鮮使臣，隨船隻漂流到金國岸上了。金國因兵馬倥傯，無暇即時送還來人等情由，其中的「黑龍江」，正是記為「helung giyang」，這一封信在此展示如下：

juwe gurun ahūn deo araha dahame wang ni niyalma be uthai  
hūdun beneki seci ere aniya emu jergi dergi amargi hošoi helung  
giyang ni ergi de cooha unggifi tumen funcere niyalma be dahabufi  
gajiha, jai emu jergi dergi mederi ergi de cooha unggihebi, jai geli

<sup>48</sup> 董萬崙，〈論滿族三仙女神話的形成與價值〉，《民族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 3 期），頁 35。

<sup>49</sup> 董萬崙，〈清始祖發祥地傳說研究的反思〉，《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2 年第 01 期），頁 66。

emu jergi daiming ni sansi bade cooha unggihebi, jai geli daiming ni  
ning iowan i bade cooha unggihe, uttu babade cooha unggifi wang ni  
niyalma be šuwe beneki seci jabduhūn akū, tuttu ofi bithe unggime  
mejige isibuha. <sup>50</sup>

譯文：兩國既結為兄弟之盟，王之人本擬儘速送回，然今年往東北方黑龍江出師一次，招服萬餘人，又往東海出師一次，復向大明國山西地方出師一次，後又向大明國寧遠地方出師，如此各處用兵，故無暇將國王之人直接送還，謹致書報告消息。

在這封信裡，所提到的地點，發音「helung giyang」的，無疑是指「黑龍江」，因為當年皇太極出兵「招服萬餘人」的地點，十分明確是指「黑龍江」，而與「松花江」無涉。因此前面董萬崙所做的推論：「helung giyang」是指「松花江」，「布勒瑚里湖 bulhūri」是「鏡泊湖」的說法，當然是無法成立的了。連帶使〈三仙女〉傳說的起點，又從長白山一帶遷回了黑龍江。

朝鮮國王當然接著回信。然後，皇太極又在六月十六日，覆信朝鮮國王，再度提到了「helung giyang」，現摘錄部份書信內容如下：

aisin gurun i kan i bithe, cohiyan gurun i wang de unggihe,  
wang ni unggihe bithe be bi gemu wacihiyame tuwaha juwe gurun  
ahūn deo arame hajilaha dahame urgun i medege be ishunde  
donjikini seme neneme unggihe bithe de helung giyang de cooha  
unggifi tumen funcere niyalma be dahabufi gajiha be wang de  
donjibuha bihe, dergi mederi de genehe cooha, monggo de genehe  
cooha, daiming ni ning yuwan, ginjui bade genehe coohai mejige  
isinjire unde ofi yargiyan medege be unggihēkū bihe, te gemu  
isinjiha. <sup>51</sup>

譯文：金國汗致書朝鮮國王。王所送之書，吾已悉閱。兩國既結金

<sup>50</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九，頁 4258-4259。

<sup>51</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九，頁 4323。

蘭，凡有喜訊，自宜相告。前已致書告知，吾出兵黑龍江，招降萬餘人。至於遣兵東海、赴蒙古、赴大明之寧遠、錦州等處，因無信息，是以未獲明告，今已悉至。

「黑龍江 *helung giyang*」的漢音的名詞，一再出現，皇太極還說「招降萬餘人」，想讓朝鮮國王，分享喜悅。由此可見，虎爾哈人穆克希克說故事的功力深厚，不只讓皇太極接受了〈三仙女〉是滿族起源的說法，也順便讓漢音的「黑龍江 *helung giyang*」的名號，經由國書，揚威異邦。但是從漢音「黑龍江」的一再出現，仍然只是表示那是一個地方，並不能確定地點何在。

然而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的檔案中，又出現了一次漢音「*helung giyang*」，卻是讓大家忽然了解，原來「*helung giyang*」所指，是「*helung giyang* 黑龍江將軍府」：

在康熙年間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中，“黑龍江”一詞的滿文書寫形式基本上都是 *sahaliyan ula*，僅在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檔案中出現過一次 *helung giyang*。其原文為：「*taicangsy yamun i bithe, he lung giyang n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 Unde unggihe*·太常寺咨鎮守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在其前後的其他公文檔案中，“黑龍江”的滿文書寫形式都是 *sahaliyan ula*。由於 *he lung giyang* 一詞出現在“鎮守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這個機構名稱之內，它完全可以用 *sahaliyan ula* 進行替換，所以不會產生歧義。<sup>52</sup>

學者吳雪娟是研究過這件檔案的專家，她認為由於漢音「*he lung giyang*」一詞出現在「鎮守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這個機構名稱之內，「它完全可以用 *sahaliyan ula* 進行替換，所以不會產生歧義。」話雖不錯，不過卻沒有看出，漢譯的「黑龍江 *helung giyang*」在此有可能代表著另一層含義，也就是「黑龍江 *helung giyang*」可以代表著早期村屯、一座城池、將軍衙門等，卻與江、河無關，這正是學者專家過去百思不解的盲點。在康熙時代以前，漢音「*he lung giyang*」一詞代表著將軍府或「黑龍

<sup>52</sup> 吳雪娟，《滿文翻譯研究》，（北京市：民族，2006，第1版），頁202。

江城 he lung giyang」，也就是「瑗瑁」。前面說過，「瑗瑁」或黑龍江城是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爲了邊疆防務需要，遷到黑龍江右岸，而「舊瑗瑁」一直留在左岸，可視爲早期「黑龍江屯 he lung giyang」的位置，《黑龍江輿地圖》上有著清楚的標示。因此這份檔案的出現，可說意義重大。

提起清朝屠寄所撰寫的《黑龍江輿地圖》，就必須說明何以其具有權威性。屠寄在地圖上標示當時通用的經緯線或稱作「計里畫方」，<sup>53</sup>每方十里，很容易估算距離、面積。製作的規格以及過程，都記載在《黑龍江輿地圖》序文之中，現在列出如下：

圖凡六十一幅，每方十里，經始于丁酉六月，告成於己亥三月，用經費白金三萬二千餘兩，其測繪考訂之艱難，詳兩三將軍原奏中。會典館原頒格式太小，山川地名不能一一詳載，則闕略可惜。此據第三次底稿詳校，付之石印，縮小十分之七，黑龍江極邊衝要，咸豐八年重訂界約後，與俄羅斯畫江而守，今昔疆理不同。自開設呼蘭同知、綏化通判，升呼倫貝爾、布特哈兩總管，呼蘭城守尉並為副都統，則建置亦異舊圖，漏逸訛舛，不足據依。即洪侍郎鈞所譯界圖，亦詳于江左，而略于江右。是圖凡車馬可通之地，則步步詳測。雖車馬難通，而人跡猶可至者，莫不窮幽鑿險，而探繪之。其初次分測底本圖，水，則別大小，而分雙車之線。山，則依平視，而具夷險之形。色別標識，一仿泰西之法。因時日促迫，館中疊次諮催，不得已改從今例。且科爾芬河、呼瑪爾河、遜河以及嫩江之上源多窩集，哈湯人跡罕至，則於相距較近之地，訊訪獵戶，參酌舊圖繪入。此外復取漠河觀音山諸金礦及通肯勘荒繩丈之圖，補所未備。而黑龍江之地形，可據者什八九矣。其送館之圖，依第二次稿本，縮繪其中小水三、五支，微有差誤，未及追改，圖說亦較略，他日擬據是本，[木巽]為黑龍江水道記，須成書一併付之石印。其經緯線具館圖，而通肯副都統

<sup>53</sup> 孫喆，〈從兩幅地圖看 18 世紀初期清人對黑龍江流域的認識〉，《中國地方誌》，（北京市：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2006 年第 6 期），頁 56。

之設，在圖成之後，且分界亦未定。鐵路勘成未造，故並不著焉。測繪四人曰：崔祥奎、單世俊、張士元、劉鴻恩。光緒二十有五年十月，賜進士出身工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屠寄謹誌。<sup>54</sup>

由於《黑龍江輿地圖》的製作背景是與咸豐八年重訂界約，與俄羅斯畫江而守有關，因此繪製原則是「凡車馬可通之地，則步步詳測」，可見其小心。由於博爾和里鄂模即「布勒瑚里湖 bulhori」的位置在江東六十四屯，並非「人跡罕至」之處，因此「黑龍江之地形，可據者什八九矣。」可見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該區域裡還實際存在著一座大湖，即使距離〈三仙女〉傳說當初最早提起這座湖名的天聰九年（1635），已經又過了 264 年了。從下圖 2 可以看到光緒朝時布勒瑚里湖的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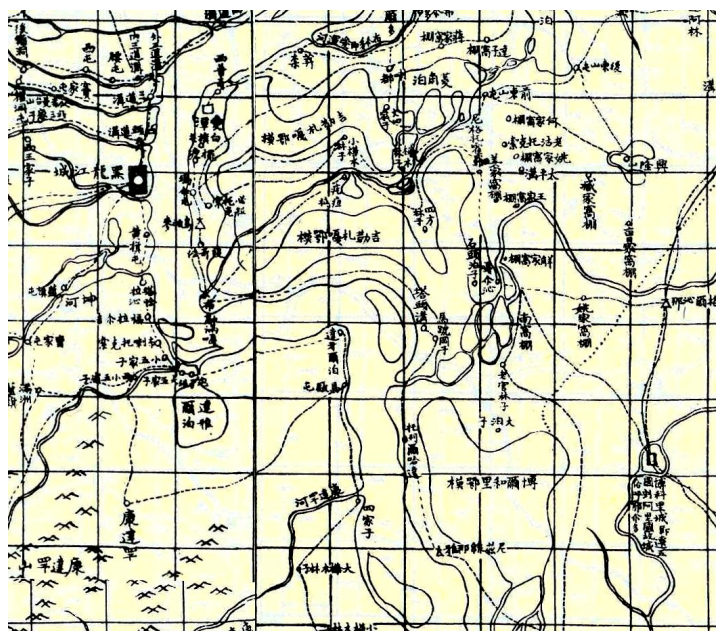


圖 2 《黑龍江輿地圖》的博爾和里鄂模位置圖<sup>55</sup>

從上圖《黑龍江輿地圖》第 32 頁上可以看到，有座名為「博爾和里鄂模」的湖泊，位於黑龍江畔，江東六十四屯的南方，上下跨度 30 里，

<sup>54</sup> 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第 2 冊附冊：《黑龍江輿地圖》（61 面；26x35 公分），封面內。

<sup>55</sup> 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第 2 冊附冊：《黑龍江輿地圖》（61 面；26x35 公分），頁 32。



左右跨度 20 里，呈現不規則圓形，上寬下窄。以圓形徑一週三估算，這座布勒瑚里湖面積不小，且外沿不規則，確實達到周約百里的規模。因此前面董萬崙所說的「黑龍江北岸」，沒有這樣的湖泊，其實並不正確。

圖 2 以計里畫方為基本座標，可作為尋找地名的指示。從右邊、上邊算起，右七上二的位置，有一個空心的小方塊，寫著「璦琿」二字，也就是「舊璦琿」。從前述計里畫方、每方十里估計，從舊璦琿到右三上七的布勒瑚里湖，距離約七十五里，與《舊滿洲檔》上所說布勒瑚里泊的「距離一百二、三十里」，相差了一些里數。這牽涉到計里畫方有一個不準確的基本問題，就是計里畫方由於忽略地球表面曲率，離測繪中心越遠則製圖誤差越大，但在繪製小範圍地圖時誤差可以忽略不計，具有一定的準確度。屠寄在繪製《黑龍江輿地圖》時也提到想採用「泰西之法」、「經緯線」等，但因「時日促迫」，而無法採行。

不過在現代的地圖上，可以很輕易的量出，從舊璦琿到（原）布勒瑚里湖的直線距離，約五十餘公里，如果換算為一般道路，與需要越過檔道的吉勒札嘎鄂模，距離正好是一百二、三十里，可見《舊滿洲檔》上，穆克希克所言不虛。

另從圖 2 可以看到在布勒瑚里湖對岸，有大、小樺木林子屯的紀錄，與圖 3 相同。雖然由於地理滄海桑田的變遷，布勒瑚里湖原處已不見湖泊蹤跡，只剩下大片沼澤地，依稀可見一些痕跡，歸屬俄國管轄。故標上「（原）布勒瑚里湖」注記字樣，以供參考。可是這兩座村屯，到 2003 年時都還在原位，名稱也沒改變，足以見證這段歷史：



圖 3 黑龍江省孫吳縣大、小樺木林子屯位置圖<sup>56</sup>

又《舊滿洲檔》上所載，有寫作「布勒瑚里湖 *bolkori*」的地方，與《黑龍江輿地圖》第 32 頁上的「博爾和里鄂模」，十分接近。滿文「鄂模 *omo*」意為「湖 *omo*」，「博爾和里 *bolkori*」，則可分解為「博爾和 *bolko*」與「里 *ri*」兩個部分，「博爾和 *bolko*」通「博爾和 *bolgo*」，就是「清潔 *bolgo*」的意思。例如《欽定盛京通志》卷二十七「博勒和山」項下記載「博勒和山，國語博勒和，潔淨也」。<sup>57</sup>「博爾和 *bolko*」、「博勒和」、「清潔 *bolgo*」、「潔淨」，意思相通。「里 *ri*」是名詞常見的字尾，有「小 *ri*」的意思。<sup>58</sup>因此「布勒瑚里湖 *bolkori*」，本義是「有些清潔的湖 *bolkori*」。意思上和前面張璿如先生所提出的滿文 *bulhuri*，是「水清澈」十分相似，卻與董萬崙所解的「火山瀑布湖泊 *bulhuri*」，不盡一致。

<sup>56</sup> 黑龍江省地圖集編輯委員會編，《黑龍江省地圖集 [地圖]》，（哈爾濱市：哈爾濱地圖出版社，2003，第 1 版），頁 383。

<sup>57</sup>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 一三〇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2[1983]，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01-503），卷二十七，頁 10。

<sup>58</sup> 季永海、劉景憲、屈六生編著，《滿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民 75]，第一版），頁 106。例子：瓜 *hengge*、𪔐 *henggeri*（小瓜）。

當年虎爾哈人穆克希克為何要在短短 95 字的論述中，用漢文、滿文兩種語音稱呼黑龍江？許多滿文專家不曾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就把「helung giyang」、「sahaliyan ula」一起都翻譯成了「黑龍江」。日本學者似乎覺得這麼翻譯有些不妥，例如松村潤在《清太祖實錄之研究》一書中就分別譯成了「黑龍江」、「sahaliyan ula」：

那 Bulhūri 湖周圍百里，自黑龍江有一百二、三十里，我生  
下二子後，就由那 Bulhūri 湖邊往名為 Sahaliyan Ula 的 Narhūn  
地方居住了。<sup>59</sup>

其實這麼翻譯都沒有解決「helung giyang」是什麼的問題，還是會讓董萬崙等只看漢譯本的學者發生嚴重的誤會。

如果要認清「helung giyang」是什麼，還得回到原文語境。虎爾哈人穆克希克說過：「該布勒瑚里湖周約百里，距『helung giyang 黑龍江』一百二三十里」。這句話是在介紹布勒瑚里湖，描述這座湖的大小與位置。只要拿起清代的地圖，無論《清乾隆內府輿圖》、《黑龍江輿地圖》等皆可發現，布勒瑚里湖本身就是貼著「黑龍江 sahaliyan ula」河岸所產生的湖泊，距離江水主流僅約一里，地下水脈根本相通，不可能是「距黑龍江一百二三十里」。因此對於「黑龍江 helung giyang」一詞的解讀，除了「黑龍江 sahaliyan ula」這條大河之外，還有，就只剩下「黑龍江 helung giyang」是一個地名的想法，才較為符合實際。也就是說，在穆克希克的文本之中，表示河的，他用「sahaliyan ula」，意為黑龍江。表示地的，他用「helung giyang」，意為一個發音為黑龍江的地名。

只是當時這個地名「黑龍江 helung giyang」，編制上該稱呼為「城、鎮、村、里」的哪一種？史上並無記載。僅就皇太極時代的史料來看，當時稱呼黑龍江一帶的地名，都是按照女真習慣稱為「屯寨」的。而各屯寨的頭目，都稱之為「屯長」。例如在霸奇蘭的出征虎爾哈之前，皇太極相當重視這次行動，還召來了從虎爾哈來歸的屯長喀拜、郭爾敦等進宮賜食，要求他們帶路，文中就提及「屯寨」、「屯長」等名稱：

<sup>59</sup> 松村潤[編]，《清太祖實錄の研究》，（東京都:東北アジア文獻研究會,2001 年），頁 24。

是日，召屯長喀拜、郭爾敦等及其從人進宮，賜食。既出，命沙爾虎達、穆成格，傳諭喀拜等曰：爾地方僻陋鄙野，不知年歲，何如率眾，來居我國，共霑聲教。朕久欲遣人往諭爾部，但國務殷繁，未得暇耳。人君各統其屬，理也。爾等本我國所屬，載在往籍，惜爾等未之知耳。今爾諸人率先歸附。若不遣爾還，留居於此，亦惟朕意。朕知爾等賢，故遣歸。此行可引我軍前往，凡各屯寨，其善指示之。喀拜對曰：誠如上諭。遂受命而去。<sup>60</sup>

於是地名「helung giyang」，既可以翻譯為「黑龍江屯寨 helung giyang」，也可說成「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由於這個位置就在史上有名的「江東六十四屯」地界之內，所以翻譯為「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應當是毫無疑問的。

把「黑龍江 helung giyang」加上一字，改為「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其實也是符合漢語翻譯慣例的。例如越南的胡志明市（Ho Chi Minh），舊稱西貢。「Ho Chi Minh」可稱為「胡志明」或「胡志明市」等兩種叫法。「胡志明」無疑就像「helung giyang」翻譯為「黑龍江」一樣，中規中矩直譯，不多也不少。只是「胡志明」有可能誤會為人名，不如加了一個「市」字的「胡志明市」，屬性明確。因此把「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看成「胡志明市（Ho Chi Minh）」之類的譯名，就不會有任何奇怪的感覺了。

「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在天聰九年（1635）時，還是一個索倫人居住的屯寨，不在虎爾哈的轄區之內（見圖 1），因此虎爾哈人才會以「外來語」稱呼此處。這也是「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何以在滿文檔案中，不常出現的主要原因。索倫人稱這裡為瓊琿，有清一代，從未改變。後來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舊瓊琿城西岸，建築了瓊琿新城，<sup>61</sup>清廷不稱為瓊琿新城，卻命名稱之為「黑龍江城 sahaliyan ulai hoton」，或可

<sup>60</sup> 華文書局，《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二十一，頁 16。時為天聰八年十二月十日壬辰。

<sup>61</sup> 吳雪娟，〈黑龍江將軍駐地遷移新談〉，《北方文物》，（哈爾濱市：[北方文物編輯部]，2006 年第 03 期），頁 87。

看作「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從天聰九年（1635）所流傳下來的文化迴響。

綜上所述，「黑龍江 helung giyang」一詞，在《舊滿洲檔》天聰九年（1635）〈三仙女〉故事中，當以翻譯為「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較宜，因其需指出布勒瑚里湖的明確位置。至於其他的「黑龍江 helung giyang」，因屬於大範圍指涉，為江、為屯並無差異，故仍可譯成「黑龍江 helung giyang」。這麼一來，類似黑龍江等於松花江的誤會，就能徹底避免了。

其實類似董萬崙把「helung giyang」當作古代的「黑水」，引申到現代的「松花江」的錯誤，還有一些外文參考案例，可以作為借鏡：

滿文：tere bolkori omode šurdeme tanggū ba, helung giyang ci emu tanggū orin gūsin ba bi, minde juwe jui banjiha manggi, tere bulhori omoci gūrime genefi sahaliyan ulai narhūn gebungge bade tehe bihe seme alaha,<sup>62</sup>

英譯：Lake Bulhori measures a hundred li in circumference and i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or thirty li distant from the Amur. After I begot two sons I moved from Lake Bulhori and have been living at Narhun by the Sahaliyan Ula [the Amur].<sup>63</sup>

漢譯：該布勒瑚里湖周圍百里，距黑龍江一百二三十里，我有二子後，即自布勒瑚里湖遷黑龍江畔那爾渾處居住矣云云。

以上案例是日本學者松村潤 1988 年在《亞洲學報》所寫論文〈談清朝開國的傳說〉，其中「helung giyang」翻譯為英文「the Amur」，正是黑龍江的英文名稱。顯然松村潤也把「helung giyang」誤認為河流黑龍江。

另外美國學者斯蒂芬·杜蘭特也翻譯過這段滿文，同樣是把「helung giyang」誤認為河流：「那個布勒瑚里湖方圓 100 里，離黑龍江約 120 至

<sup>62</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九，頁 4241-4243。天聰九年（1635）五月初六。

<sup>63</sup> Matsumura Jun. "On the Founding Leg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Acta Asiatica 53 (1988), p19.

130 里遠。That Bulhori Lake is 100 li around and is 120 or 130 li from the Heilung River.»<sup>64</sup>將「helung giyang」解釋成「Heilung River 黑龍江」，當然也是個明顯的誤解。

## 肆、布湖現況

以上談了那麼多布勒瑚里湖的來龍去脈，那麼這座湖如今的狀況如何？相信是許多人關注的焦點。

圖 2 《黑龍江輿地圖》的博爾和里鄂模，就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當時測繪的實況，湖的面積不小，確實達到周約百里的規模，與天聰九年（1635），當初〈三仙女〉傳說最早出現的時刻，雖經過了兩百七十三年，卻並無多少變化。

不過這座天聰朝的名湖，在 2003 年出版的《黑龍江省地圖集》中（見圖 3），卻是整個消失了。即使在現在俄羅斯國的電子地圖中，依然不見布勒瑚里湖的蹤跡：



圖 4 俄羅斯國康斯坦丁地區（阿穆爾州）電子地圖

上圖中康斯坦丁鎮（сел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的名稱，<sup>65</sup>為配合原有俄

<sup>64</sup> Stephen W. Durrant, "Repetition in the Manchu Origin Myth as a Feature of Oral Narrativ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22, no. 1-2 (1978): p36.

<sup>65</sup> 俄文的「村 село」，是指人類群居之地，通常以一個地理區或社區為範圍；在定義



文名稱發音，直譯為「孔斯坦季諾夫卡」，<sup>66</sup>不過意思還是一樣的。在這幅地圖裡，標記「（原）布勒瑚里湖」字樣的位置上，完全看不到當年「周約百里」的布勒瑚里湖。再觀察衛星照相，這個地方已經成為一片農田，讓人感到意外：



圖 5 俄羅斯康斯坦丁鎮衛星照相圖

在「（原）布勒瑚里湖」字樣的位置上，可以看到的，不是深黑色的水體，而是淺綠色的植被。

這些植被看得出是人為的農作物。經查當地是由菲力諾夫卡河( реки Филиновка)畔的三個村莊所掌控，三個村莊分別名為謝米多姆卡（село Семидомка、七家村）、科夫利日卡（село Коврижка、薑餅村）、歐克加布利斯科耶（село Октябрьское、十月村）等。菲力諾夫卡河發源於七家村，其水源來自吉利欽河（реки Гильчин），只是並沒有直接連接，而是靠一些濕地銜接。

三個村莊在（原）布勒瑚里湖的位置上耕作，證據確鑿。因為在菲力

---

中，規模通常略大於村鎮，而小於市鎮，與集鎮類似，因此可視其規模翻譯為「鎮」。

<sup>66</sup> 這也是「黑河市地圖」所採用的譯名，見黑河市地圖 <http://ditu.ps123.net/china/6148.html>。

諾夫卡河( реки Филиновка)、提摩失哈河( реки Тимошиха)兩河交會處，左方有大片機械耕作畫過土壤的痕跡，從衛星上向下觀察，農田形成了像是指紋一樣的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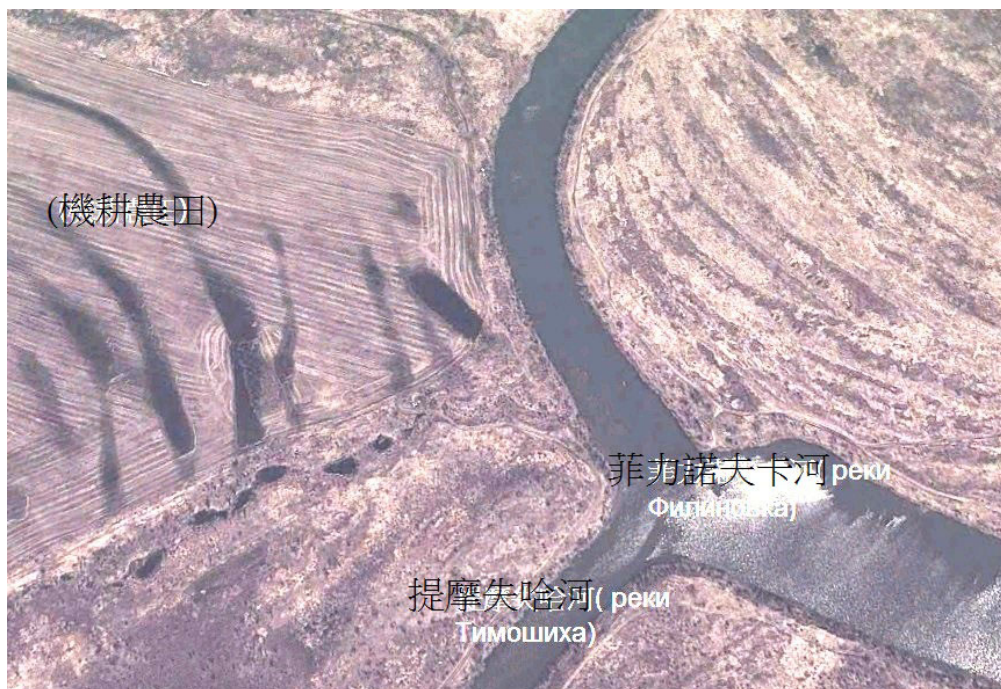


圖 6 菲力諾夫卡河旁的機耕農田

菲力諾夫卡河是（原）布勒瑚里湖所留下的後續水體，長度為 23 公里，在圖 6 中河流由北折向東南，最寬處跨距有 130 公尺，最後向南流入黑龍江。<sup>67</sup>提摩失哈河也是（原）布勒瑚里湖的殘餘水面，在圖 6 中河寬 60 公尺，曲折流向西南，全長約四公里，水面寬度漸減，最後消失在農田裡，並未流入黑龍江。這兩個特點，完全與（原）布勒瑚里湖的走向一致。

二十世紀初期，《黑龍江輿地圖》測繪時，也是只有南端匯入黑龍江的，西邊雖與黑龍江極近，差距不到一公里，但是二者之間並無交流。由此可以反證，當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杜蘭特翻譯的《舊滿洲檔》所述「那個布勒瑚里湖方圓 100 里，離黑龍江約 120 至 130 里遠。」<sup>68</sup>文字頗有

<sup>67</sup> 流入黑龍江的地點，距離黑龍江入海口處約 1835 公里，見 <http://textual.ru/gvr/index.php?card=291735>。

<sup>68</sup> 斯蒂芬·杜蘭特、胡冬朵譯，〈滿族起源神話故事中的重複現象〉，《民族譯叢》，（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2 年 06 期），頁 46-47。



疑義。<sup>69</sup>

菲力諾夫卡河、提摩失哈河兩河，是近年俄國人所命的名字，在清朝的記錄里，並不存在。在《清史稿》中所記錄的水體資料如下：

黑龍江自黑河合烏克薩河入，南屈西，右受五道、四道、三道、二道諸溝，屈南，右受頭道溝，逕廳城東。又南，右合坤河，折東南，右合康達罕、霍爾穆勒津、博寇里，左納伯勒格爾沁河，合博爾和里鄂模水，又東南合遜河，入興東。江東六十四屯在焉。精奇里江以南，黑龍江以北，東以光緒九年封堆為界，有伯勒格爾沁河、博爾和里鄂模，南北一百四十里，東西五十里至七十里，咸豐八年條約，本旗民永住之業。庚子之變。俄人違約驅奪，且擾及江右，脅耆民為官沈江者至數萬。和約成，光緒三十二年僅收回江右地，六十四屯迄未索還，今廳境僅西南北三鄉耳。<sup>70</sup>

此處所述左納伯勒格爾沁河，就是《黑龍江輿地圖》所說的「嘎勒產河」<sup>71</sup>，也就是吉利欽河（реки Гильчин）。而博爾和里鄂模，就是「布勒瑚里湖」。<sup>72</sup>

前面說過，菲力諾夫卡河發源於七家村，其水源來自吉利欽河，只是兩河並未直通，而是靠一些濕地銜接。這種現象，在圖2的《黑龍江輿地圖》中也可以看到。當時布勒瑚里湖同樣沒有河道與「嘎勒產河」（吉利欽河）直接相連，而是藉著一些濕地，將水流送往布勒瑚里湖，再流往黑

<sup>69</sup> 所謂「離黑龍江約 120 至 130 里遠。」其實指的是這座湖離「黑龍江屯」120 至 130 里遠，而不是說跟黑龍江的距離，因為布勒瑚里湖離江僅有一里遠，跟「120 至 130 里遠」之數不符。黑龍江屯與黑龍江相異，這點可從「黑龍江屯 helung giyang」、「黑龍江 sahaliyan ula」二者的滿文不同看出。「黑龍江屯」，就是艾輝。艾輝舊稱「瑗瑀」，清朝時也稱「艾輝和屯」。舊瑗瑀位於江左，現在俄境格羅傑科沃村（гродеково）附近，該村屬於海蘭泡（俄語名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維申斯克）管轄，直線距離（原）布勒瑚里湖的核心，也就是現在的菲力諾夫卡河與提摩失哈河交匯處約 58 公里遠，以二華里約換算為一公里，正合「120 至 130 里遠」之數。

<sup>70</sup>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卷五十七，志三十二，地理四。

<sup>71</sup> 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第 2 冊附冊：《黑龍江輿地圖》（61 面；26x35 公分），頁 32。

<sup>72</sup> 鄂模為滿語「湖」的意思。

龍江。可見《黑龍江輿地圖》並不是馬虎測繪的產品。

也就是說，菲力諾夫卡河，基本上是古已有之，而且就是布勒瑚里湖。菲力諾夫卡河的 23 公里河道，在布勒瑚里湖滿水位存在的時代，只有南端匯入黑龍江前，湖南有短短的數公里是河道，<sup>73</sup>其餘部分，都還是湖面。

那麼，吉利欽河（嘎勒產河）健在、濕地健在、菲力諾夫卡河健在，為什麼布勒瑚里湖會不見了？這點就要從當地俄國人的歷史上尋找了。原來，二十世紀初期，俄國人殖民江東六十四屯時，常為洪水所苦。根據薑餅村（село Коврижка、科夫利日卡）的村史記載：

薑餅村是於 1874 年，成立於菲力諾夫卡河兩岸。村莊名字的源起，在史書上有好幾個版本。其中一個的說法是，在 20 世紀初期，發生了大洪水，薑餅村以及位於低窪洪水肆虐區域的居民，在萬不得已之下，將墓園搬離原處而選擇了現址。這塊不淹水的地方。剛好具備一個圓圓的形狀，類似圓麵包 (ковригу)，因此命名為薑餅村「Kovrižka」。從 1912 至 1913 年間，來薑餅村定居的多為貝加爾湖哥薩克、烏克蘭等民族，其中包含富農和地主，帶來了大量財富和工人。在 1923 年，本區面臨集體化浪潮，但富農(кулаки)村民不想加入集體農場。於市富農旋即遭受鎮壓。為了保命，有人離開家園，去了中國，有人仍留在當地，卻隱名埋姓。富農的家屋被摧毀，於是窮人在飛利諾維奇河(Filinovki，即菲力諾夫卡河)的對岸建起陋屋，組織貧農公社(бедняцкую коммууну)，以紀念十月革命，命名該地為「十月村、село Октябрьское 歐克加布利斯科耶」。村子的集體農場成立於 1929 年，並維持到 1935 年。在 1935 年，靠著農民們交出他們的集體財產，又成立了集體農場「紅色五月」。這時十月村公社開始衰落，留在公社的居民加入了集體農場，然後由第一任主席盧基揚琴科改組為「十月旗幟」«Знамя Октября»，執行計畫生產，其中包含：小麥、燕麥、

<sup>73</sup> 按照《黑龍江輿地圖》所示，進入黑龍江時還分為三條支流匯入。現在水量小了，只剩下一條河道，就不再有當年那種盛大的場面。

小米、大豆和各種蔬菜。薑餅村村委會是領導中心，掌管農業經濟方向。農業用地佔土地基金的比例是 96%，可耕地 14000 公頃。總產出的糧食 17000 噸、2000 噸大豆。2015 年 05 月 20 日。<sup>74</sup>

爲了逃避洪水（наводнение），薑餅村的居民，從菲力諾夫卡河的西岸，遷往東岸現址。從圖 5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七家村、薑餅村、十月村等三個村莊，都居住在菲力諾夫卡河的東岸，而非西岸，顯然這與布勒瑚里湖的餘威尚在，頗有關聯。

這麼說來，也就是得承認，布勒瑚里湖在二十世紀初期，很可能已經有些縮小，以致在薑餅村的位置，湖不見了，俄國殖民者才會看到一條河。

不過根據研判，對布勒瑚里湖真正的打擊，卻在於「吉利欽水庫（Чигиринского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的修建。<sup>75</sup>這座大水庫，將吉利欽河的河水幾乎一網打盡：



圖 7 俄羅斯阿莫爾州的吉利欽大水庫

<sup>74</sup> [http://xn--80afg3aiou.xn--plai/sources/d\\_28\\_08/district08-x=10.php](http://xn--80afg3aiou.xn--plai/sources/d_28_08/district08-x=10.php)。

<sup>75</sup> 吉利欽水庫（Чигиринского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俄文也可寫爲吉利欽水庫（Чигиринское Друть）工程浩大，下游還有規模相當的坦波夫水庫（Тамбовка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е），形成連續階梯狀態，將吉利欽河的水流，逐步蓄留。

雖然水庫具有防洪、發電、灌溉、遊樂等許多優點，但是對下游天然湖泊的生存、環境的生態，卻是相當不利的。據《阿莫爾地區年度大事記》所記，吉利欽水庫大壩是在 1974 年建成的，距離現在僅僅四十二年。水庫大壩建成的消息，在當天報紙上所佔的版面，似乎微不足道，還不如一個區域運動會來得詳細：

（1974 年）6 月 14 日。根據《阿莫爾真理報》報導說，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辦的遠東區錦標經典賽已經結束，阿莫爾州隊得到團體組第三名，阿莫爾察林.b.巴哈列夫在其體重量級中得到冠軍。同日，吉利欽水庫大壩建成，開始儲水。<sup>76</sup>

《阿莫爾真理報》的報導，其實等於是敲響了布勒瑚里湖的喪鐘。缺乏上游河水滋潤的布勒瑚里湖，就此逐步轉為農地，只能任由薑餅村的村夫擺佈，年年生產出小麥、燕麥、小米、大豆和各種蔬菜，卻再也無法招徠仙女的光臨了。

#### 肆、結語

自從天聰九年（1635）《舊滿洲檔》記錄了虎爾哈人穆克希克的〈三仙女〉故事之後，其所言「布勒瑚里湖周圍百里，距黑龍江屯一百二三十里」的一段話，就成為大家追蹤清朝始祖發源地的重要線索。不過康熙皇帝認定清朝始祖發祥地是在長白山，康熙十六年（1677）以後就一再派人前往探勘，希望能夠證實長白山天池，這就是傳說中的布勒瑚里湖。因此《八旗通志》才會記載：「（長白）山之東有布庫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降池畔，吞朱果，生聖子…是為本朝開基之始也。」

不過到了清朝末年，天下動盪。安圖縣首任知縣劉建封，卻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奉旨勘邊時找到圓池並樹立天女浴躬碑，擅自宣稱圓池就是所謂的布勒瑚里湖原址，布勒瑚里湖開始鬧出雙包。近年受到 1969 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將其珍藏的《舊滿洲檔》滿文原檔影印公佈於世的影響，張璿如、董萬侖等學者，提出布兒湖里泊滿文 bulhuri，是水清澈、

<sup>76</sup> 《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Amur Region.）[http://gulevich.net/statiy.files/amur\\_kray\\_history.htm](http://gulevich.net/statiy.files/amur_kray_history.htm)。

水冒出之意，而認定布勒瑚里湖即是今之鏡泊湖。另外日本學者松村潤和中國學者李鴻彬等，卻提出江東六十四屯說，與鏡泊湖、圓池、天池等說，相持不下。

然根據最原始的滿文資料《舊滿洲檔》上記載可知，布勒瑚里湖實位於黑龍江畔，即舊稱江東六十四屯處。推測當初〈三仙女〉傳說源自虎爾哈人所述，後經清太宗皇太極採用，當作族源傳說，惟將起源地略而不論。再至康熙朝，才又將祖源地正式移至長白山，形成定制。於是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時代名噪一時的黑龍江布勒瑚里湖，此後即為朝廷所忽視，而乏人問津。雖然咸豐八年（1858）《璦琿條約》草案簽約時，中方代表奕山突然提出証據說，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地區「都是當今皇朝的祖宗發祥之地」。不過俄方代表穆拉維約夫則反駁說，清朝的老家是寧古塔地方，所依據的正是康熙當年所主張的「天池說」，可知清廷當時雖想要反悔，卻為時已晚。

時至今日，該湖區已劃入俄境，屬阿穆爾州康斯坦丁鎮管轄。更由於滄海桑田，吉利欽水庫、坦波夫水庫紛紛搶走水源，湖面多已開發為農地，水域縮減為兩條小河，其中僅有菲力諾夫卡河可以流入黑龍江，布勒瑚里湖早已不復當年廣袤與靈氣矣。

## 社會分工視角下河湟回藏民族關係<sup>1</sup>

吳楚克、馬瑞雪

吳楚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馬瑞雪，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

### 摘 要

民族關係作為與民族同始終的社會現象，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和歷史的沉澱，又是對現實環境和條件的反映。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及民族關係始終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它與國家的安定團結、政治穩定和進步繁榮息息相關。本文以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為方法，探討回、藏民族之間關係為什麼從“共生互補”轉變為“競爭自利”，通過分析這種典型的民族關係變遷，證明社會分工才是民族關係發展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回族 藏族 社會分工 民族關係 河湟地區

回、藏關係是我國西北地方重要的民族關係，其發展不僅影響邊疆安全與穩定，更與國家長治久安密切相關。進入新世紀以來，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我國民族問題日趨突出，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網路媒體的普及，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媒體將很多本不屬於民族問題的問題打上“民族”問題的標籤，降低了民族問題的嚴肅性和敏感性，而且無形中將部分少數民族的形象刻板化，反而強化了這些民族的民族意識。問題在於，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否如一些學者提出的“文化衝突論”那樣？在更大範圍內如美

---

<sup>1</sup> 本文是北京社科基金重點專案“跨界民族與周邊關係”中期成果（15KDA007）

國學者撒母耳·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那樣？的確，一些民族關係史的研究為這種觀點提供了學術佐證，當今社會真的處在一種不可避免的“文明的衝突”之中嗎？為此，筆者特選擇回族與藏族這兩個長期雜居在西北地方、全民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為代表，從社會分工視角通過探討回、藏民族關係和諧發展的內在原因以及民族關係發展變化的深層次影響因素，試圖證明異質性較強的文化之間交流、互動的可能性，並總結民族關係發展的一般規律，為我國民族關係的研究提供經驗性認識和理論總結。

### 一、回族“仲介”身份下“共生互補”的回藏關係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民族關係及其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關於民族關係的基本理論。馬克思認為：“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sup>2</sup>（注釋的格式和內容需要修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對資源、土地、勞動力各種物質生產資料的需求促使了民族內部的交往向民族間的交往延伸，從而形成了民族關係。<sup>3</sup>注釋地域遼闊的西北地方，在歷史上民族構成色彩繽紛，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生產力水準較低，社會分工相對簡單。具體到河湟地區，這種簡單的社會分工體現在：信仰伊斯蘭的回族歷來是以擅長商業著稱的，但河湟獨特的地理及人文環境，使得這裏的回族在擅長商業的基礎上又擅長農業，並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城市回族主要以商業為主。而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歷史上的青海牧區的畜牧業生產技術一直沒有脫離粗放的遊牧生活狀況。因此，歷史上回、藏的勞動分工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正是由於勞動分工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類型，才使得兩個民族之間的聯繫與互動成為可能。勞動分工的差異造成的民族之間的差異是一種自然現象，是由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歷史傳統造成的，河湟地區處於漢族農業與藏族畜牧業兩大區域的過渡地帶，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為兩個民族的交往提供了經濟上的互補性。

<sup>2</sup>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

<sup>3</sup> 李世勇：《當代青海海西蒙藏漢民族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回、藏之間的民族關係首先發生在經濟領域。從一定意義上說，民族關係就是民族間的利益問題，和諧的民族關係是建立在民族之間相對平衡的經濟利益之上的。歷史上回、藏之間在經濟中的互動，是與回回先民遷移、落戶、直至發展成一個民族共同體相伴相生的。唐宋時期中原王朝就在湟州、河州等地設榷場與吐蕃進行茶馬貿易和細毛交易，回回先民就參與其中。唐代開放的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以及絲綢之路的暢通極大地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族先民陸續來到河湟地區。到宋代，在河湟地區不僅早先入居的穆斯林後裔人數有所增加，而且又有一些回族先民往來於河西走廊。阿拉伯、波斯、喀喇汗國的使臣、商人到敦煌時，則南入柴達木，繞青海湖北岸，循湟水谷地，到中原一帶進行商業活動。河湟地區處於漢族農業與藏族畜牧業兩大區域的過渡地帶，在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宋代在西北開始的“茶馬互市”<sup>4</sup>，促進了河湟地區民族間經貿發展，據資料記載，宋代在河湟地區設“茶馬司”。河湟地區特殊的經濟地理位置就具有發展商業的條件，在建立“茶馬司”之後更加促進了當地的商業貿易活動。

元朝政府支援和發展貿易事業，特別是對穆斯林商人給予優厚的待遇，加之元代疆域遼闊，東西交通大開，西北各民族之間的貿易活動比較頻繁。其中就包括回回先民與牧業區的經濟貿易，當時的西寧不僅是青藏地區與內地的交通樞紐，而且也是重要的貿易場所。元代西寧畜牧業發達，元王朝通過“和市”將西寧等地的犛牛、馬等輸入內地。這不僅促進了西寧的商業貿易事業，還加強了中原地區與藏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到明朝，西北地方的“茶馬互市”空前繁榮，在河湟地區設西寧、河州、甘州、洮州四個茶馬司，與西北各族進行茶馬交易。河湟回族在明中期以後參與的民間茶馬貿易日益興盛，成為河湟經濟交往的主要組成部分。

隨著茶馬互市的發展，漢族、回族及其他民族的商人在明時移居藏族地區的逐漸增多。回族商人開始進入青海腹地、甘南和川西北藏區收購畜產品，與藏族人民雜居，加深了民族之間的互相瞭解。值得關注的是，在

---

<sup>4</sup> 茶馬互市：原指由官方組織將中原地區所產之茶與西北民族地區的馬匹進行的交易活動，後來泛指以中原漢地的茶以及其他農產品和生活用品換取西北牧區的馬以及羊毛、牛皮等畜產品。



這一時期回藏經濟互動出現了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貿易產品上，他們已從由唐宋先民以絲綢、瓷器、珠寶等為主要商品進行貿易的方式逐漸轉變為以地區經濟地理條件為基礎，以經營農牧產品為主。清代，中央政府把沿襲千年的官方專營的茶馬制度的種種限制取消，給民間自由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民間群眾性的回藏貿易迅速崛起。民間貿易的自由促使河湟回族人掀起向青海東部高原移民的高潮，隨之，湟水谷地出現了西寧、丹葛爾、湟源、多巴、白塔爾等新興的回藏商業城鎮。同時，隨著回、藏貿易及商業城鎮的發展，為適應回、藏貿易發展之需求，在回、藏兩族聚居的河州、西寧等地出現了商行與旅社相結合的經濟實體：歇家。<sup>5</sup>歇家為蒙、藏牧民進城交易提供了歇息之處，由回族參與的歇家，對歷史上回、藏貿易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有利於河湟各種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在明末清初，在官方專營的茶馬互市衰落之後，由河湟回族為主導的民間群眾性的回藏貿易填補了空白，成為農牧之間經濟互動的主流。回藏貿易吸引了大量的回族人湧入青海藏區，興起了幾座回藏商業城市，回族以這些商業城鎮為據點，逐漸形成了城鎮回族商業社區。<sup>6</sup>

可見，首先在回、藏貿易互動中，社會分工的不同使得回族在回、藏經濟貿易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回族商人作為仲介，不僅促進了河湟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加強了藏區與內地的聯繫。回商從牧區收購物品，進行加工出售，實現了物品從實物價值到商品價值的過程，從而刺激了牧民對當地生物性資源的開發。<sup>7</sup>回、藏之間這種被學界稱為“共生互補”的經濟關係促進了文化之間的聯繫，文化之間聯繫的加強反過來又深化了經濟聯繫，進而直接影響了兩個民族之間的民族關係。歷史上河湟回藏經濟互動過程中，為了更好的進行交流，回族會主動學習藏語、穿藏袍、養成

<sup>5</sup> 歇家：接待過往買賣貨物的回、藏、蒙等商人，為之屯放物品，並為買賣雙方充當仲介，為客商代辦托運，從而收取費用。

<sup>6</sup> 勉衛忠：《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貿易略論》，《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03期。

馬燕：《歷史上河湟地區回藏與藏族的經濟交往》，《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7年04期。

楊文法：《關於青藏高原地區回藏貿易體系的人類學探討》，《青海社會科學》，2011，（1）注釋的格式不統一，請糾正。

<sup>7</sup> 勉衛忠：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貿易略論》，《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03期。

了吃糌粑喝酥油茶等生活習慣，如今在青海地區的回族中，這些生活習慣仍然保持著。回族商人這種入鄉隨俗的態度拉近了他們與藏族同胞之間的距離。藏族在經濟互動中，對回族的宗教文化、生活習慣等持尊重態度，回藏通婚現象普遍存在。西道堂與藏區的經濟貿易、卡力崗藏族等現象充分說明了回藏之間經濟互動使民族文化間交流的深化，同時也說明了異質性較強的文化間交流的前提是在經濟利益方面的互補性。

其次，單一的社會分工導致藏區對藏區以外社會生活產品的需求大。河湟地區作為一個貿易集散地，不僅雲集了藏區的畜產品和土特產，更是充斥著大量從中原地區轉入藏區的生活必需品。學術界把河湟回族作為媒介的這種貿易方式稱為“東引西進”：東引，顧名思義是從中原輸入商品，而西進則是從藏區輸出產品。西進輸出的商品主要可以分為三類，藏區畜產品、藥材及黃金和青鹽。藏區畜產品中，除牛、羊等畜肉可被輸出外，回族皮匠將珍貴的畜類皮毛進行加工，如鹿、白狼、毛狐、麋等，這些珍貴的皮毛備受藏、蒙、內地貴族的青睞，並成為獨特的民族手工製品。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工藝品流向河湟轉運中原，如皮繩、皮靴、酥油、小刀等。東引輸入的商品主要包括茶葉、糧食、生活用品等三種。茶葉是藏區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正是出於對茶葉的需求，“茶馬互市”乃至於回藏貿易隨之產生。從唐至清各族貿易中，茶一直是大宗項目，任何商品都無法替代；以畜牧業為主的藏族，雖兼營一些農業，如種植青稞，但產量極其低下。因而需要從河湟各地調運五穀。河湟回族將青稞製成炒麵、小麥製成掛麵輸入藏區；日用百貨中有布匹、哈達、緞子、鐵鍋、銅器、茶壺、紙張等由內地輸入。這些商品數量可觀，銷量較廣，利潤也較為豐厚。河湟回族尤喜歡販賣這些生活用具，例如哈達等。此外，東引商品中，也不乏從外國引入的商品。<sup>8</sup>毫無疑問，東引輸入的商品是藏區稀缺、中原地區常見的產品，而西進輸出的產品則是藏區獨特的地理環境下產生的具有藏區特點的產品，是中原地區少有或沒有的。這些商品不僅成為貿易的對象從藏區流動到中原各地，或從中原向藏區流動，大大充實和豐富了市場的同時，商品之上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也隨之傳播，對民族文化

<sup>8</sup> 勉衛忠：《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貿易略論》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03期

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回藏貿易不僅有利於河湟以西藏區畜牧業的發展和生物性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回藏貿易的日益擴大刺激了藏區對中原生活用品的需求量，只有發展自身的畜牧業才能與之相適應。同時，回藏貿易中藏區對茶葉的需求也刺激了陝川產茶區茶葉的生產。

最後，單一的社會分工形式下，藏區商品經濟不發達，產品單一，直接影響了其貨幣觀及價值觀。歷史上在河湟回藏貿易互動過程中，經常進行的是一種互通有無的不等價交換。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年代，回藏之間的交易方式主要有兩種：回族對藏區人民的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易以及回、藏、蒙、漢各族商人之間的以銀易物的間接交易方式，其中，以自然性的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易方式為主。在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易中，以河湟回族為主的商販，在各鎮收買藏區生活必須品組成商隊深入藏區進行貿易。在這個過程中，用藏區所需要的生活必須品如糖、茶、布匹與牧民司空見慣的牛羊等畜產品進行直接的物物交換。儘管貨幣在內地早已廣泛使用，包括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已普遍使用貨幣，但在藏區牧民的交易中，始終存在以物易物的方式。如 1 包茶換 100 斤羊毛、10 余張羊皮；1 尺布換 10 斤羊毛或 1 張羊皮。<sup>9</sup>可見，這種不等價並不是建立在欺騙性質上的，而是出於雙方自願。如果用現代人的思維來看待這件事情，似乎背離價值規律，難以理解，但如果我們把自己放到當時當地的背景下，就對這個現象很容易理解了，在茫茫草原上分散的牧民首先需要的並不是金銀等物品，而是生活必需品。對他們來說，金銀是次要的，甚至是毫無用處的。從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到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對於價值的理解異同，對於“價值”的評判並不是只有一把尺規，各個民族由於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的不同，對於價值的理解也不同。在中原人眼中，金銀作為貨幣擔任著流通的重要作用；而在牧區的牧民眼中，金銀是無用的，他們迫切所需的生活用品才是稀有的，他們願意用自己擁有的牲畜來換取。物以稀為貴，這很好的詮釋了牧區人眼中的價值。

<sup>9</sup> 勉衛忠：《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貿易略論》，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03 期

## 二、從“仲介”到“競爭”的分工轉換是回、藏民族關係變遷的根本原因

“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準，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增加”<sup>10</sup>誠如馬克思所說，社會分工的細化標誌著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提高。解放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品貿易流通和草原牧區生產依然保持回族和藏族歷史上形成的分工態勢，回、藏關係基本保持在傳統軌道上。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回、藏之間的民族關係出現了新特點：社會分工的發展導致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經歷了從“共生互補”到“競爭自利”的變化。在生產力發展水準較低、社會分工較為單一、經濟文化普遍比較落後的計畫體制時代，人們被固定在村落或單位，藏族單一的社會分工形式，決定了其產品的單一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分工較為單一的時期民族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較高。出於經濟上的依賴，民族關係也較為和諧。前文所述的回藏之間歷史上的關係恰好能印證這一觀點。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也日趨密切。同時，對資源的利用和佔有以及對經濟利益的追逐致使民族間因利益的異同形成了或競爭或聯合的關係。因此，不同民族在經濟利益上的競爭、衝突，導致了民族關係的緊張。

經過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發展，我國正在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發展中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階層之間的矛盾、衝突成為社會普遍現象。<sup>11</sup>對於少數民族來說，社會轉型期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社會分工細化的問題。在城市化的進程席捲少數民族地區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原有的鄉土社會結構被打破，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原本單一的分工形式無法適應城市多元的社會分工形式。他們正在經歷如塗爾幹所說的“機械團結”社會到“有機團結”社會的過渡。社會化的工業生產將打破少數民族地區原有傳統封閉的自然經濟，促進少數民族傳統生計方式向適應工業化要求的現代化變遷。隨著機械化大生產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將更加細化，商品生產將更加廣泛，原來單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被瓦解，傳統社會的權威體系和價

<sup>10</sup>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

<sup>11</sup> 李世勇：《當代青海海西蒙藏漢民族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值觀念不斷被開放的現代社會所取代。<sup>12</sup>如青海隆務地區的回族，在文革前，幾乎都曾有專門從事的行業（如手工製作、皮毛業、販運業、飲食業等），商業曾是當地回族的生存基礎和立身之本。文革期間，隆務鎮回族的商業優勢受到極大影響。1980 年以後，隆務鎮回族貿易行業有所恢復，但據當地老人回憶，此時的狀況已是今非夕比，特別是在手工製作業上（如打鐵業、毛皮加工業），幾乎沒人從事，祖輩們的手藝出現無人承續的狀況。<sup>13</sup>

首先，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現代教育觀念的傳播等原因，改變了少數民族的傳統觀念，加深了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傳統手工業、皮毛業等行業的式微，以及藏族的商品觀念在不斷加深的同時，回族在商業方面的優勢大不如前。在這種情況下，回族在回藏關係中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回族不再是藏區藏族可以依賴的仲介角色，而成爲了藏族的競爭對手。隨著回族角色變化而變化的是回藏之間的關係，曾經那種“共生互補”的關係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競爭自利”的關係。

其次，社會分工的細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少數民族的思想價值觀念。正如上文所述，原有的社會分工形態對物品“價值”的理解發生變化，物品的“價值”不再僅僅取決於需求，而被賦予了更多意涵，如身份地位、文化、政治等。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特別是西部大開發以來，與外界廣泛的接觸和認知中，少數民族切身體會到了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同時，隨著農牧區鄉土社會的瓦解，市場觀念的深入發展，商品交換意識的加強，少數民族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關注並追逐經濟利益幾乎成爲所有人、所有民族的基本價值訴求。

最後，社會分工的細化雖加強了民族之間的聯繫但也致使民族之間的競爭關係加強。在市場經濟的形式下，他們必須改變原有的分工形式，以適應當前的形勢。但因爲歷史及現實因素，少數民族在適應新的社會分工帶來的挑戰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回族，傳統的重商思想下，普遍不注重教育。如前所述，如今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回族的商業優勢如昨日黃

<sup>12</sup> 李世勇：《當代青海海西蒙藏漢民族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sup>13</sup> 駱桂花：《青海藏區回族社會生活變遷調查—以黃南州隆務鎮爲例》，西部開發研究，2005 年 9 月

花。迫切需要其他方面的能力，但由於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就業範圍大大縮小，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占多數。

### 三、結論：

民族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事關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從河湟地區回、藏民族關係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民族間和諧穩定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之間持久、頻繁的民間互動；由於社會分工細化引起的不同民族在經濟利益上的競爭、衝突，導致了民族關係的緊張。社會分工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少數民族的價值觀念，直接影響了民族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出於社會分工的需要，民族間的聯繫加強，原有的地域界限被打破；另一方面，社會分工的細化改變了原有的分工模式下民族間的依賴關係，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民族之間的競爭關係凸顯。傳統的社會分工下，少數民族有其自身特有的分工模式，伴隨這種分工模式下形成的文化也是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然而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及普遍化，少數民族逐漸放棄了原有的分工形式，加入到符合現代化潮流的分工模式。這種分工模式改變了少數民族原有的地緣結構，少數民族將從聚居型向散居型地緣結構變遷，從而使原有聚居型社區的文化傳承與規範約束的社會功能消失。故此，少數民族更加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族群之間的壁壘由此加深。

除此之外，通過對河湟回藏關係問題的探討發現，在回藏兩個民族在互動中，回族處於較為主動的一方，藏族則較為被動。筆者認為這與該兩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及所受的宗教影響密不可分。伊斯蘭教影響下的回族講求“兩世吉慶”，積極入世。他們把現世的鼓勵勞作看作是通向後世天堂的途徑之一。在“信前定”這種宗教思想的影響下，回族敢闖、敢拼，不怕失敗只怕自己沒有盡力。此外，回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處於農業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結合部，相對開放、便利的自然環境也為他們提供了條件。在與藏族貿易的過程中，深入自然條件惡劣的藏區。而佛教影響下的藏族，講求“出世”，加之其所在的惡劣的地理條件的影響，“高寒的青藏高原對人的生存世一種挑戰，艱難的生活造就了藏民族對所處環境小心翼翼、謹慎從事的性格，對自然更多地體現出順從、敬畏而少挑戰的勇

氣”，<sup>14</sup>故在與回族交往過程中多表現出忍受、無爭、被動的特性。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民族關係狀況與社會生產力水準呈正相關關係，即生產力水準越高，民族關係越密切。由於生產力的不斷擴張，“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sup>15</sup>可見，社會分工是產生民族問題，影響民族關係發展的根本因素。因此在構建和諧民族關係的過程中，在構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引導少數民族社會分工的現代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 參考文獻

-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
- 〔3〕李世勇：《當代青海海西蒙藏漢民族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 〔4〕南文淵：《藏族傳統文化與青藏高原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 〔5〕勉衛忠：《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貿易略論》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03 期
- 〔6〕馬燕：《歷史上河湟地區回藏與藏族的經濟交往》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2007 年 04 期
- 〔7〕楊文法：《關於青藏高原地區回藏貿易體系的人類學探討》青海社會科學 2011，（1）
- 〔8〕駱桂花：《青海藏區回族社會生活變遷調查—以黃南州隆務鎮為例》，西部開發研究，2005 年 9 月

<sup>14</sup> 南文淵：《藏族傳統文化與青藏高原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sup>15</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三）—怒族食品 「酒燒雞」

華華

### 壹、前言

怒族，是一個高山族，主要居住於怒江兩岸，海拔二千公尺上下的山腰台地上。由於糧食生產多依靠梯田，可耕地狹小，以致人口數也不多。

說到高山，還記得 2013 年 8 月初，一行人參加在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縣舉辦的「海峽兩岸生態文明建設與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飛機先飛到昆明長水國際機場，海拔 2,102 公尺。好友兼美食家司其元小姐一到機場，就忽然變得嬌弱無力，平躺在機場的椅子上了。她平日可是葷素不忌，大聲發表意見，為人爽朗豪邁著呢。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林遙鵬，時常來往雲南邊區出差，經驗老到。馬上判斷，應該是高山症發作的症狀。一般人如果得了高山症，由於人體在高海拔時，氧氣濃度降低，會出現的急性病理變化，如：倦怠、全身無力、心跳加速、噁心和嘔吐等，若坐視不理，甚至有殞命可能。林副秘書長馬上將隨身攜帶曬乾的紅景天藥材，直接泡開水讓司小姐當場服用。神奇的是，再乘機飛往麗江，下機搭上接駁巴士時，即使麗江三義國際機場海拔標高更上升到 2,240 公尺，司小姐經過服藥及朋友的打氣鼓勵後，託天鴻福，症狀竟然就此神奇的消失了。不過其他人仍感到有些胸悶、氣喘，只是美景、美食當前，不好意思躺下來而已。由此可知，平地人的呼吸機能，真的不如高山民族。怒族人體魄如果不夠強健，天天遭受高山症折磨，在怒江兩岸，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生存得下去。

怒族分布於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縣（原碧江縣）、福貢縣、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縣等處。人口數在公元 2000 年統計，總計為 28,759 人。其中福貢縣有 16,752 人，算是最主要的聚居地。而瀘水縣僅有 1,298 人，維西縣更少，



只有約 200 人，分布並不均勻。<sup>1</sup>

其實我們開會經路過的麗江，也有怒人居住。只是當時時間倉促，無法去拜訪而已。據清代《皇朝職貢圖》記載，那時怒人的穿著打扮，十分特殊：

其部落在維西邊外，過怒江十餘日，環江而居。本朝雍正八年歸附，流入麗江、鶴慶境內，隨二府土、流兼轄。性强悍，能以弓矢射獵。男子編紅藤勒首，披髮，麻布短衣，紅帛為袴而跣足。婦亦如之。常負筐持 剮黃連。亦知耕種。以虎皮、麻布、黃蠟等物，由維西通判充貢。<sup>2</sup>

也就是說，清朝雍正八年（1730）時，部分怒族人開始從怒江遷居麗江。當時怒人男女的穿著打扮相似，都是披著頭髮，並用紅藤編成髮箍，勒在額前拘束頭髮，上身穿麻布短衣，下身則穿褲子，人人打光腳，不穿鞋襪，很會彎弓射箭打獵。這種外型，真夠勇猛兇悍的。

提起打光腳，台灣早期鄉下也十分普遍。當時農村多為泥土路，不似現代柏油馬路，在豔陽下會熱得燙腳。農民從小腳底板就練出一層厚繭，等於隨身自備「皮鞋」，既可上山下田，又免去穿脫，行動自如。就便利性、經濟性、耐用性來說，不輸現代科技產品。

怒族由於地理因素，每個縣所使用的語言都有明顯的差異，以致同族之間，常是「愛你在心口難開」。例如在瀘水縣、福貢縣之間，兩種怒語的動詞變化規則不同，相通的名詞只佔十分之一，口音大異其趣，反得藉助於其他民族語言，才能溝通。推測這種尷尬的情形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怒族的祖先，早期應來自於各個民族。雖經過長期的交往、融合，勉強形成一個民族。但由於山川阻隔因素，方言未能統一，以致一縣一方言，各說各話。<sup>3</sup>

話語既然不一樣，吃的東西，變化也就更多了。怒族美食統計起來相

<sup>1</sup> 怒族簡史編寫組，怒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怒族簡史》，（北京市：民族，2008年，第1版），頁1。

<sup>2</sup> (清)傅恒：《皇清職貢圖》，卷七，27 頁 A。《四庫全書》，影印本，史部 11，地理類 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594 冊，645 頁，1987。

<sup>3</sup> 怒族簡史編寫組，怒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怒族簡史》，（北京市：民族，2008年，第1版），頁5-7。

當多，特色小吃如夏拉、八大碗、石飯粑粑、杵酒、漆油燉雞等，都是滔滔怒江上，響叮噹的好料理。這裡就簡單來說一下「酒燒雞」，怒族語稱為「夏拉」的美食吧。

## 貳、怒族食品「酒燒雞」

「夏拉」是怒族傳統名菜，<sup>4</sup>漢語的意思是「砂罐醉雞」，這道菜一般是在隆重的場合才會出現，只用來招待尊貴的客人。原料有漆油、白酒與土雞等燜製而成。凡曾拜訪怒江、吃過的人士，都是讚不絕口。

漆油，對一般人來說，十分陌生，甚至會害怕引發過敏，懷疑其食用性。然而，怒族百姓以往主要的食用油，正是漆油。怒族以漆樹的果實為原料，將其蒸熟、擠壓為油，是「酒燒雞」必用佐料：

過去，怒族民眾的主要食用油是漆油。漆油的原料係漆樹的果實，製作時將其蒸熟，盛在布口袋中，放在板上，經過擠壓，果實漿汁流出，凝固之後，即成漆油。漆油在怒族民眾生活中用途廣泛，除制作漆油茶外，還能制作漆油雞等。除漆油外，怒族民眾還食用核桃油等。今天，怒族民眾的主要食用油是酥油、豬油和菜子油。<sup>5</sup>

當然現代的怒族人，平日食用油已經大多選擇菜子油了。菜子油不只是價格比較便宜，而且是因為菜子油沒有一些怪毛病。原來漆油是從漆樹所結串串像葡萄般的種籽，經過加熱、壓榨濾出來的油。冷卻之後，漆油不是液體，而會凝聚成塊狀。無怪漆油不用瓶裝，而是製成灰黃色的圓餅。據了解這是因為漆油的成分中含有不少蠟質，以致吃完漆油炒的之後，常常會在口腔裡結上一層蠟，久久不化，還真有些麻煩。現在漆油的買家常是火鍋店，因為漆油具有特殊的清涼作用，添加在火鍋時可增進風味，反而被店家視為必備珍品。

但是對品嘗漆油的傳統，怒族人是難以割捨的。因此，在製作「夏拉」時，還是要用到漆油，做出來的「酒燒雞」，風味才會正宗。怒族食

<sup>4</sup> 發音上還有嚇拉、俠辣等不同名稱。

<sup>5</sup> 怒族簡史編寫組，怒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怒族簡史》，（北京市：民族，2008年，第1版），頁137。

品「酒燒雞」，除了有名之外，還兼具治療風濕、婦科疾病等的療效。加上酒味醇香，肉質細嫩，湯頭滋補、食後回甘等特點，怒族人常有「漆油燜雞下粑粑」，<sup>6</sup>天熱不怕，地熱不怕，遇上瘴氣也不怕」的豪邁說法。

如果要製作這道酒燒雞「夏拉」美食，當然怒江產的漆油，是要優先要準備的。一般台北的商店，不可能買到這種食用級的漆油，只能求助於網購了。<sup>7</sup>其他材料包含一隻土雞、燒酒二瓶、調味料等原料。要做「夏拉」時，先將土雞剝成五公分左右小塊，然後放在鍋裡面用漆油煎炒。炒至肉面上有點焦黃時，等溫度稍降，再倒入一瓶燒酒，燒酒一般用米酒即可。接著蓋上鍋蓋燜上十五分鐘，等到水分略為收乾後，再倒入一瓶米酒與其他調味料。等到米酒煮滾，立即起鍋、上菜。經過這種特殊烹調方法加工出來的「酒燒雞」，不只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而且酒、肉俱全，風味相當特別。

### 叁、結語

怒族人除了會做美味可口的酒燒雞「夏拉」之外，宗教信仰也很虔誠。怒族的宗教信仰存在著四種形式：原始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喇嘛教等。除了原始宗教是土生土長的之外，其他的三種宗教都是清末民初後陸續傳入怒族地區的。最先是天主教傳入，之後 1913 年英國傳教士麥克西所主持的緬甸八莫基督教內地會，曾派遣了一個名叫巴叔的緬甸青年教士到騰衝傳教。1920 年，英國內地會傳教士楊志英到達瀘水從事傳教，並沿怒江北上到達碧江傳教。1921 年，美籍牧師楊思惠（A. B. Cooke）由瀘水進入碧江縣怒族聚居的村寨進行傳教活動。基督教傳入後，發展很快，到 1956 年為止，怒江地區共建基督教堂 207 所，大小神職人員 916 人，基督教徒 2.1 萬多人，其中包含怒族基督教徒約有 5,000 人，約占原碧江和福貢兩縣怒族人口總數的 61%，怒族人現在基督徒更達到人口數的七成。怒人喜愛宗教的原因，跟長年遭受貧窮、疾病、欺壓糾纏有關。教士有醫學知識，可以為族人治病，解決燃眉之急。教士有外國勢力為後

<sup>6</sup> 粑粑就是類似客家糯米飯糰、麻糬的食品。麻糬發音源自「麻糍」。麻糍、糍粑傳統作法是用蒸好的原粒糯米，使用木杵和石臼手工打製成團狀，即可食用。

<sup>7</sup> 網路上訂價為：250 公克大概四十元人民幣，外加運費十元，號稱雲南迪慶生產，快遞直達台灣台北中正區。

盾，入教之後，可擺脫傈僳族長期奴役等，都是重要原因。<sup>8</sup>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怒人彎弓射大鵬，調製夏拉宴知交，長年貧病難解脫，求神祈福勉自保。」

---

<sup>8</sup> 怒族簡史編寫組，怒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怒族簡史》，（北京市：民族，2008年，第1版），頁128-129。

## ◆ 稿 約 ◆

- 一、本刊爲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爲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鈺。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